



陝西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出土鎮墓武士俑



陝西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出土鎮墓武士俑



陝西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出土獸面鎮墓獸



陝西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出土人面鎮墓獸

區域互動下陶俑樣式的轉變： 以北周到隋的長安地區為中心

林郡儀*

【摘要】本文探討隋代長安地區的喪家等使用者吸取北齊鄴城傳統陶俑之樣式與組合的可能原因。除了回應先前研究，也拉長觀察時段，並擴及相關工藝品以觀察北朝末年到隋代的區域交流。值得注意的是，長安地區對鄴城地區特色的吸納並非隋代才開始，而鄴城的地區特色僅是長安地區吸納的對象之一，長安地區陶俑也只是吸取鄴城地區特色的眾工藝類型中的一項。隨著北朝末到隋的戰亂與建設，不少工藝樣式的觸及範圍擴大，並在各地受到改造創新，陶俑僅為其中之一，而這些變化和人與物移動頻繁與規模增加有關。

關鍵詞：北周、隋、長安、鄴城、陶俑

前言

在西晉到唐天寶年間華北地區的墓葬中，陶俑經常是現存數量最多的隨葬品，因此成為墓葬研究中極受關注的物質資料。雖然二十世紀末時，今陝西省西安地區出土的北周墓與隋墓數量有限，但學者注意到西安隋墓的陶俑在樣式、製作手法以及鎮墓俑組合上轉向北齊鄴城傳統，北周長安傳統淡出歷史舞台。近年來西安地區北周墓和隋墓大量發表，因此能夠進一步探索北齊鄴城傳統如何傳遞到長安地區、傳遞後如何受當地接受？為何流行？

楊泓於1998年追溯隋唐造型藝術淵源時說明西安地區隋墓出土的陶俑是北齊鄴城與北周長安傳統的混雜，但對於鄴城傳統的傳播原因並未多加著墨。^①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博士級研究人員

① 楊泓，〈隋唐造型藝術淵源簡論〉，《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157-161。

同年，蘇哲討論北齊鄴城文物制度對安陽隋墓的影響時以西安隋墓為對比，認為西安陶俑對北齊鄴城傳統的吸納是因為隋初重新參訂禮典時以北齊制度為依歸，而以北齊為依歸是因為北齊士人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② 這項解釋為學者普遍接受。^③ 但近年開始有學者以禮典修纂時間晚於鄴城傳統在隋長安地區出現的時間順序，質疑這項推論。^④

除了禮制，蘇哲也不排除工匠移動可能是北齊鄴城陶俑樣式傳到長安的原因，但是否為甄官署工匠不得而知，但因文章重點是文物制度的傳播，未對成形手法與製作技術多加著墨。^⑤ 之後在2000年時，小林仁比較北齊鄴城地區、北周長安地區與隋代長安地區在鎮墓武士俑成形手法上的差異。^⑥ 張全民在2018年時對成形手法的觀察以鎮墓俑以外的男女俑為主，並同意工匠移動的可能性。^⑦

上述研究為本文提供重要基礎。關於樣式傳遞媒介，近年發表的出土資料足以支持由類型學分析更細緻地界定區域特色與追溯祖型。因此，本文蒐羅目前發表在考古報告內的北齊鄴城地區、北周長安地區和隋長安地區的陶俑並細分類型，並比較三者類型與成形手法之異同並探討傳遞媒介。除了檢視先前研究提出的工匠移動，本文也考量學者對其他時代陶俑樣式傳播的研究成果，

② 蘇哲，〈安陽隋墓所見北齊鄴都文物制度的影響〉，收於王輝編，《遠望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華誕四十周年紀念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頁671-673。

③ 小林仁，〈隋俑考〉，收於清水真澄編，《美術史論叢・造形と文化》（東京：雄山閣，2000），頁350。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隋墓陶俑的演變〉，《文物》，2018年第1期，頁70-78。倪潤安同意禮制改革是陶俑型制轉變的原因，但認為西安出土陶俑對北齊領地傳統特徵的吸收早於隋，始於北周武帝的禮制改革。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考古學報》，2005年第1期，頁44-46。

④ 徐斐宏，〈北周墓葬面貌的形成及其影響〉，收於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第1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頁137-139。

⑤ 蘇哲，〈安陽隋墓所見北齊鄴都文物制度的影響〉，頁673。

⑥ 小林仁，〈隋俑考〉，頁348-350。

⑦ 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隋墓陶俑的演變〉，頁70。

探討其他可能媒介，例如陶俑成品或模具。^⑧ 另外，也借鑒佛教藝術研究對「樣」在雕塑樣式傳播上的重要性。^⑨

對於長安地區吸取北齊鄴城傳統陶俑的原因，本文由包含朝廷、喪家在內的使用和贊助者視角切入，重新檢視學界目前對於重修禮制與陶俑等工藝品樣式改變之間可能關係的討論。之後，以區域互動的角度檢視和陶俑相關的藝術工藝樣式在北朝末到隋代的傳播動力。本文提出的問題包含長安地區是否也吸取鄴城地區其他工藝品的特色？鄴城地區陶俑與其他工藝品樣式是否傳到長安地區以外的地區？長安地區是否在隋代以前便吸取陶俑在內的各樣工藝品特色？

陶俑以功能來說是明器，但以材質來說屬於陶瓷。雖然陶俑多為模製，但決定其精粗的要素除了陶工的模製技術，最關鍵的是製作母模的工匠對頭身比例與衣紋等細節的掌握，因此，雖然使用於喪葬脈絡，其本質上和宗教造像相同，均屬雕塑。要了解陶俑的區域風格與其變遷，必須考察墓葬文化、陶瓷製作技術、雕塑風格與技法三方面。基於這項認識，本文將囊括陶瓷器皿與佛像等相關工藝，由區域互動的角度探討西安地區陶俑在北周到隋代之間的轉變，希望勾勒出更豐富的歷史圖像。

⑧ 八木春生，〈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陶俑〉，收入曾布川寬、岡田健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三國、南北朝（東京：小學館，2000），頁71-72。謝明良，〈唐俑札記——想像製作情境〉，收入謝明良，《陶瓷手記3：陶瓷史的地平與想像》（臺北：石頭出版社，2015），頁225-234。森達也著，王淑津譯，〈從洛陽到長安：唐三彩的展開〉，《典藏讀天下》，2014年第9期，頁44-53。

⑨ 肥田路美著，顏娟英、張名揚、曹啟德、郭珮君、曾堯民譯，《雲翔瑞像：初唐佛教美術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8），頁17-163、286-287。Dorothy Wong, *Buddhist Pilgrim-Monks as Agents of Cultural and Artistic Transmission: The International Buddhist Art Style in East Asia, ca. 645-770* (Singapore: NUS Press, 2018). Hsueh-man Shen, *Authentic Replicas: Buddhist Art in Mediev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8), pp. 149-168.

一、西安地區北周到隋墓葬出土陶俑的轉變

(一) 北朝末年陶俑的兩大傳統：北齊鄴城與北周長安

北周境內已發表墓葬集中於今陝西西安與咸陽以及寧夏固原，而固原墓葬在墓葬形制以及隨葬品造型和組合上均同陝西西安與咸陽。北齊境內的墓葬分佈較廣，且各有區域特色。^⑩ 在陶俑研究中，最受矚目的是以鄴城為中心的地區。此地區墓葬集中於今河北省臨漳縣與磁縣、河南省安陽，出土的陶俑造型特徵一致性高，小林仁稱之為「鄴城樣式」。^⑪ 本文沿用小林氏的稱法，並以「鄴城地區」稱今河北省臨漳與磁縣、河南省安陽與濮陽。另外，以「長安地區」稱今陝西西安與咸陽。以下分別分析鄴城與長安兩大傳統以及西安隋墓出土的陶俑。

由於長安地區吸取鄴城傳統陶俑的時間點是關鍵，以下分析以紀年墓進行討論。本文在陶俑造型上的分析奠基於考古報告中的圖版。多數報告會公佈鎮墓俑（鎮墓武士和鎮墓獸）圖版，但限於篇幅，其他種類的陶俑經常只有線圖，研究者能獲得的資訊因此受限。有鑑於此，筆者對陶俑造型細節的分析以鎮墓俑為主，其他種類的陶俑為輔。此外，鎮墓俑的組合為觀察重點，因此以已發表發掘簡報的陶俑為研究材料，二手研究提及的未發表資料暫不納入分析。

在造型與組合之外，本文特別強調製作工藝，因為製作工藝在判定鄴城傳統傳入的媒介上提供重要線索。對製作工藝的分析除了參考先前研究，主要是筆者2016—2017年田野調查的觀察。^⑫

北齊鄴城城址位於今河北省臨漳縣西南約20公里處，周圍墓葬區集中於今河北省南部的邯鄲臨漳縣、磁縣，以及河南省北部的安陽。^⑬ 鄴城地區北齊墓

^⑩ 楊效俊，〈東魏、北齊墓葬的考古學研究〉，《考古與文物》，2000年第5期，頁79-83。

^⑪ 小林仁著，李娜譯，〈中國北齊隨葬陶俑兩大樣式的形成及其意義〉，《文物世界》，2012年第1期，頁42。

^⑫ 承蒙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張建林研究員與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張全民研究員在調查上的幫助與指教，深表謝忱。

^⑬ 沈麗華，〈鄴城地區東魏北齊墓群布局研究〉，《考古》，2016年第3期，頁102-115。

的鎮墓武士俑依服飾分為兩型，以下以「鄴城傳統鎮墓武士X型」標示（表1、表3）。鄴城傳統鎮墓武士1型胸前無花結（圖1），2型胸前有花結（圖2）。但兩型均手按長盾、頭帶沖角兜鍪、身著明光鎧。出土1型的紀年墓葬有堯峻夫婦墓（571）、和紹隆夫婦墓（573）、賈進墓（572）、賈寶墓（573）、范粹墓（575）、高潤墓（576）、灣漳壁畫墓（560？）、第九標段取土區木場屯村（574-）。^⑭出土2型的有元良墓（553）。

鎮墓獸依身體特徵可分為三型（表1、表4），以下以「鄴城傳統鎮墓獸X型」標示。鄴城傳統鎮墓獸1型背帶刀型鬃毛（圖3），2型背帶刀型鬃毛和長戟（圖4），3型背上鬃毛相連（圖5）。除了鬃毛，其他特徵相似，都有上翹的尾巴、四足均為爪。出土1型的有元良墓、灣漳壁畫墓。2型有堯峻夫婦墓、和紹隆墓、賈進墓、賈寶墓、范粹墓、高潤墓。3型有第九標段取土區木場屯村。

鄴城傳統鎮墓俑類的基本組合是一對鎮墓武士與一對鎮墓獸（表1）。組合規則固定：一對鎮墓武士俑由兩件一模一樣的鎮墓武士俑組成；一對鎮墓獸含一隻人面、一隻獸面，但兩者身體特徵相同。值得注意的是，門吏俑偶爾使用，如推測為北齊文宣帝高洋武寧陵的灣漳壁畫墓。

北周首都長安城城址位於今陝西省西安市，都城區的墓葬集中於今陝西西安市與咸陽市。鎮墓俑類的基本組合也是一對鎮墓武士俑與一對鎮墓獸。北周墓出土的陶俑造型與鎮墓俑組合變遷迅速且多元並存，但以兩件造型不同的鎮墓武士俑配上兩件趴臥在地的獸面鎮墓獸為主流。^⑮為了避免資訊繁雜模糊焦點，加上已有研究爬梳北周陶俑的發展，本文只關注在轉用鄴城傳統造型前夕最流行的造型種類與鎮墓俑組合。雖然許多墓葬為多人合葬墓，但目前資料仍支持這些造型出現於575年左右，也就是北周武帝建德年間，且為鄴城傳統進入長安地區前的主流。^⑯

^⑭ 第九標段取土區木場屯村出土五行大布，且為單人葬，發掘者推斷為574年後，但不晚於隋代，因為鎮墓獸形制特殊，因此納入討論。見河南省文物局，《安陽北朝墓葬》（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頁79。

^⑮ Chun-i Lin, “Ceramic Tomb Figurines in the Chang'an Area from the 4th to the 7th Century: A Critical Study of Classification, Origins and Functions” (PhD diss.,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Art and Archaeology,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2019), pp. 167-186.

^⑯ 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頁27-54。

鎮墓武士可以分為兩型，兩型配為一對（表2），長安傳統鎮墓武士1型兜鍪頂有尖纓，左手舉於胸前，右手舉於腰間（圖6）；2型兜鍪分瓣，左手執短盾於胸前（圖7）。出土1型的有叱羅協夫婦墓（575）、王德衡墓（576）、若干雲墓（578）、宇文儉墓（578）、韋孝寬夫婦墓（580）、北周武帝宇文邕與武德皇后阿史那氏孝陵（578/582）。出土2型的有叱羅協夫婦墓、王德衡墓、若干雲墓、獨孤藏夫婦墓、宇文儉墓、韋孝寬夫婦墓、北周孝陵。獨孤藏夫婦墓僅出土一件2型，其他墓均出土1型和2型，且多數墓出土兩型各一件，顯然兩型在北周時配成一對使用。長安地區紀年隋代的墓葬出土此兩型鎮墓武士的有咸陽侯子欽墓（586）和西安張綝夫婦墓（589/607）。西安張綝夫婦較特別，出土兩件1型。這將在下個子節討論。

鎮墓獸有三型（表2）。長安傳統鎮墓獸1型有兩隻小圓耳朵，下巴貼在地上（圖8）。2型頭上有獨角，兩側耳朵像人耳，抬頭向上望（圖9）。3型頭上有一對捲曲的角，兩側耳朵像人耳，抬頭向上望（圖10）。在出土這三型的墓葬中，一對鎮墓獸通常由一件1型配上一件2型或3型。

北齊鄴城與北周長安兩股陶俑傳統不僅造型不同，成形手法也不同。

北齊鄴城鎮墓武士頭和身體分別合模製作。頭部前後合模，留下空心圓柱形頸部，身體也是前後合模，之後接合頭身。^{①⑦}鎮墓獸則是左右合模而成。人面鎮墓獸的身體左右合模，人臉以單模另外製作，之後接到頸部。鎮墓獸1型和2型的背上預留長方形槽孔插上鬃毛。3型則是將黏土扭成一排卷曲相連的鬃毛，之後整排黏到背上。

長安傳統鎮墓武士俑的臉和身體前半由同一片模印塑，看似實心，實際上和鄴城傳統鎮墓武士俑一樣體腔中空。然而，長安傳統鎮墓武士俑的後背平直，未以模印表現出後背輪廓，僅在燒成後以彩繪表現盔甲等細節。目前尚無法確定是合模製作但不以模印裝飾後背，還是單模製作後覆蓋無紋泥板作為後背。此外，長安傳統鎮墓武士俑的開洞部位不同。有些鎮墓武士標本腳底封

^{①⑦}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頁84。根據筆者在安陽市博物館對展品的觀察，有些鎮墓武士的頭和身體可能分開燒製，燒成之後才把圓柱形頸部插進兩肩之間預留的開口。

住但背後開洞，以利燒製時排出空腔內的空氣，如侯子欽墓出土品（圖11）；有些標本背後不開洞，而是腳底開口，如北周武帝孝陵的標本。鎮墓獸製作簡單：1型和3型為左右合模；2型則是身體左右合模，臉另外以單模製作後接上。^⑮

長安傳統和鄴城傳統中的立俑、蹲坐俑、騎馬俑等種類在造型上也有顯著差異。長安樣式各種類的陶俑均背部平直，像高浮雕；鄴城樣式陶俑背部則模印出細節，為圓雕。這些將在第三節詳述。

以上分析顯示長安傳統與鄴城傳統的陶俑在造型、鎮墓俑組合和成形手法都不同。長安傳統樣式以兩件不同鎮墓武士搭配兩件獸面鎮墓獸，鄴城樣式以兩件一模一樣的鎮墓武士搭配一件獸面鎮墓獸和一件人面。長安傳統樣式以臥臥型鎮墓獸為主，鄴城樣式以蹲坐型為主。按長盾武士俑、蹲坐型鎮墓獸，尤其是人面蹲坐型鎮墓獸在六世紀七〇年代前在河南、河北、山東、山西省都能見到，但不見於今陝西省。然而，這種狀況在六世紀八〇年代發生改變。

（二）西安地區出土的鄴城傳統陶俑

隋建立後新建大興城，城址位於今西安市。隋代高級墓葬和北周時相同，也集中在今西安市和咸陽市。^⑯

出土於西安地區且屬於鄴城傳統的鎮墓武士和鎮墓獸各分為兩型，以下以「西安鄴城X型」標示（表2）。西安鄴城1型沿用北齊鄴城地區的鄴城傳統1型，胸前無花結（圖12）。紀年標本見於李和墓（582）、宋祈夫婦墓（589）、呂武墓（592）、郁久閭可婆頭墓（592）、呂思禮夫婦墓（592）、鹿善夫婦墓（595）、羅達墓（596）、獨孤羅墓（600）、元威夫婦墓（591/601）、蕭紹墓（603）、李裕墓（605）、李靜訓墓（608）。

⑮ 辛龍，〈陶俑製作工藝的研究—以西安地區魏晉南北朝為中心〉（西安：西北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系碩士論文，2012），頁23-24。

⑯ 妹尾達彦，〈生前空間、死後の世界—隋唐長安の官人居住地と埋葬地—〉，《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266期（2017），頁103。劉呆運，〈關中地區隋代墓地分布研究〉，《考古與文物》，2015年第5期，頁74-78。

西安鄴城2型鎮墓武士以北齊鄴城傳統2型為祖型，胸前有花節。依右手姿勢再區分為兩亞型。西安鄴城2a型右手下垂，放在大腿邊，和其鄴城祖型一樣（圖13）；紀年標本見於張綝夫婦墓（589/607），但報告內僅有線圖，因此以韋裔墓（616）出土同型陶俑圖版為例，但尺寸等詳細訊息有待正式報告公布（圖13）。^{②①} 西安鄴城2b型右手曲舉於腰部，呈90度角（圖14）；紀年標本見李椿夫婦墓（610）、姬威墓（610）、劉世恭墓（615）、豐寧公主夫婦墓（610/634）、推測為隋廢太子楊勇墓的潼關稅村壁畫墓。此姿勢不見於其鄴城祖型，也不見於其他地區的鄴城傳統陶俑。^{②②}

鎮墓獸有兩型（表2）：西安鄴城1型背上沒有鬃毛（圖15）。紀年標本見於呂武墓、鹿善墓、羅達墓、蕭紹墓、李裕墓、李靜訓墓。此型不見於其他時代也不見於其他地區。西安鄴城造型鎮墓獸2型沿用北齊鄴城鎮墓獸1型，蹲坐在地，背上有刀型鬃毛（圖16）。紀年標本見於宋祈夫婦墓、郝久閭可婆頭墓、呂思禮夫婦墓、元威夫婦墓、張綝夫婦墓、李椿夫婦墓、姬威墓、劉世恭墓、豐寧公主夫婦墓。

西安地區的鎮墓俑除了以北齊鄴城造型為祖型，組合規則也沿用（表2）。一件鎮墓武士俑以兩件造型相同的為一對，1型只和1型配，2型也只和2型配對。同樣，一對鎮墓獸也是由身體特徵相同的一件人面一件獸面鎮墓獸組成。

目前學界認為西安地區出土鄴城造型陶俑的最早紀年墓是隋開皇二年李和墓（582）。^{②③} 此墓同時出土分屬兩大傳統造型的俑。^{②④} 屬於長安傳統的則有

②① 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隋墓陶俑的演變〉，頁75。

②② 河北平山北齊崔昂夫婦墓（566）出土鎮墓武士俑的右手也是呈90度彎曲，但圖版顯示右手為修復成果。然而，此鎮墓武士俑的服飾與西安鄴城3型差距較大，作為西安鄴城3型祖型的可能性不大。崔昂墓報告見河北省博物館、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平山北齊崔昂墓調查報告〉，《文物》，1973年第11期，頁28，圖6。

②③ 除了張政墓（572），張政墓附近出土的一座小型墓中有兩件鄴城樣式籠冠俑與北周五行大布一枚，也值得注意。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北周張氏家族墓清理發掘收穫〉，《中國文物報》，2013年8月2日，版8。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南郊清理兩座小型北周墓〉，《文博》，2011年第3期，頁13-17。

②④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省三原縣雙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簡報〉，《文物》，1966年第1期，頁27-40。

騎甲馬俑、風帽俑、殘女俑。^{②④}其造型和西安地區北周墓出土的長安造型陶俑相去無幾。鄴城傳統造型的有按長盾鎮墓武士俑、籠冠俑、小冠俑、風帽俑、袒右肩小冠俑以及兩件近一米高的門吏俑。這些俑均為合模製作，且造型相當接近河北臨漳、磁縣以及河南安陽北齊墓出土的鄴城傳統陶俑。如前所述，張綝夫婦墓中分屬長安與鄴城傳統的陶俑可能分屬不同墓主。然而，李和墓僅出土一合墓志與一口石槨，且報告書中沒有其他可以支持李和墓為合葬墓的線索（例如棺中有其他副骸骨、其他棺槨腐朽痕跡）。值得注意的是2010—2012年發掘於西安的張政墓。張政卒於北周建德元年（572），同年下葬。^{②⑤}此墓出土包含西安鄴城2b型鎮墓武士在內的鄴城傳統陶俑。然而，棺內發現三具骸骨。由於目前對於同棺多人合葬的習俗了解有限，此外，正式發掘報告尚未公佈，不清楚人骨排列狀況，無法排除三人為分次入葬而此鎮墓武士俑是隋代葬入的可能性。因此在簡報發表以前暫不列入討論。在出現新線索前，本文暫採學界共識，將582年視為鄴城造型陶俑傳入西安地區的時間。^{②⑥}

如前所述，長安傳統造型在隋代持續使用。陝西西安張綝夫婦墓的兩位墓主均有墓誌，卒葬年明確。根據誌文，張綝卒於開皇七年（587），葬於開皇九年（589），其夫人薛世蘭卒於大業元年（605），與張綝合葬於大業三年（607）。本墓同時出土的長安與鄴城兩傳統造型陶俑應分屬兩墓主。若採保守估計，以張綝下葬年，甚至卒年為此墓長安傳統陶俑的定年，仍顯示長安傳統造型陶俑在隋文帝開皇年間持續使用。此結果也獲得其他墓葬支持，例如僅出長安造型陶俑的有折婁熊墓（583）、^{②⑦}王昌夫婦墓（589），^{②⑧}以及同時

②④ 出土報告標為「著窄袖翻領服俑」，圖版解說標為「殘扁腹平背男俑」。但其髮髻與臉部特徵與北周墓常見的庖廚女俑同（例如叱羅協墓出土「女跪俑」與宇文儉墓「跪坐燒火俑」。見貞安志編，《中國北周珍貴文物》（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26，圖版67。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宇文儉墓清理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3期，頁33，圖12-1。

②⑤ 另外還有屬鄴城傳統的人面鎮墓獸和其他俑類。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北周張氏家族墓清理發掘收獲〉，版8。

②⑥ 蘇哲，〈安陽隋墓所見北齊鄴都文物制度的影響〉，頁672。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隋墓陶俑的演變〉，頁70。

②⑦ 銅川市考古研究所，〈陝西銅川隋折婁熊墓發掘簡報〉，《文物》，2020年第10期，頁46-58。

②⑧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洪慶北朝、隋家族遷葬墓地〉，《文物》，2005年第10期，頁49-55。

出土長安與鄴城造型的有李和墓（582）、侯子欽夫婦墓（586）、張綝夫婦墓（589/607）、呂武墓（592）。

由出土鄴城傳統陶俑的墓葬年代看來，西安地區陶俑樣式的轉捩點在六世紀八〇年代，為何西安地區的陶俑會在這個時間點開始顯著變化呢？回答這個問題前必需先知道鄴城傳統陶俑如何傳到西安地區，之後才能進一步探討傳播背後的可能動力。

二、鄴城傳統陶俑的傳遞媒介

（一）西安鄴城傳統陶俑的產地

要探討傳播方式，首先必須判別西安隋墓出土之鄴城傳統陶俑的產地。雖然目前未見胎土分析報告，但以下藉由比較西安和其他地區的鄴城傳統陶俑的造型細節論述西安隋墓鄴城陶俑為當地產品。承前一節所述，目前學界同意鄴城傳統陶俑在隋代開始流行於長安地區。陝西、河南、河北、^{②9} 山東、^{③0} 安徽、^{③1} 江蘇^{③2} 等地都有隋墓出土帶有北齊鄴城造型餘韻的鎮墓武士與鎮墓獸。其中，河南安陽隋墓出土的鄴城造型陶俑的造型與尺寸最接近西安隋墓的出土

^{②9} 河北的例子有河北景縣高潭夫婦墓（582）與河北平山崔大園墓。河北景縣高潭夫婦出土的按盾鎮墓武士分別和鄴城原型1型幾乎一樣，鎮墓獸雖像北齊鄴城3型，但是半蹲而非蹲坐在地，可能是當地製作。崔大園墓出土按盾武士俑和安陽M201與M401出土的造型和尺寸都相似，但長盾上沒有獸面。參考其他俑的造型，此墓出土的俑可能也是當地製作。發掘報告見河北省文管處，〈河北景縣北魏高氏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3期，頁22、30-3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平山縣博物館，〈河北平山縣西岳村隋唐崔氏墓〉，《考古》，2001年第2期，頁57-65。

^{③0} 山東省博物館，〈山東嘉祥英山一號墓清理簡報〉，《文物》，1981年第4期，頁28-32。

^{③1} 安徽省展覽、博物館，〈合肥西郊隋墓〉，《考古》，1976年第2期，頁136-137。安徽省博物館，〈合肥隋開皇三年張靜墓〉，《文物》，1988年第1期，頁86-87。

^{③2} 徐州市博物館，〈江蘇銅山縣茅村隋墓〉，《考古》，1983年第12期，頁149、圖版8-4。南京博物院、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蘇州市考古研究所，〈江蘇揚州市曹莊隋煬帝墓〉，《考古》，2014年第7期，頁75。

品，學界對於安陽隋俑和北齊鄴城陶俑之關聯的討論也最豐富。^{③③} 因此，以下藉由比較今陝西西安地區與安陽隋俑來對分析鄴城傳統傳入西安的媒介。在安陽隋俑中，中國社科院發掘的29座墓包含9座出土鎮墓俑的墓，雖然多為中小型墓，但隨葬大量陶俑、資訊相對完整，且造型與組合均具代表性。^{③④} 以下以此批墓葬為樣本進行分析。

安陽隋墓出土陶俑造型、組合規律和模製手法均承自北齊鄴城地區。鎮墓俑基本含一對一模一樣的按長盾鎮墓武士，以及一對身體特徵相同的人面和獸面鎮墓獸。造型和其北齊祖型相去不遠，為利讀者區別，本文採「安陽隋墓X型」指稱安陽隋墓出土陶俑。安陽隋墓鎮墓武士1型胸前無花結（圖17），2型胸前有花結（圖18），兩者的造型明顯仿自北齊鄴城傳統鎮墓武士1型和2型（表3）。安陽隋墓1型鎮墓獸背上是一排卷曲相連的鬃毛（圖19），2型是有三簇鬃毛（圖20），分別是北齊鄴城傳統3型和1型鎮墓獸的翻版（表4）。

蘇哲認為安陽隋墓出土的鄴城樣式陶俑和來自北齊鄴都（今河北臨漳）的移民有關。北周武帝滅北齊（550—577）並在作為北齊首都的鄴置相州。北周武帝崩後年幼的北周靜帝即位，楊堅為實際掌權者。580年相州總管尉遲迥起兵反楊堅，但被韋孝寬擊敗，把相州遷至原鄴城的南邊，坐落在今天的安陽。

《隋書》記載「初，齊亡後，衣冠人士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相州〕州郭」。基於造型與模製手法的相似性和史料對「技巧之家」移入的記載，蘇哲因此認為安陽隋墓出土鄴城樣式陶俑是由來自北齊鄴都的工匠生產的。^{③⑤}

③③ 蘇哲，〈安陽隋墓所見北齊鄴都文物制度的影響〉，頁667-673。小林仁，〈隋俑考〉，頁345-356。

③④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1年第3期，頁369-406。河南省的隋墓集中在安陽地區，目前發表的有鄭平墓（569）、宋循墓（589）、張盛墓（595）、韓邕墓（597）、置度村八號墓，另外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發掘包含卜仁墓（603）在內的隋唐墓，以及1966—197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安陽工作隊發掘的29座隋墓。隋墓中的陶俑雖有創新，如張盛墓的鎮墓武士、鎮墓獸，但大部分直接沿用北齊鄴城樣式。

③⑤ 蘇哲，〈安陽隋墓所見北齊鄴都文物制度的影響〉，頁671。小林仁，〈隋俑考〉，頁345-364。

西安隋墓的鄴城造型陶俑是否也是有來自鄴城的工匠參與其中呢？進一步探討前必須先釐清西安陶俑的產地。由於目前尚未發現相應窯址，只能從墓葬出土品推敲。

首先，西安地區同型陶俑的相似度非常高，甚至能找到連尺寸也幾乎一樣的產品。以西安鄴城樣式鎮墓武士1型為例，目前出土品的高度都介於30-36公分之間。其中，呂武墓、蕭紹墓、李裕墓和李靜訓墓的陶俑連眉眼與微笑等細節都一樣，高度介於33.6到34.5公分之間，全距不到1公分（圖21-24）。鎮墓武士鎮墓武士2b型高度介於42-50公分之間，李椿夫婦墓、姬威墓、豐寧公主夫婦墓、被認為可能是太子楊勇墓的潼關稅村壁畫墓在細節上高度相似，且高度全距只有2.1公分，以將近50公分的俑來說，這是相當小的差異（圖25-28）。上述兩組例子說明同型陶俑相似度高，可能出自同一生產中心。此外，造型與尺寸都幾乎一樣的陶俑可能出自同作坊，甚至由同一母模翻印出的範具製作。

西安出土的鄴城樣式陶俑彼此相似，但和其他地區出土的陶俑有明顯差異。即使是與西安隋墓出土陶俑最相似的安陽隋墓與磁縣、臨漳、安陽北齊墓出土品，在表現細節與人物身體比例上也有若干差異。以鎮墓武士為例（表3），安陽隋墓1型、西安鄴城1型都以北齊墓出土的鄴城傳統1型鎮墓武士為祖型。乍看之下三者非常相似，但細節透露出不少差異。首先，北齊鄴城傳統1型、安陽1型的上臂都有三層褶皺，但西安1型沒有。北齊鄴城傳統1型、安陽隋墓1型鎮墓武士頭盔頂端突起，但西安鄴城1型的下凹。此外，北齊鄴城1型高度往往超過50公分，安陽隋墓1型鎮墓武士在40-50公分左右，但西安鄴城1型鎮墓武士低於40公分。

安陽隋墓2型與西安鄴城2a與2b型也都以北齊鄴城傳統2型為祖型。然而，同樣的，北齊鄴城傳統2型、安陽隋墓2型鎮墓武士頭盔頂端突起，但西安鄴城2a與2b型均下凹。此外，西安鄴城2b型的右手以90度曲舉在腰側，這個姿勢不見於鄴城北齊墓與安陽隋墓，可能是為西安本地發展。^{③⑥}

鎮墓獸方面（表4），北齊鄴城地區的鎮墓獸身體連後腳為左右合模，前腳是另外製作後接上。安陽隋墓的兩型鎮墓獸以及西安鄴城2型鎮墓獸也是如此。

③⑥ 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隋墓陶俑的演變〉，頁70。

西安鄴城1型鎮墓獸身體雖是左右合模，但同側的前腿和後腿刻畫在同一片模上。這種造型與製作手法不見於其他地區，是西安本地的發展。

上述比較顯示，西安地區墓葬出土的鄴城樣式陶俑彼此造型和尺寸一致性高，同時，和其他地區的鄴城樣式陶俑差異性大。可見西安地區鄴城樣式陶俑為當地生產。

（二）「樣」的傳遞與工匠移動

針對傳遞媒介，先前陶俑研究提及工匠移動、模具（包含母模、範具）流通，以及以外地陶俑成品做為母模，翻出範具後在當地生產陶俑的可能性。^{③7}此外，本文借鑒佛教藝術研究對「樣」的討論。所謂的「樣」包含平面圖稿、立體模型等非成品。當成品做為造型範本，供其他製作者以各種材料或者以其他形式複製時，也可歸為「樣」。^{③8}本文認為，當模具不是用來直接生產（例如以母模翻範和以範具模印成陶俑），而僅做為造型參考時，也歸為「樣」。以「樣」為媒介往往涉及材質間的相互模仿、平面和立體形式間的轉換、不同尺寸間的縮放等過程。因此，即便力求忠實複製，再製品與原物的差距大於以同組模具直接製作。

首先檢視工匠作為媒介的可能性。鑒於西安地區出土的鄴城造型陶俑和其北齊鄴城原型成形手法的相似性，張全民主張有鄴城—相州地區的工匠參與西安鄴城造型陶俑的製作，蘇哲也暗示可能有工匠參與，但是否由甄官署調派工匠不得而知。^{③9}針對學者主張，本文以熊海堂提出的陶瓷製作技術交流三層次為架構，分析鄴城樣式傳播到長安地區的過程中是否可能有熟悉鄴城傳統陶俑

③7 謝明良，〈唐俑札記——想像製作情境〉，頁221、232。

③8 沈雪曼在對「樣」的討論中以比丘尼梵正用食材複製《輞川圖》，做出「輞川圖小樣」食物盤為例來說明。Hsueh-man Shen, *Authentic Replicas: Buddhist Art in Medieval China*, pp. 150-151.

③9 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隋墓陶俑的演變〉，頁78。蘇哲，〈安陽隋墓所見北齊鄴都文物制度的影響〉，頁673。

製作的工匠參與。陶俑以材質來說是陶器，而熊氏三層次說是目前衡量陶工移動廣泛使用架構，此三層次如下：成形與造型裝飾技術為表層交流，可以透過觀察成品達成，不一定有技術人員參與；胎釉配方與裝燒技術為中層，窯爐技術為深層，必須有技術人員接觸才能完成這兩個層次的交流。^{④①} 以下討論中以「工匠」統稱各樣技術人員：除了直接勞動者，也指未必親自勞動但擁有某些技術的人員。前者為傳統定義上的工匠，社會地位往往較低，後者多為官員，負責監督，例如以下討論中設計大興城和東都洛陽的宇文愷、設計輿服樣式的何稠和閻毗。

鄴城樣式陶俑為素燒彩繪貼金，沒有上釉，且目前未見對陶胎進行科學分析。另外，目前只在安陽的相州窯發現陶俑破片，雖然出土殘窯，但僅存底部，無法確知此窯爐結構的細節與其產品性質。^{④②} 受限於材料，難由窯爐結構、裝燒技術、胎釉配方探討工匠移動的可能性。僅能由墓葬出土陶俑成品與傳世文獻提供的蛛絲馬跡探索。

由於隋代西安鄴城造型陶俑與其北齊鄴城原型均無釉，且目前未見胎土成分分析，以下僅能由製作手法談起。如前所述，鄴城傳統和長安傳統的鎮墓獸與鎮墓武士在造型和成形手法上都不同。除了鎮墓俑，其他立俑、蹲坐俑及騎馬俑的製作手法也不同。

鄴城地區北齊墓出土的立俑（如小冠男立俑、籠官男立俑）與蹲坐俑（如廚房僕役）等是頭和身體分別製作後拼接。灣漳墓出土陶俑的做法具代表性，且報告分析詳細。小型立俑的俑頭前後合模，脖子以下塑成實心圓錐或圓柱，有些俑頸部中間藏有鐵芯。之後插到前後合模製成的身體。唯一例外的是風帽俑，由於帽沿垂到肩上，所以工匠將頭身一起前後模製。前面那片模印製臉和身體前半，後面那片印後腦勺和身體後半。^{④③} 騎馬俑分成數個部分模製後拼接。其中，馬頭左右合模；馬軀幹與騎士腰部以下也是，馬軀幹與騎士腰到腳

④① 熊海堂，《東亞窯業技術發展與交流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12、43。

④② 河南省博物館、安陽地區文化局，〈河南安陽隋代瓷窯址的試掘〉，《文物》，1977年第2期，頁48-56。

④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頁84。

由同一片模印製。騎士上身、騎士頭兩部分則為前後合模。馬腿內常有鐵芯支撐，之後接在底板上。^{④③}

長安傳統樣式的模製方式相對簡單。立俑與蹲坐俑都是單模製作。臉和身體在同一片模上，因此後背平直。有些例子會在俑的腳跟黏上一塊黏土或者預留泥土，增加底盤面積，以便站立在墓中。由於俑為實心，燒造因為空氣排出造成俑背突出裂開，不少北周武帝孝陵的俑便成此樣貌。長安地區的騎馬俑是各部分別模製後拼接。但馬軀幹和騎士膝蓋以下左右合模，馬頭也是。騎士頭部、上身到大腿以一片單模成型，後背刮平，沒有模印。將胯下黏貼到馬背上時，正好將大腿末端接在與馬軀幹一起模印的小腿上方。陶工模製馬軀幹後會在底端四個角落各捏出一個凹槽，以便黏接馬腿。北周時期馬腿帶鐵芯的例子不常見，且大部分不帶底板。

鄴城傳統的陶俑為圓雕，頭身分別合模製成。俑中空，底部開放，在燒造時可以排出俑空腔內的空氣。長安傳統的俑，近似高浮雕，背後平直，沒有模印表現，頭身一體成形。小型俑以單模成形後背刮平，因此是實心，武士俑則是頭身正面一起以單模製成，背後黏貼泥板，因此中空。

以目前考古成果看來，西安地區出土的鄴城造型陶俑多採用的北齊鄴城傳統的成形方式。兩型鎮墓武士俑都是頭身分別合模製造後連接。鎮墓獸1型正如它的鄴城祖型，也是以兩片模分別由左右印製身體與後腳，前腳分別製作、插入鐵芯支撐後接到身體上，背上預留長方形槽孔插上鬃毛。人面鎮墓獸也是身體左右合模，臉以單模製作後接上。鎮墓獸2型則結構簡略，同一片模含一側的前後腳與身體。騎馬俑、立俑、蹲坐俑的結構與北齊鄴城傳統陶俑相同，除了風帽俑，幾乎都是俑頭和俑身分別前後合模後連接。此外，以鐵芯支撐陶俑脖子、馬腿以及鎮墓獸前腿的作法變得常見。^{④④}也就是說，隋代長安地區陶俑製作由單模轉向合模且普遍使用鐵芯。

乍看之下，這種轉變過程未必需要鄴城—相州來的工匠參與，畢竟長安傳統造型的鎮墓獸與陶馬也是合模製作，顯示北周時期長安當地工匠能掌握合模技法。

^{④③}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頁88-93。

^{④④} 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隋墓陶俑的演變〉，頁74。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長安隋張繼夫婦合葬墓發掘簡報〉，《文物》，2018年第1期，頁31、35、36。

然而，工匠的習慣不是那麼容易改變的。倪潤安就觀察到北周末時長安地區就已經選擇性吸收北齊鄴城和晉陽等區域的陶俑造型，但仍以單模製作。^{④⑤}再者，僅由觀察成品不易掌握使用鐵芯的技巧。荷蘭國立博物館檢測分析館內一套八世紀的陶俑，之後以實驗還原馬俑製作過程，發現陶俑內夾鐵芯，在乾燥和燒造階段容易破裂。尤其是乾燥階段，因為陶俑坯乾燥時胎土收縮但鐵芯不會隨之收縮，因此會把陶坯撐裂。^{④⑥}以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陶俑內殘留的纖維後，研究人員認為陶工在插入鐵芯前，以燈草纏繞鐵芯作為緩衝。^{④⑦}雖然檢測對象是八世紀的陶俑，但六到七世紀西安隋墓鄴城樣式陶俑中的鐵芯可能也使用相同手法插入。陶俑燒造過程中作為有機物質的燈草會燒掉，很難藉由觀察成品知道這項手法，需要藉由熟悉技術的工匠交流。由於以鐵芯支撐陶俑的作法在北周時期的西安地區幾乎不見，但在北齊鄴城和隋代相州相當普遍。^{④⑧}因此，可能由鄴城—相州工匠帶入長安地區。

此外，西安地區出土的鄴城樣式陶俑的高度明顯高於長安傳統樣式陶俑（表3）。體積大的陶俑在成形和燒製上都相對困難，未必能透過觀察成品就把握竅門。長安傳統樣式陶俑中最高的是帶尖盔的鎮墓武士，約為30公分，目前最高的樣本出於武帝孝陵，高達30.3公分。^{④⑨}然而，西安鄴城樣式鎮墓武士都在30公分以上，有些甚至在50公分上下，如李椿夫婦墓的鎮墓武士。另外還有大

④⑤ 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頁45。

④⑥ Lucien van Valen, Isabelle Garachon, and Loe Jacobs, “On the Production and Firing of 7th Century Chinese Reinforced Ceramic Horses and Camels,” in H. Roemich and K. van Lookeren Campagne eds., *Recent Advances in Glass, Stained-Glass and Ceramic Conservation 2013* (Zwolle: SPA Uitgever, 2014), p. 156.

④⑦ Isabella Garachon and Lucien van Valen, “The Matter of Tang Tomb Figures: A New Perspective on a Group of Terracotta Animals and Riders,” *The Rijksmuseum Bulletin*, 62: 3 (2014), pp. 230-233.

④⑧ 高望堆北朝墓的騎馬俑馬腿夾鐵芯是少見的例子。陶俑造型推斷，此墓年代應該在北魏到西魏之間，不晚於北周初期。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韋曲高望堆北朝墓發掘簡報〉，《文物》，2010年第9期，頁38。

④⑨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陽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2期，頁18-19。

型門吏俑，如李和墓的和郁久閭可婆頭墓的出土品。雖說大型門吏俑的頭和身體分別燒成後才接上，但只論身體高度就遠超出長安傳統樣式俑群中最高的鎮墓武士俑，總高更達100公分左右。^{⑤①}北周長安地區的陶俑小於30公分，而北齊鄴城地區50公分以上的陶俑比比皆是，隋代相州地區的鎮墓武士也都在40公分以上。大型器在塑形和燒造上對歷代陶工都是挑戰，甚至必須建造特殊窯爐。因此陶俑尺寸的躍進可能牽涉到窯爐結構這種深層次交流，也就是說，可能有鄴城—相州工匠移動到西安生產陶俑。雖然不能排除長安當地陶工利用當地燒造大型建築構件的窯爐和技術燒造大型陶俑，然而，綜合考量西安鄴城樣式陶俑的造型、鐵芯的使用、尺寸等各樣因素，鄴城—相州陶工參與在西安地區鄴城傳統陶俑的製作是更為合理的解釋。

文獻也有工匠移動的記錄。根據《隋書·蘇孝慈列傳》，文帝登基之初，時任太府卿的蘇孝慈負責「徵天下工匠」，結果「纖微之巧，無不畢集」。^{⑤②}可見開皇元年到二年有各地工匠集中到首都長安。此時太府寺統管甄官署。^{⑤③}隋代甄官署也掌磚瓦之事，加上當時興建大興城需要大量磚瓦，因此可能有各地陶工聚集到長安來。^{⑤④}《隋書·食貨志》記「及〔隋文帝〕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⑤⑤}可見營

⑤① 李和墓100公分，郁久閭可婆頭墓分別為96.7公分和95.3公分。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省三原縣雙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簡報〉，頁29。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長安高陽原隋郁久閭可婆頭墓發掘簡報〉，《文博》，2018年第4期，頁20-21。

⑤② 「高祖受禪，進爵安平郡公，拜太府卿。于時王業初基，百度伊始，徵天下工匠，纖微之巧，無不畢集。孝慈總其事，世以為能。」（唐）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46，頁1259。蘇孝慈於開皇二年六月轉任兵部尚書，顯示此次「徵天下工匠」不晚於開皇二年六月（582）。（唐）魏徵等，《隋書》，卷1，頁17。

⑤③ 文帝在位期間太府寺統左藏、左尚方、內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黃藏、掌冶、甄官等署。煬帝即位後甄官署改屬將作監。（唐）魏徵等，《隋書》，卷28，頁777、799。

⑤④ 「晉有甄官署，掌磚瓦之事。宋、齊、北齊、隋悉有之。大唐因之，掌營磚石瓷瓦。」（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597。

⑤⑤ （唐）魏徵等，《隋書》，卷24，頁680。

建大興城時從太行山以東的北齊舊領地徵發工匠。作為能工巧匠聚集地，想必鄴城—相州一帶有不少工匠受徵調。^{⑤⑤}除了由朝廷明令徵調，也可能有工匠流散到長安地區。北朝到隋有許多工匠在官方掌握之外。不少達官顯貴、地方豪強與寺院私匿工匠，這些工匠可能隨其主遷移。^{⑤⑥}又，北朝末到隋戰事不斷，工匠流散、被擄是常事。北齊鄴城在北齊滅國和隋代韋孝寬平尉遲迥時兩次被毀，應有不少工匠遷入長安地區。^{⑤⑦}

這些由鄴城—相州地區遷入長安地區的工匠是否攜帶母模、範具或少量陶俑成品用於製範？或者是否有模具和陶俑不是由工匠攜帶，而是以其他管道流入長安地區？

學者提出母模、範具流通的原因是要解釋跨區出土的「同模」陶俑。這些陶俑可能由同一母模翻出的範具製作，甚至可能出於同一範具，因此在造型細節上幾乎相同，尺寸也相去不遠。^{⑤⑧}考量陶俑易碎的性質以及古代的運輸條件，不少學者認為相較於運送陶俑成品，這些「同模」陶俑可能是以流通於區域間的模具在各地分別製作。^{⑤⑨}針對鄴城樣式的傳播，八木春生舉出江蘇徐州北齊墓M34與河南安陽和紹隆夫婦墓出土的同模甲士俑可能是模具流通的結果。^{⑥①}韋正與喬蘇婷發現徐州東甸子M1出土鄴城樣式陶俑，M2出土為晉陽地區

⑤⑤ 2019—2020年於陝西麟遊隋仁壽宮唐九成宮遺址發掘出帶有「相州郭宗」的蓮紋花瓦當，雖然出土地層與詳細定年尚待公佈與研究，但可作為隋唐時相州工匠移動到長安與鄰近地區的例證。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第一工作隊）、陝西省麟遊縣文物管理所（李春林），〈隋仁壽唐九成宮4號殿遺址考古發掘〉，《藝術品鑒》，2021年第7期，頁79。

⑤⑥ 唐長孺，〈魏晉至唐官府作場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北京：三聯書店，1959），頁46-51。

⑤⑦ （唐）魏徵等，〈《隋書》〉，卷73，頁1675。

⑤⑧ 「同模」的定義參見謝明良，〈唐俑札記——想像製作情境〉，頁222。

⑤⑨ 森達也在唐三彩俑的研究中注意到陝西與河南兩省出土許多「同模」陶俑，但考量陶俑易碎的性質以及當時運輸條件，也傾向認為這種異地「同模」陶俑的情況是因為模具流通。謝明良將「同模」情況分類，依案例不同提出不同可能性。見森達也著，王淑津譯，〈從洛陽到長安：唐三彩的展開〉，頁44-53。謝明良，〈唐俑札記——想像製作情境〉，頁222-234。

⑥① 八木春生，〈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陶俑〉，頁72、75。

特有樣式的陶俑，且細節與晉陽出土品幾乎沒有差別。兩人認為以北齊的運輸條件，這些陶俑是當地製作，而非由鄴城與晉陽運到徐州。^{⑥1}

管見所及，西安地區尚未發現「同模」鎮墓武士或鎮墓獸。依循鄴城與徐州間交流的例子，如果以生產鄴城祖型或者生產其他地區鄴城樣式陶俑的母模與範具在西安地區進行生產，西安地區應該會出土和其他地區北齊墓或隋墓出土鄴城傳統陶俑造型細節非常相似且尺寸相去不遠的例子。若以陶俑成品為媒介，在長安地區作為母模翻印成範具進行生產，應該能找到造型細節非常相似，但細節表現模糊且尺寸稍小的案例。然而，目前沒有發現上述兩種例子。如前所述，即便是和其鄴城祖型以及安陽隋墓出土品相相當接近的西安1型與2a型鎮墓武士俑，在頭盔和臂甲上的細節都表現出明顯的區域特徵（表3、4）。此外，西安鄴城2b型鎮墓武士右手屈舉呈90度角，西安鄴城1型鎮墓獸前後腿相連，這些特徵更是西安獨有。

在其他種類的陶俑上，即便是姿態與服飾都相近的例子，西安地區的出土品也展現區域特徵。和北齊與安陽隋墓出土的披袍風帽俑（圖29-31）相比，西安地區的頭的比例較大，且著窄袖（圖32-33）。臉型方面，北齊與安陽隋墓的俑臉型較長，西安地區的臉型較圓。以衣紋判定，安陽地區北齊與隋墓作拱手狀的俑的袖口由手掌處向兩邊下垂，袖口呈現弧線（圖34-35）。這種樣式在西安地區罕見，且袖口為不具弧度的斜線，例如元威墓出土的俑（圖36）。拱手雖是西安陶俑常見的姿勢，但大部分俑的袖口是則分別由雙手手肘前端下垂，袖口呈直線（圖37-38），或者合攏。此外，許多西安地區出土的立俑腳後跟兩旁留有多餘的黏土（圖37-38），這項特徵在西安地區出土的長安傳統陶俑上相當普遍，但未見於河南河北出土的鄴城傳統陶俑（圖29-31, 34-35）。

上述外型上差異顯示，即便生產北齊鄴城或安陽陶俑的母模、範具、陶俑成品曾經傳到長安，目前尚無考古證據支持西安鄴城樣式陶俑由這些工具直接製造。因此，應轉向考慮母模、範具與陶俑成品是作為「樣」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流入長安地區，但不直接用於製範與模印過程，而是作為造型樣版，由工

⑥1 韋正、喬蘇婷，〈論江蘇徐州地區南北朝墓葬中的陶俑〉，《東南文化》，2020年第6期，69-70。

匠以木頭或其他材質摹刻或以陶土摹塑，之後以摹刻或摹塑的成品作為母模翻範製作陶俑。這種可能性能解釋西安地區出土的鄴城樣式和其他地區產品的差異。然而，正如學者提出「模具流通」假說的考量，陶俑易碎。雖然不排除母模和範具可能是木製，運送相對容易。然而，基於運輸方便性，似乎應該優先考量以微縮立體模型和平面圖稿為「樣」的可能性。

沈雪曼認為，考量成本與運輸難易，中古中國的樣以平面或微縮立體模型居多，材質以相對低廉的紙、木等為主。^{⑥2} 雖然目前研究多集中於唐到宋，對北朝到隋的樣稿的形象與使用方式了解不多，仍能透過傳世文獻的零星紀錄和實物上的製作痕跡來推敲樣的使用。^{⑥3} 魏徵編纂《隋書》時記載了不少隋代使用樣的案例。《隋書·經籍志》中登錄的《晉鹵簿圖》、《陳鹵簿圖》、《諸衛左右廂旗圖樣》裡面可能含平面樣稿。^{⑥4} 開皇十三年，宇文愷造了「明堂木樣」，則為木頭做成的立體微縮模型。^{⑥5} 大業元年何稠、閻毗在重訂輿服時「造樣上呈」，也是在大業年間，黃亘、黃袞兄弟多次在何稠的命令下負責「立樣」，之後這些平面或立體樣再交付工匠。根據記載，工匠對黃氏兄弟的樣「皆稱其善，莫能有所損益」。^{⑥6}

樣在造型傳播中扮演重要角色。隋文帝在仁壽年間三次於隋境各州設置舍利塔，下令「所司造樣，送往當州」。^{⑥7} 朝廷制定塔的樣式後，藉由平面圖

⑥2 Hsueh-man Shen, *Authentic Replicas: Buddhist Art in Medieval China*, p. 155.

⑥3 另外，學者對唐到五代敦煌樣稿的分類與研究成果斐然，雖然時代稍晚，且以製作壁畫、幡等平面作品的樣稿為主，但仍能以此一窺北朝到隋樣稿的可能形象。沙武田，〈敦煌畫稿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Sarah Fraser, *Performing the Visual: The Practice of Buddhist Wall Painting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618-96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⑥4 （唐）魏徵等，《隋書》，卷33，頁969-971。

⑥5 （唐）魏徵等，《隋書》，卷6，頁122。另見，（唐）魏徵等，《隋書》，卷68，頁1593。

⑥6 （唐）魏徵等，《隋書》，卷68，頁1599。

⑥7 〈隋高祖於國內立舍利塔詔并瑞應表謝〉，收入（唐）道宣，《廣弘明集》，卷30，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主編，《大正新脩大藏經》，冊52（東京：大正一切新刊行會，1924-1934），頁213-2。

稿或立體模型傳播到各地。^{⑥⑧}稍晚的唐代關於建築、佛寺石窟壁畫與佛教造像的樣有更多記錄。同為雕塑，佛像樣式的傳播有助於推想陶俑樣式的傳播媒介。^{⑥⑨}王玄策的使節團是以樣傳播佛像樣式著名的例子之一。根據唐代道宣的《法苑珠林》，王玄策使團中，隨行工匠「宋法智等，巧窮聖容，圖寫聖顏。來到京都道俗競摸」。^{⑦⑩}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寫到洛陽敬愛寺「佛殿內菩薩、樹下彌勒菩薩塑像，麟德二年（665）自內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圖菩薩像為樣」。^{⑦⑪}雖然《法苑珠林》的一些描述帶神異色彩，《歷代名畫記》的評論部分具個人觀感，但關於王玄策使團將當地佛教造像繪成樣稿帶回，以及此樣在中原地區依樣刻塑並傳播的記述應屬記實性質。除了文字記載，丈量佛像以繪製成平面圖樣的場景見於敦煌莫高窟72窟南壁五代壁畫的劉薩訶和尚因緣變相。此場景位於南壁西側，畫面中央為榜題「請丹青巧匠題聖容真身時」，左方為一位工匠伸出長竿測量瑞像，右方則有一塊畫布繃在框上，木框兩旁各站一名工匠（圖39）。^{⑦⑫}雖是為表現番禾縣瑞像的故事，但畫中對丈量與圖寫佛像場景的描繪應能反映晚唐五代匠人實際工作的場景。相較於撐竿丈量佛像，陶俑體積較小，更容易測量比例以轉化為平面媒材和立體模型。

⑥⑧ 肥田路美與李志鴻均剖析隋文帝由中央送樣在統一王朝的版圖建造同風格塔的政治意義。肥田路美著，顏娟英、張名揚、曹啟德、郭珮君、曾堯民譯，《雲翔瑞像：初唐佛教美術研究》，頁176-177。李志鴻，〈隋代的王權與佛教——以仁壽設塔活動為核心〉，《中華佛學研究》，16期（2015），頁105-126。

⑥⑨ 學者對「樣」在佛教雕塑的樣式傳播上有豐富研究成果，肥田路美、王靜芬（Dorothy Wong）、沈雪曼（Hsueh-man Shen）均有論述。肥田路美著，顏娟英、張名揚、曹啟德、郭珮君、曾堯民譯，《雲翔瑞像：初唐佛教美術研究》，頁17-163、286-287。Dorothy Wong, *Buddhist Pilgrim-Monks as Agents of Cultural and Artistic Transmission: The International Buddhist Art Style in East Asia, ca. 645-770*. Hsueh-man Shen, *Authentic Replicas: Buddhist Art in Medieval China*, pp. 149-168.

⑦⑩ （唐）道世，《法苑珠林》，卷29，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主編，《大正新脩大藏經》，冊53（東京：大正一切新刊行會，1924-1934），頁503-1。

⑦⑪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頁71。

⑦⑫ 孫修身編，敦煌研究院主編，《敦煌石窟全集》，第12卷·佛教東傳故事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頁159。感謝芝加哥大學博士生周真如女士教示並提供此筆資料。

雖然陶俑模具與成品的便攜性高於上述例子中的佛像與舍利塔，但平面圖稿和立體模型的可移動性更高，且在運輸過程中的損耗低。如果不是到目的地後立即用於大量生產，運送平面圖樣或微縮模型是較為經濟的考量。基於前述西安地區鄴城樣式陶俑在外型上具有區域特徵，雖然不能排除日後出土與北齊墓與安陽隋墓陶俑「同模」的陶俑，但以目前考古發現而言，即便有模具和陶俑成品流入西安地區，也沒有用於大量製作，頂多作為造型樣板。此外，如前所述，長安地區很可能有熟知鄴城樣式陶俑製作技術的工匠移入。以工匠的角度而言，除非要在目的地立即開始大量生產，否則更適切的選擇是攜帶平面圖稿和立體模型，在目的地摹刻與摹塑為母模，之後製範、生產陶俑。筆者因此認為鄴城傳統陶俑是由熟知鄴城陶俑製作技術的工匠攜帶平面圖稿和立體模型傳遞到長安地區的。然而，這些工匠和長安當地工匠的關係有待未來研究。此外，西安地區鄴城樣式不同型鎮墓武士尺寸相距甚大，不同型的鎮墓獸甚至在結構與製作手法方面都有差異，可能是由不同工匠集團製作。這是否也暗示長安地區對鄴城樣式的吸取是經由不同工匠集團帶入也有待未來研究。

三、隋代長安地區吸取鄴城傳統的原因

鄴城樣式從傳入到蔚為風尚，除了供應方，需求方也很重要。即使陶工提供鄴城樣式的陶俑，如果使用者不接受，鄴城樣式陶俑也無法在西安地區落地生根。在隋代，西安地區除了接受鄴城陶俑的造型，連組合也一併接受。雖然陶工能決定使用何種技術，在陶俑造型上也有某程度的決定權，但是陶俑組合的決定權主要在使用者手上，工匠話語權有限。也就是說，除了供應方，如果沒有使用方的支持，鄴城傳統無法在西安地區流行。本節嘗試由西安地區使用者的角度出發，討論禮制改革和陶俑樣式間的關係。另外，近年各地北朝到隋的考古工作大幅度推進，除了墓葬數量大為增加，窯址、佛像窖藏、石窟等墓葬以外的發現也如雨後春筍。在陶俑以外，研究者也注意到隋長安其他工藝品對於北齊舊地元素的挪用，如八木春生對菩薩像的觀察。^⑦ 本節將陶俑與墓葬

^⑦ 八木春生著，李梅譯，〈隋代菩薩立像衣著飾物〉，《敦煌研究》，2012年第1期，頁1-10。

壁畫、陶瓷容器、佛教造像等在使用或生產脈絡跟陶俑相關的藝術工藝品一起考量，由北周到隋長安地區對鄴城地區工藝的需求重新思考鄴城樣式陶俑在隋長安地區的流行。

（一）隋代的禮制變遷與陶俑樣式的轉變

關於禮儀變遷和陶俑樣式轉變間的關聯，蘇哲為最早倡議的學者。蘇氏引用《隋書·禮儀志》的記載：「開皇初，高祖思定典禮。……〔牛〕弘因奏徵學者，撰儀禮百卷。悉用東齊儀注以為準，亦微採王儉禮。修畢，上之，詔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⑦④} 蘇氏說明隋禮典多用北齊制度，且關東士人在隋初參訂禮典時扮演重要角色，陶俑作為喪葬明器，自然也在引入之列。倪潤安也引用此段史料，認為陶俑是禮制的衍生品，隋代採用北齊儀注後自然受到影響，長安傳統陶俑失去政治依附後自然為新引入的鄴城傳統陶俑取代。^{⑦⑤} 小林仁舉隋仁壽二年（602）議定獨孤文獻皇后喪儀時，牛弘等人以北齊規範為基礎，贊同陶俑樣式轉變和隋朝廷積極引入北齊喪葬制度有關。^{⑦⑥}

這段史料中牛弘等人修纂的禮典指的是隋代三部禮典中最早的《開皇禮》，始修於開皇三年（583），頒行於開皇五年（585）。^{⑦⑦} 徐斐宏注意到以往研究忽略的事件先後順序。因此持相反看法。徐氏指出，目前發現紀年最早的西安隋鄴城樣式陶俑出於開皇二年（582）的李和墓，早於《開皇禮》始修年，因此和新禮制無關。^{⑦⑧}

然而，隋代對禮制的修訂並不限於禮典編纂。^{⑦⑨} 除了《開皇禮》等三部禮典，文帝開皇元年到三年（581—583）時的一系列律令格式與對輿服等的改

^{⑦④} 蘇哲，〈安陽隋墓所見北齊鄴都文物制度的影響〉，頁672。（唐）魏徵等，《隋書》，卷8，頁153。

^{⑦⑤} 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頁46。

^{⑦⑥} 小林仁，〈隋俑考〉，頁350。

^{⑦⑦} 高明士，《中國中古禮律綜論：法文化的定型》（北京：商務出版社，2017），頁228-233。

^{⑦⑧} 徐斐宏，〈北周墓葬面貌的形成及其影響〉，頁138。

^{⑦⑨} 高明士，《中國中古禮律綜論：法文化的定型》，頁223-285。

制，以及煬帝大業年間重新議定的輿服與宗廟制度等，都是隋代重訂禮制的內容。^{⑧〇}其中，頒布於開皇二年（582）的《開皇令》中就有〈喪葬令〉。^{⑧一}雖然李和墓紀年早於《開皇禮》始修年，但這點無法完全否定禮制改革和陶俑造型與組合變化的關聯。這項討論要等西安出土紀年早於李和墓的鄴城傳統陶俑才能進一步討論。^{⑧二}

受限於材料，關於禮制與隋長安地區吸取鄴城傳統陶俑之間的關係這項討論遇上瓶頸。然而，本文希望援引隋代以外的狀況並擴及陶俑以外的例子，重新思考隋初禮制規範與工藝品樣式之間的關係。

隋代制禮的過程相當漫長。即便是輿服，隋文帝年間祭祀用的禮服也「皆未能備」，百官常服也「同於匹庶」，就連隋文帝也僅「帶加十三環，以為差異」。《隋書·輿服志》清楚解釋是「蓋取於便事」。祭祀禮服與朝服都和統治合法性息息相關，但在文帝年間卻未能齊備且以便事為原則。可見即使是與禮制相關的工藝品，制定禮制和制定工藝品樣式未必同時。

即使官方制定樣式，要能順利實行也必須通過重重關卡。輿輦的設計與製作便是禮制影響工藝品樣式但歷經波折的例子之一。隋文帝於開皇元年廢毀西魏北周輿輦，只留北齊天保沿用北魏時製作的五輅。^{⑧三}文帝下令制輅時可能參照北齊樣式。然而，許多種類的輿輦「雖依禮製名，未及創造」，開皇三年甚至「並詔停造，而盡用舊物」。^{⑧四}開皇十四年再次「命有司詳考故實，改造五輅及副」，煬帝大業元年再次「更製車輦」。^{⑧五}由此可見，雖然有工藝品受禮制改革的影響，但從下令、訂定樣式、生產製造、推廣普及，一關關間總是有層層落差。

其次，即便以北齊儀注為基礎，禮儀相關的工藝與建築也未必以北齊樣

⑧〇 高明士，《中國中古禮律綜論：法文化的定型》，頁271-274。

⑧一 高明士，《律令法與天下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10。

⑧二 目前出土的西安北周張政墓（572）可能為關鍵證據，但如前所述，無法完全排除此鎮墓武士俑與其他鄴城傳統陶俑是隋代葬入的可能性。見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北周張氏家族墓清理發掘收穫〉，版8。

⑧三（唐）魏徵等，《隋書》，卷10，頁200。

⑧四（唐）魏徵等，《隋書》，卷10，頁203。

⑧五（唐）魏徵等，《隋書》，卷10，頁203。

式為依歸，而是有所選擇。宇文愷設計明堂時「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眾說，總撰今圖」。^{⑧⑥}大業初年煬帝重訂輿服時命何稠「討閱圖籍」。^{⑧⑦}可見不是直接沿用北齊樣式，而是創造新樣。此外，工匠本身的背景也應列入考量。何稠家族曾僑居以織品著名的蜀郡郫縣。^{⑧⑧}這樣的背景除了使何稠能監造出超越波斯金繡錦袍的作品，想必也在訂定輿服樣式時有所助益。^{⑧⑨}隋朝廷在建立之初便「徵天下之工」到長安。^{⑧⑩}由於參與禮制相關工藝品製作的匠人來自四面八方，工藝品想必表現出多元源頭。

多元性也表現在西安地區的隋墓中。作為北齊都城的鄴城是北齊禮制貫徹最嚴格的區域，而墓葬形制、壁畫佈局以及內容向來被學界視為禮制表現的關鍵。然而，隋代長安並未積極採用北齊鄴城地區的墓葬特色。李和墓顯示多元源頭（圖40）。此墓出土鄴城樣式陶俑。墓室壁面下方以赭紅色畫出方框，框內繪有枯樹假山（圖41），讓人聯想到山東臨朐北齊崔芬墓（551）的墓室壁畫（圖42），此為青齊傳統。^{⑧⑪}墓室為長安傳統的方弧型多天井單室土洞墓。此外，根據簡報描述，其墓道過洞入口外的兩側繪有「單身的男像或女像，像高約一米」。在北周長安地區墓葬可見，如西安安伽墓（579）（圖43）、咸陽宇文通墓（572）（圖44）；寧夏固原李賢夫婦墓（547/569）（圖45）也可作為旁證。^{⑧⑫}這屬於長安地區傳統。即使是被認為可能為隋太子楊勇墓的陝西潼關

⑧⑥（唐）魏徵等，《隋書》，卷68，頁1593。

⑧⑦（唐）魏徵等，《隋書》，卷68，頁1597。

⑧⑧（唐）魏徵等，《隋書》，卷68，頁1596。（唐）魏徵等，《隋書》，卷75，頁1709。（唐）魏徵等，《隋書》，卷29，頁830。感謝匿名審查者教示《隋書》對何稠家族僑居蜀地的記載。

⑧⑨（唐）魏徵等，《隋書》，卷68，頁1596。何稠祖父為細胡，可能連此西域家族背景都對其仿波斯錦有所助益。見（唐）魏徵等，《隋書》，卷75，頁1709。

⑧⑩（唐）魏徵等，《隋書》，卷42，頁1259。

⑧⑪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省三原縣雙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簡報〉，頁28-29。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朐縣博物館，〈山東臨朐北齊崔芬壁畫墓〉，《文物》，2002年第4期，頁10-25。

⑧⑫徐光冀，《中國出土壁畫全集》，第6卷·陝西（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頁132。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頁8-9。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婦墓發掘簡報〉，《文物》，1985年第11期，頁3-4、圖版1、2。

稅村隋墓也展現多元源頭（圖46）。其墓室為圓形，這點屬於青齊傳統，在鄴城地區少見。潼關稅村隋墓墓道保留多天井的特色，這點屬於長安傳統，在隋代沿用，並於隋晚期成為身分高低的象徵。^⑨雖然墓道兩側的壁畫內容可能來由鄴城地區「長卷式壁畫」獲取靈感，但佈局不同，且天井壁畫仍維持長安傳統，繪有單獨站立的拄刀儀衛（圖47）。^⑩

回頭看陶俑。隋代禮儀分為「吉」、「凶」、「軍」、「賓」、「嘉」五禮。雖然隋禮具體內容沒能傳到現代，但是能從以隋禮為基礎的《大唐開元禮》一窺其喪儀在五禮內的歸屬。^⑪《大唐開元禮》中和喪葬有關的儀式分為「靈」和「尸」兩部分，這種區分方式是先秦以來喪葬禮儀的核心。^⑫對靈魂的安頓屬於吉禮，對屍體的處置屬於凶禮。在喪葬儀式相關的物品有很多，從旌銘、棺槨、誌石，再到各樣明器。陶俑僅是明器之一。雖然隋代喪葬令內容佚失，但能以與《開皇令》為基礎的唐代喪葬令及其影響推估隋代陶俑在喪禮上扮演的角色。^⑬唐代喪葬令規定墓主等級以及與之對應的陶俑尺寸、數量與材質，顯示這三者才是陶俑在等級區分上的重點，而等級區分是喪葬禮制的核心。^⑭

針對陶俑樣式和墓主身分對應的問題，學者推測北齊朝廷可能下賜官方作坊生產陶俑樣式，或者制定官樣。^⑮雖然不排除隋朝廷也藉由官營作坊生產官方認可的造型，之後以賜葬推廣造型與組合，並在作為京畿地區的長安嚴格執行。然而，以目前出土的兩型鎮墓武士和鎮墓獸而言，出土西安隋墓鄴城1型與鎮墓獸1型的墓包含姬威與豐寧公主等高等級官員與皇親國戚，同時也有作為驍

^⑨ 劉杲運，〈關中地區隋代墓葬形制研究〉，《考古與文物》，2012年第4期，頁91。

^⑩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頁6-10。

^⑪ 高明士，《中國中古禮律綜論：法文化的定型》，頁291。

^⑫ 涂宗呈，〈神魂、屍骸與塚墓——唐代兩京的死亡場景與喪葬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博士論文，2012），頁65。

^⑬ 唐高祖即位之初便以《開皇令》為唐代律令藍本。見高明士，《律令法與天下法》，頁88。

^⑭ 齊東方，〈唐代的喪葬觀念習俗與禮儀制度〉，《考古學報》，2006年第1期，頁60-68。

^⑮ 小林仁著，李娜譯，〈中國北齊隨葬陶俑兩大樣式的形成及其意義〉，頁42-66。劉璋琦，〈試論東魏北齊時期官方樣式——鄴城與晉陽隨葬俑的特徵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1卷1期（2013），頁31-32。

果的劉世恭。由於驍果受制於作為從五品的武勇郎將，其品級想必更低。^⑩因此目前難以斷定陶俑樣式是否對應墓主身分等級。另外，即便是喪葬禮制文字資料與出土資料相對豐富的唐代，囿於關於禮制的文字記錄有限，加上出土的隋代初期以跨北周到隋代的夫妻合葬墓居多，目前對於隋代初期墓主等級與墓葬形制和隨葬品之間的確切關聯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相較於朝廷力量，本文認為更值得探討的是喪家的自主性在西安地區陶俑於北周到隋之間的轉變上扮演的角色。

官方在喪葬上控制力有限的例子在歷史上層出不窮。以唐代為例，許多學者觀察到唐長安地區墓葬出土的陶俑尺寸遠超過喪葬令文規範。^⑪齊東方指出，初唐以來僭越屢禁不止，朝廷只能不斷妥協、放寬規定。^⑫謝明良考察出土三彩俑以及《唐六典》等文獻記載，指出官員在朝廷賞賜之外也可自行購買明器，甚至中低階層喪家也可自由購買檔次不遜於官營作坊的三彩器。^⑬此外，葉娃考察偃師杏園唐代李氏和宋氏家族墓，認為陶俑的使用與否是由家族成員決定。^⑭以上研究都顯示官方的規定力量有限。雖然以上文獻和出土材料多在唐開元年間，但在喪家的自主性這點上，隋代的情況可能和唐代相去不遠。

此外，目前考古出土顯示北朝的區域傳統在隋代續存。就連長安地區也是。北周長安樣式的陶俑在《開皇令》與《開皇禮》頒布後持續使用到仁壽年間。^⑮其他區域樣式在隋代也持續使用。^⑯山西太原斛律徹墓（597）與王季族

^⑩ 氣賀澤保規著，古怡青譯，〈驍果制考——隋煬帝時期兵制的一個面向〉，《早期中古史研究》，5卷2期（2013），頁57-58。

^⑪ 謝明良，《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臺北：石頭出版社，2014），頁107-108。

^⑫ 齊東方，〈唐代的喪葬觀念習俗與禮儀制度〉，頁70。

^⑬ 謝明良著，王怡文、林容伊譯，〈對唐三彩與甄官署之關係的考察〉，《典藏·讀天下·古美術》，2014年第9期，頁54-55。原刊於謝明良，〈唐三彩と甄官署との關係についての考察〉，《唐三彩の諸問題》，《美學美術史論集》，5輯（1985），頁19-23。謝明良，《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頁109。

^⑭ Wa Ye, "Mortuary Practice in Medieval China: A Study of the Xingyuan Tang Cemetery," (Ph. 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2005), pp. 237-247.

^⑮ 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隋墓陶俑的演變〉，頁70。

^⑯ 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隋墓陶俑的演變〉，頁78。

墓(583)的陶俑仍維持為北齊時流行於當地的「晉陽樣式」,人物特色為頭與足部窄,腹部寬廣,整體呈梭形。^⑩如前所述,安陽隋墓則忠實地繼承流行於北齊鄴城的造型。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北朝時期陶俑不盛行,但在隋代開始使用陶俑的地區。這些地區以鄴城樣式為祖型,但加以變化,區域特徵明顯。例如安徽合肥張靜墓(583)(圖48)和合肥西郊隋墓(圖49)出土的鎮墓武士俑雖然手按長盾,但長盾位於身體正中,而不是在左側,此外,還著披風,鎧甲下擺左右各繫一個小鈴鐺。^⑪

區域特徵在陶俑組合上更加強烈。安徽、江蘇徐州隋墓在鄴城傳統的按長盾鎮墓武士和蹲坐型鎮墓獸之外,還出土人首鳥身俑。^⑫在湖南湖北隋墓,按長盾鎮墓武士罕見,但盛行十二支獸俑,例如湖南湘陰大業六年墓(610)出土的兩套青釉十二支獸俑。^⑬人首鳥身與十二支獸俑在陝西與河南的隋墓均罕見。^⑭

這些區域特色顯示地方製作者和喪家的自主性。由這點出發也能說明隋代長安地區陶俑使用者對北齊鄴城傳統的吸納。北齊鄴城陶俑的組合對長安地區的人並不陌生,因為兩地組合大同小異,可能因為都奠基於北魏洛陽地區的陶

⑩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沙溝隋代斛律徽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頁12-90。翟盛榮、晉華,〈昔陽縣沾尚鎮瓦窯足村發現隋寧州刺史王季族墓葬〉,《三晉考古》,5輯(2006),頁373-374。晉陽樣式的定義見小林仁著,李娜譯,〈中國北齊隨葬陶俑兩大樣式的形成及其意義〉,頁44-49。

⑪ 安徽省展覽、博物館,〈合肥西郊隋墓〉,頁136-137。安徽省博物館,〈合肥隋開皇三年張靜墓〉,頁86-87。

⑫ 安徽省展覽、博物館,〈合肥西郊隋墓〉,頁136,圖版11-3、11-4。徐州市博物館,〈江蘇銅山縣茅村隋墓〉,頁149、圖版7-3、8-5。

⑬ 張全民說明湖北武漢、湖南湘陰等地隋俑在組合和裝飾上都有地方特色,其衣紋和面目採用刻劃,不同於陝西河南等地區以彩繪為主。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隋墓陶俑的演變〉,頁78。熊傳新,〈湖南湘陰隋大業六年墓〉,《文物》,1981年4期,頁40-42。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武漢市郊周家大灣241號隋墓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957年第6期,頁33圖版拾壹。權奎山,〈武昌郊區隋唐墓出土陶俑的分期〉,《慶祝宿白先生九十華誕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243。

⑭ 謝明良,〈出土文物所見中國十二支獸的形態變遷——北朝至五代〉,《六朝陶瓷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06),頁370。

俑組合。^⑪ 雖說以兩件造型不同的鎮墓武士為一對在西魏北周時是長安地區主流，但以兩件造型相同者為一對的組合時有所見，例如拓跋虎墓出土一對一模一樣的鎮墓武士俑，在咸陽空港物聯產業城M23也發現一樣的組合（圖50）。^⑫ 有趣的是，拓拔氏墓（571）出土一對一模一樣的鎮墓武士，頭戴圓盔，腹部又大又圓，身體扭曲呈S型，閉上盔甲無摺皺（圖51）。這種造型的鎮墓武士通常會與一件造型相似但臂上盔甲有摺皺的鎮墓武士配對，如陝西咸陽侯義墓（圖52）、寧夏固原李賢夫婦墓和宇文猛墓的組合。^⑬ 隋代的張綝夫婦墓除了鄴城樣式陶俑還有長安傳統樣式陶俑。一般而言一件長安鎮墓武士1型會配上一件2型，但張綝墓以兩件1型為一對。此外，北魏到西魏時人面鎮墓獸曾使用於西安地區，雖然後來加上長獠牙，但人耳等特徵保留，成為長安傳統2型。^⑭ 可見，當鄴城樣式傳入時，長安地區的人對兩件造型尺寸都相同的鎮墓武士搭配一件人面和一件獸面鎮墓獸的組合想必不陌生，甚至欣然接受。加上鄴城樣式陶俑製作精良、比例協調，自然受到歡迎。

以目前材料看來，各地隋墓出土陶俑在組合上具區域特色。另外，以北齊鄴城陶俑為祖型的陶俑在造型上也各有區域特徵。這顯示出各地作坊與喪家在組合和樣式上的自主性。因此，由北朝以來區域互動的趨勢有助於了解隋長安地區對北齊鄴城傳統的吸取。

（二）北朝末到隋華北的區域互動

1. 風華絕代的鄴城地區

^⑪ 倪潤安，〈北周墓葬俑群研究〉，頁37。

^⑫ 賁安志編，〈中國北周珍貴文物〉，頁1、圖版3。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咸陽鄧村北周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7年第3期，頁45、47、52。

^⑬ 咸陽市文管會、咸陽博物館，〈咸陽市胡家溝西魏侯義墓清理簡報〉，《文物》，1987年第12期，頁57-68。耿志強，〈寧夏固原北周宇文猛墓：發掘報告與研究〉（銀川：陽光出版社，2014）。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寧夏固原博物館，〈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婦墓發掘簡報〉，頁1-20。

^⑭ Chun-i Lin, "Ceramic Tomb Figurines in the Chang'an Area from the 4th to the 7th Century: A Critical Study of Classification, Origins and Functions," p. 109.

楊效俊將東魏北齊境內墓葬文化分為四個區域，此四區與東魏北齊的行政地理範圍基本吻合，共有以鄴城為中心，包含今河北臨漳與磁縣、河南安陽與濮陽的「京畿地區」、以晉陽（今山西太原）為中心的「并州地區」、在今河北北部與北京一帶的「冀定滄幽地區」、今山東一帶的「青齊地區」。^{⑪⑥} 楊氏分區建立在墓葬文化上，但也適用於其他墓葬以外物質分區。本文在接下來的討論沿用此分區與名詞，由生產者與贊助者集團的角度切入，重新檢視鄴城對周圍地區的整合。雖然文化交流為雙向，但以下以其他地區對鄴城風尚的吸取為重點。

首先是包含陶俑在內的墓葬相關物質文化。楊氏檢視墓室結構、壁畫佈局與內容、隨葬品組合與主要隨葬品形制，認為上述四區的發展以560年左右為界，之前地域特徵明顯，之後各地普遍吸取以鄴城為中心的京畿地區元素，物質面貌漸趨一致。鄴城地區的陶俑造型和組合在席捲全境。在冀定滄幽地區與青齊地區都能找到和鄴城陶俑造型一模一樣，或者以鄴城造型為基礎加以變化的例子。^{⑪⑦} 另外，鄴城地區墓葬壁畫的主題、圖像、組合、布局也在周圍地區受到歡迎。楊泓歸納鄴城地區墓葬壁畫特徵如下：墓道兩側壁畫最前端分別為面向墓外的青龍和白虎，襯以流雲、忍冬，有時有鳳鳥和神獸，中段繪出行儀仗，有時有廊屋列戟，墓道地面有蓮花忍冬等圖案，可能模擬地毯；墓門上方繪有正面朱雀兩側有神獸，門側多有著甲門吏；甬道側壁為侍衛人像；墓室壁畫按傳統做法在正壁繪端坐的墓主像，旁列侍衛，側壁為牛車或男女侍僕，墓頂為天像圖，其下墓壁上欄繪四神圖像。鄭岩稱這些特徵為「鄴城規制」，且進一步指出將墓道壁畫繪成大場面的鹵簿儀仗，使整幅墓道壁畫像幅長卷的「長卷式」壁畫是鄴城創發，代表例子包含河北磁縣茹茹公主墓（圖53）和灣漳壁畫墓，之後受到其他地區歡迎，在并州地區（圖54）和青齊地區都能見到，並發展出地方特色。^{⑪⑧}

⑪⑥ 楊效俊，〈東魏、北齊墓葬的考古學研究〉，頁79-83。

⑪⑦ 小林仁著，李娜譯，〈中國北齊隨葬陶俑兩大樣式的形成及其意義〉，頁44。八木春生，〈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陶俑〉，頁72、75。劉瑋琦，〈試論東魏北齊時期官方樣式——鄴城與晉陽隨葬俑的特徵研究〉，頁17。

⑪⑧ 鄭岩，〈《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增訂版）》〉（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頁173-188。鄭岩，〈論「鄴城規制」——論漢唐之間墓葬壁畫的一個接點〉，收於鄭岩，〈逝者的面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313-336。

許多和喪葬關係淡薄的工藝藝術也和墓葬文化呈現出相同趨勢：以鄴城為中心的地區和其他地區不斷整合，風潮流行的範圍擴大。以下就和陶俑相關的媒材進行討論，首先是和陶俑同靠搏泥幻化的陶瓷器皿，再來是和陶俑同以雕刻技術為靈魂的佛像。

北魏末年開始對淺色陶瓷的追求在東魏北齊鄴城地區更上一層樓。^{①⑨} 趙明度夫婦墓（537—）的淡綠釉覆蓮四繫罐（圖55）、灣漳壁畫墓的淡黃釉短頸罐（圖56）、范粹墓（575）的覆蓮四繫罐等都是一時之選。^{①⑩} 森達也認為對色調明亮之陶瓷的追求是受到對金銀器、玻璃或者響銅等材質的喜愛推動的。^{①⑪} 除了追求淡色，還追求在淺色底上展現釉彩流淌意趣的作品。^{①⑫} 鄴城地區的著名例子有安陽范粹墓的白釉綠彩長頸瓶與覆蓮三繫罐（圖57）、安陽賈進墓（572）的二彩唾壺（圖58）和短頸罐，河南濮陽李雲墓（576）和李亨墓（576）也出土掛彩釉的作品。^{①⑬} 掛彩釉的淺色鉛釉陶也在并州地區發現，今太原婁睿墓（570）就出土一件二彩盃（圖59）。^{①⑭} 其產地尚待確認，但不論產

①⑨ 森達也著，王淑津譯，〈白釉陶與白瓷的出現年代〉，《中國古陶瓷研究》，15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80-86。小林仁，〈北齊鉛釉陶的定位和意義〉，《故宮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5期，頁106-108。小林仁著，陳馨譯，〈白瓷的誕生——北朝瓷器生產的諸問題與安陽隋張盛墓出土的白瓷俑〉，《中國古陶瓷研究》，15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頁72。

①⑩ 河南省文物局，〈安陽北朝墓葬〉，頁44-45、彩版52-56。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頁138、彩版33。河南省博物館，〈河南安陽北齊范粹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1期，頁49、57。

①⑪ 森達也，〈論南北朝華北陶瓷的革新〉，收入張慶捷、李書吉、李鋼編，〈4-6世紀的北中國與歐亞大陸〉（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330。

①⑫ 謝明良比較器形和裝飾手法後認為這種流行來自南方青瓷的褐斑裝飾的啟發，北方陶工以自己熟悉的鉛釉技術仿造南方陶工點釉，但鉛釉流淌暈散的特性帶出另一番意趣。謝明良，〈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頁78。

①⑬ 河南省文物局，〈安陽北朝墓葬〉，頁53-54、彩版62。周到，〈河南濮陽北齊李雲墓出土的瓷器和墓誌〉，《考古》，1964年第9期，頁482、圖版10。濮陽市文物保護管理所、濮陽縣文物管理所，〈河南省濮陽縣這河寨北齊李亨墓發掘簡報〉，《考古》，2017年第4期，頁24-25、圖版。河南省博物館，〈河南安陽北齊范粹墓發掘簡報〉，頁49、57。

①⑭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齊東安王婁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133-134、彩版137。

地為何，仍顯示以彩釉為裝飾產品在以浮雕貼花裝飾主流的并州地區也有使用者。

鄴城地區產品多來自在地窯區。目前在東魏北齊鄴南城遺址附近發現多個窯區。^⑫其中，2009年春夏，王建保於鄴南城東北、曹村村北漳河河道內的曹村窯址採集到與范粹墓出土白釉杯、白釉綠彩覆蓮三繫罐以及講武城北齊墓出土白釉二彩覆蓮四繫罐等出土品胎釉特徵相似的破片（圖60-61）。^⑬可見曹村窯可能也生產多彩鉛釉產品。2015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鄴南城宮城東牆外約200公尺處發現鄴南城倪辛莊窯址，採集到不少窯具以及胎釉種類多樣且來自不同器形的器皿標本。其中最大宗的是瓷胎鉛釉，多為白胎帶淡青黃釉，不少標本可以對應到東魏北齊鄴城地區的墓葬中的出土品。^⑭

曹村窯的發掘顯示鄴城地區在陶瓷發展的活力始於東魏。2009年12月—2010年1月時對曹村窯進行發掘。考古報告說明在勘探區YJ2距地表1-1.3公尺處清出一座饅頭窯底部，也在同探方地表下1.3公尺處發現灰坑一座。探方出土陶瓷大量無釉陶器皿與瓦當、釉陶和釉瓷、窯具。^⑮器皿類的釉色包含青釉、黑釉、醬褐釉，器形有碗、瓶、罐、高足盤等，產品多樣。學者對窯址標本和東魏堯趙氏墓和北齊高潤墓等紀年墓的出土品進行化學與物理分析，結果顯示胎色、釉料、配方等接近，發掘者因此認為曹村窯年代上限可達東魏。^⑯

曹村窯對周圍窯場的影響力也值得注意，尤其與邢窯的交流。邢窯位於今河北省邢台，位置和曹村窯一樣使用三叉支釘，且胎釉成分顯示曹村窯和邢窯有深層技術上的交流。張茂林等人以能量色散X色線螢光法比對曹村窯和邢窯的黃綠釉標本的胎釉成分，發現在曹村窯取得的10片標本均為鉛釉，從邢窯取

⑫ 黃信，〈河北鄴城地區陶瓷窯址調查報告〉，《文物世界》，2018年第1期，頁45-53。

⑬ 王建保、張志忠、李融武、李國霞，〈河北臨漳縣曹村窯址考察報告〉，《華夏考古》，2014年第1期，頁27、彩版6。

⑭ 黃信，〈河北臨漳縣鄴南城倪辛莊窯址調查報告〉，《文物春秋》，2018年第2期，頁30-38。

⑮ 李江，〈河北臨漳曹村窯址初探與試掘簡報〉，《中國古陶瓷研究》，16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48-51。

⑯ 李江，〈河北臨漳曹村窯址初探與試掘簡報〉，頁51-52。

得的5片標本中2片為鉛釉，另外3片則是以氧化鈣為助熔劑的青瓷。^{⑬⑩} 兩地鉛釉標本的釉料成分相似。胎土方面，曹村窯標本胎土成分一致性高，顯示其胎土配方穩定，邢窯胎土多樣性高，但有一片青瓷和一片鉛釉與曹村窯標本相似。研究者認為邢窯胎土的多樣性顯示其早期發展經歷摸索階段，而兩者鉛釉標本在胎釉成分上的相似性除了來自兩者地緣和自然條件接近，更來自兩者間的技術交流。^{⑬⑪} 邢窯在北齊滅於北周後持續發展，在隋代成為重要白瓷產地，學者認為有不少產品流入隋長安地區。^{⑬⑫}

除了在陶瓷發展上頗具影響力，在佛教造像上也居領軍地位。鄴城周圍現存的石窟就有位於鄴城遺址西北，今邯鄲市峰峰礦區的南、北響堂山石窟、水浴寺石窟、涉縣娲皇宮石窟；遺址西南的安陽靈泉寺大住聖窟、大留聖窟、小南海石窟，林州洪谷寺石窟及鶴壁五岩山石窟和衛輝香泉寺石窟等。當中不乏北齊皇室與顯貴的供養。唐仲明比較山東境內出土佛像和鄴城響堂山造像，認為青齊地區吸取不少鄴城特色，例如考量兩地特定特徵出現的時代、頻率與重要性後，認為青州佛像以佛塔裝飾佛像背光頂部正中的做法以及此佛塔圖樣取自鄴城。^{⑬⑬}

另外，在白石造像方面，所謂「定州系」白石像多發現於北魏以來的交通要衝，東魏北齊定都鄴城後帶來達官顯貴以及發達的交通線，使鄴城地區以都城之姿興起為白石像的新中心。^{⑬⑭} 其中，使用多層透雕技法的「龍樹背龕式」

⑬⑩ 張茂林、王建保、李其江、吳軍明，〈河北臨漳曹村窯與內丘邢窯陶瓷器的胎釉組成對比分析〉，《中國陶瓷》，2013年第2期，頁57-59。

⑬⑪ 張茂林、王建保、李其江、吳軍明，〈河北臨漳曹村窯與內丘邢窯陶瓷器的胎釉組成對比分析〉，頁59。

⑬⑫ 小林仁，〈白瓷的誕生——北朝瓷器生產的諸問題與安陽隋張盛墓出土的白瓷俑〉，頁74。

⑬⑬ 唐仲明，〈青州造像所見佛塔之樣式、淵源與功能初探〉，《中原文物》，2007年第4期，頁81-86。唐仲明，〈東魏北齊響堂與青州造像比較研究〉，《華夏考古》，2013年第4期，頁102。

⑬⑭ 徐男英，〈河北出土北朝期白玉像考〉，收於濱田瑞美編，《アジア仏教美術論集：東アジアⅠ：後漢、三国、南北朝》（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2017），頁377-378。感謝匿名審查者教示此筆資料。

造像在鄴城和今河北曲陽之間的蠡縣、藁城、邢台等地以及鄴城以南，今河南新鄉的時代華庭遺址都有出土。^⑬ 鄴城地區的技法也受周圍地區歡迎，且可能以工匠為傳播媒介。^⑭ 另外，今山西太原華塔村也有發現「龍樹背龕式」造像，雖然材質為砂岩，但是以透雕技法製作，鄴城工匠的活動範圍可能不限於鄴城。^⑮

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東魏北齊鄴城地區的和和其他地區的互動。除了東魏北齊境內，許多元素超越政權邊界，受到西魏北周治下長安地區的青睞。此外，鄴城地區傳統的活力並未因北齊覆滅與鄴城兩度毀城而停止。正如《隋書·地理志》記載的：「魏郡，鄴都所在，浮巧成俗，彫刻之工，特云精妙，士女被服，咸以奢麗相高，其性所尚習，得京、洛之風矣。」^⑯ 今河北省南部邯鄲市以南到河南省北部安陽市一帶到隋代仍多有創發並且不斷引領風潮，甚至如第五章所述，隨著隋代各樣建設開展，人員物力流通範圍更大，其風潮的流行範圍也擴大。

2. 廣納百川的長安地區

如前所述，長安地區積極吸取鄴城傳統陶俑。但長安地區對鄴城地區特色的吸納並非隋代才開始，且長安地區吸納的也不只是鄴城的地區特色，長安對鄴城陶俑的吸納僅僅是這股洪流中的一波。

西魏北周長安地區釉陶數量有限，墓葬出土的陶瓷以無釉陶為主。流行於

⑬ 何利群，〈北齊「龍樹背龕式」造像的技術傳承和構圖特徵〉，《中原文物》，2017年第4期，頁74。程紀中，〈河北藁城縣發現一批北齊石造像〉，《考古》，1980年第3期，頁242-245、圖版6、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處、南宮市文物保管所，〈河北南宮後底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12年第1期，頁22、2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鄉時代華庭遺址H37發掘簡報〉，《華夏考古》，2016年第3期，頁39-40、封面2。

⑭ 何利群，〈鄴城地區佛教造像的發現及相關問題的探索〉，《華夏考古》，2015年第3期，頁92。

⑮ 解廷琦，〈太原市郊古墓、古寺廟遺址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955年第4期，頁57、圖版12。

⑯ (唐)魏徵等，《隋書》，卷30，頁860。

鄴城地區的器形和對淺色釉都能在長安地區看到。咸陽王士良夫婦墓出土了分布集中於鄴城地區的覆蓮紋繫罐（圖62）。此繫罐和濮陽李亨墓（圖63）的在外型上尤其相似，且均有雙股繫、並以細線陰刻表現蓮瓣。類似器物還出土於講武城北齊墓、安陽范粹墓與濮陽李雲墓，均在鄴城和其相鄰地區。^⑬王士良曾仕於北齊，之後在戰爭中投降北周。由於仕於北齊，王士良夫婦對北齊首都的鄴城的流行應該不陌生。王士良夫婦墓出土的四繫罐顯示鄴城地區流行的陶瓷器皿造型，可能經由移民帶進長安地區。^⑭乙弗虬與席氏夫婦（555/586）分別葬於西魏和隋，其墓出土一件淡綠色鉛釉碗（M4：6），帶有低平餅足，足底有釉且刻「明朗」兩字（圖64）。^⑮雖然產地不知，但這樣造型的碗在西安咸陽的西魏北周墓葬幾乎不見，但常見於鄴城地區和冀定滄幽地區東魏到隋代墓葬中，在河南安陽第九標段墓中甚至出現無釉陶的版本（圖65）。^⑯

在墓主們入葬時間都在隋代的墓葬中，釉陶瓷器更為常見，許多甚至可能輸入自鄴城與周圍地區。其中，白瓷尤其受歡迎。目前學者多認為白瓷的發明不晚於六世紀末的隋代，且發源於河南安陽相州窯到河北邢台邢窯一帶的窯場。^⑰長安隋墓出土的白瓷可能都來自這區。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蘇統師墓更出土透影白瓷杯（圖66），學者目前普遍認為是邢窯產品。^⑱其他著名的還有李靜訓墓出土的白瓷雞首壺和雙身龍柄壺，姬威墓出土的白瓷罐，也可能來自與鄴城曹村窯關係密切的今河南河北省窯場。上述例子顯示鄴城地區風尚透過人與物的流動從北朝末便持續輸入長安地區。小林仁也指出隋長安地區墓葬出土不少造型和技術與北齊鄴城地區相關的鉛釉器，然而胎體為紅陶。^⑲這些產

^⑬ 王建保、張志忠、李融武、李國霞，〈河北臨漳縣曹村窯址考察報告〉，頁27、彩版7。

^⑭ （唐）李百藥等，《北齊書》，卷7（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93。（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5（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70。

^⑮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安西魏乙弗虬及夫人隋代席氏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0年第1期，頁42、44。

^⑯ 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隋墓發掘報告〉，頁386。

^⑰ 小林仁，〈白瓷的誕生——北朝瓷器生產的諸問題與安陽隋張盛墓出土的白瓷俑〉，頁71-72。

^⑱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隋蘇統師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3期，頁4、圖版1。

^⑲ 小林仁，〈北齊鉛釉陶的定位和意義〉，頁110。

品的胎釉成分仍待未來分析。但如若此紅陶胎體為陝西當地黃土但釉料成分和鄴城地區產品相似，則可成為鄴城地區陶匠移入長安地區的例證。

佛像方面，西魏北周的長安地區佛像在材質和形制選擇上也受鄴城地區到冀定滄幽地區的佛像帶動，尤其是對白石佛像的喜好。北魏以來，長安佛教造像以沈積砂岩為主，到西魏時青石（石灰岩）漸受歡迎，到北周時多為青石，甚至有白石造像，如草灘李家街村出土的17尊佛龕像。^{④⑥}北周長安地區對白石的喜好應是來自東邊。河北曲陽出土的北齊天保二年（551）〈蘇老虎等造觀音像〉足以支持這點，題記為：「天保二年七月廿九日馬□村西來客雍州京兆郡頁成縣蘇老虎咸陽郡寧夷縣駱总明張慶玠韓瓮生十三人等造白玉觀世音像一區……」。^{④⑦}北齊天保二年仍為西魏時期，這尊像說明白石佛像風潮為長安地區的人嚮往。值得注意的是，西安博物館藏的北周保定二年（562）白石背屏造像和今河北出土白石佛像在石材選擇和佈局上相似。背屏式佛像在長安並不流行，基座上的雙獅與香爐也是鄴城地區與冀定滄幽地區的石佛像上常見，但在長安地區少見的紋飾。^{④⑧}這些紋飾和形制可能伴隨著對白石風尚的吸取而一併採用。

1992年西安市北郊漢城鄉西查村出土的三尊白石菩薩立像也間接支持白石造像風尚為東來。^{④⑨}此像和四川造像在造型上有相似之處，但學者認為此三尊像為西安作品，並對其中兩尊進行科學分析，結果表明石材屬於方解石礦物，與河北北京一帶的白雲石大理石不同，而與四川雅安寶興的方解石大理石成分

④⑥ 保全，〈西安文管所藏北朝白石造像和隋鎏金銅像〉，《文物》，1979年第3期，頁83-85。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西安北郊出土北朝佛教造像〉，《文博》，1998年第2期，頁21-22、封面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古都遺珍——長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頁95。

④⑦ 筆者依書中拓本與簡體錄文，將「張慶珍」修訂為「張慶玠」。馮賀軍，〈曲陽白石造像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頁174。

④⑧ 于春，〈長安地區北朝佛教造像考古學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博士論文，2015），頁107、141-143。

④⑨ 西安市文物局，〈西安北郊出土北周白石觀音造像〉，《文物》，1997年第11期，頁78-79。

接近。^⑮ 報告將造像年代定為北周，而現存四川地區的南北朝單體造像以砂岩為主，偶有青石，但未見白大理石。^⑯ 四川單體造像集中出土於成都，茂縣、汶川、廣元也有出土，這些地區或者位於雅安寶興附近，或者位於通往關中地區的交通要道上，因此，這些地區取得雅安白石較長安地區容易，但至今罕見。可見以白石造像並非四川一帶在南北朝的風尚，這也進一步支持長安地區白石風尚來自鄴城一帶與冀定滄幽地區。另外，八木春生提出這三尊白石菩薩像可能造於隋代，這是在白石風尚傳入長安地區之後。^⑰ 至於是否在長安對白石的需求增加之後開始向四川在內的其他地區取得白石，則有待日後研究。

除了鄴城地區，長安工匠與贊助者對東魏北齊的其他區域特色也有吸納。學者注意到有種頭戴卷沿帽且身上佈滿搖葉的騎馬俑目前僅在晉陽北齊墓中出現，但在長安隋墓經常可見，如李和墓（582）、呂武夫婦墓（592）、羅達墓（596）及潼關稅村壁畫墓（圖67）。^⑱ 山西地區的釉陶器形也在長安受到喜愛，例如帶龍柄的雞頭壺。^⑲ 在公佈的墓葬資料中，鄴城出土的例子僅見於高潤墓，但在晉陽的許多墓都能發現，其中，徐顯秀墓（571）甚至出土七把雞頭壺，可見其在晉陽的重要性（圖68）。^⑳ 這種器形也見於隋代的長安地區，李

^⑮ 趙希利、賈曉燕、徐諾、趙鳳燕，〈西安出土兩尊北周漢白玉觀世音像無損分析〉，《考古與文物》，2017年第5期，頁142-143。感謝匿名審查者教示此筆資料。

^⑯ 八木春生，《中国仏教造像の变容：南北朝後期および隋時代》（京都：法藏館，2013），頁316。

^⑰ 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博物館，《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華書局，2013），頁3-10。2013年後的發現可見2014年成都下同仁路造像坑，其中出土北周天和三年觀世音菩薩像，見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下同仁路遺址南朝至唐代佛教造像坑〉，《考古》，2016年第6期，頁59-61。

^⑱ 小林仁，〈隋俑考〉，頁348。

^⑲ 關於南北朝雞頭壺造型差異以及與隋代雞頭壺的關係，見謝明良，〈雞頭壺的變遷——兼談兩廣地區兩座西晉紀年墓的時代問題〉，《六朝陶瓷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2006），頁325-355。

^⑳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北齊高潤墓〉，《考古》，1979年第3期，頁24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徐顯秀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0期，頁14。

靜訓墓（圖69）和李裕墓都有出土。^⑮雖然產地仍待研究，但仍可見長安地區的人對此器形並不陌生。佛像方面，八木春生注意到長安地區圓雕佛像的頭身比例以及菩薩像的瓔珞在隋代的改變。北周時期長安圓雕佛像往往頭大身小，進入隋代後漸趨協調，可能是吸取北齊舊地尤其是山東和河北等地的造像頭身比例。^⑯Angela Howard比較1992年西安郊區出土的觀音像和山東青州龍興寺造像，認為其比例和對人體的自然表現來自青州。^⑰楊效俊也認為西安出土北周大象二年立像吸取山東青州佛像對螺和人體的表現。^⑱

值得注意的是，西魏北周的長安對南方也多有採納，尤其是六世紀中便已併入西魏的江陵和四川地區。常青爬梳文獻後認為，從江陵北遷長安地區的人中有不少官員學者，當中應有不少佛教信徒會將造像帶入長安，被遷徙的梁人中可能也有不少工匠。^⑲此外，也有江陵向長安輸送造像成品的例子。^⑳許多學者注意到長安地區在西魏時突然出現許多成熟的圓雕造像。^㉑吳荭綜合考量長安圓雕佛立像的螺、袈裟形式和身材比例，認為長安圓雕佛立像造像許多特徵和四川的相似，可見大量增加是受四川影響，這些元素是因為四川併入西魏後因人員來往頻繁而帶進長安的。^㉒于春認為四川對長安的影響在西魏攻下四川前就有，北周時更為明顯，螺髮與手持寶珠在如來像上流行、帶連珠紋的光背數量增多、佛衣衣紋形式化等元素都和四川有關。^㉓常青認為長安可能吸取

⑮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隋李裕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第7期，頁1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13。

⑯ 八木春生著，李梅譯，〈隋代菩薩立像衣著飾物〉，頁9。

⑰ Angela Howard, "From Han to Tang: The Acculturation of Buddhist Images in China," *Oriental Art*, vol. 35, no. 7 (2004.10), pp. 54-55.

⑱ 楊效俊，〈淺談隋代長安佛教造像風格的多樣性與融合性——以紀年石造像為中心〉，收於山東博物館編，《齊魯文物》，第1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2），頁116。

⑲ 常青，〈北周長安佛教藝術模式及其源流〉，《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9期（2020.9），頁39-40。

⑳ 常青，〈北周長安佛教藝術模式及其源流〉，頁41。

㉑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古都遺珍——長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頁96。

㉒ 吳荭，〈北周圓雕佛造像及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2008年第1期，頁96-98。

㉓ 于春，〈蜀道的兩端——南北朝隋唐時期長安與蜀地的佛教藝術交流〉，《西部考古》，17輯（2019），頁270-272。

四川地區造像題材；此外，比較北周長安地區和成都萬佛寺造像，發現個別造像有共通點，例如螺髻、肉髻低平、五官集中、臉圓胖，連身型和瓔珞結構也能找到相似的例子。^{①⑤} 八木春生發現隋代西安造像吸取四川菩薩像的瓔珞樣式與下垂至膝下的特點。^{①⑥} 可見隋代長安除了吸取北齊舊地的元素，也持續吸取四川元素。

同為石刻但使用於墓葬的石棺上也能見到四川元素。林聖智指出康業墓圍屏上出現一種類似灌木樹叢的特殊造型。樹冠呈帶弧型鋸齒的傘狀，當中填滿水平排列的小傘形葉片，呈現鱗片狀紋理。^{①⑦} 康業墓圍屏上的大部分元素能在北魏洛陽地區的石棺找到源頭，但這種鱗片狀樹葉未見於北魏，而是普遍使用於四川地區出土的南朝造像。除了個別圖像，康業墓複雜的山水空間表現可能也源自四川地區。在製作石棺的過程中作為粟特首領的康業一族曾經介入，挪用元素可能和粟特人在四川與長安間的活動有關。^{①⑧}

綜上所述，包含長安在內的各區域對鄴城地區工藝和藝術的吸取從東魏北齊就非常顯著，並非由隋代開始。除了因為鄴城地區工藝藝術的成就突出，也因為長安自北魏以來缺乏主流樣式的特性。在北魏分裂為東西魏前夕，洛陽城是北方的工藝藝術中心，例如永寧寺泥塑到今天仍為人讚嘆。534年北魏分裂前後洛陽大量人口遷移至鄴，當中不乏作為工匠與作為工匠贊助者的達官顯貴工匠。除了建立在洛陽既有的基礎上，佔據黃河下游大片沃土帶來的經濟優勢也助長鄴城工藝藝術的發展。此外，鄴城作為東魏北齊京畿，皇室、達官顯貴聚集，不斷吸納周圍物質文化與資源，也不斷創新，成為引領風尚之地。而相對發達的交通線也有助於傳播鄴城風尚。相對於鄴城，北魏晚期的長安雖與首都洛陽互動頻繁，卻未能像鄴城一樣大規模移植洛陽資源後在既有的主流風格上發展。相對的，西魏北周長安地區延續北魏以來多元並立的局勢。這種缺乏強

①⑤ 常青，〈北周長安佛教藝術模式及其源流〉，頁42-43。

①⑥ 八木春生著，〈隋代菩薩立像衣著飾物〉，頁7-8。

①⑦ 林聖智，〈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臺北：臺大出版社，2019），頁299-301、306-307。

①⑧ 林聖智，〈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頁300-301、306-307

勢主流樣式的多元性使長安地區廣納百川。^{①⑥}除了鄴城，其他區域樣式也在吸納之列。在這些交流中物品和人員移動顯然扮演重要角色。

政權對峙未能完全限制物品和人員流動，但各區域納入同一政權後更有利於人與物的交流和接觸。正如上述以長安對四川元素吸納為例，長安地區在四川仍屬南梁時便吸納了四川的圓雕佛像，西魏納入四川為領地後圓雕佛像的數量激增，北周後四川對長安的影響更是明顯，除了佛教造像，墓葬石刻吸納四川元素。^{①⑦}也就是說從佔領四川到控制當地取得資源、促進交流，再到四川元素流行於作為政經中樞的長安，中間是需要時間的。六世紀下半北周到隋的長安和其他地區的交流也是循此基本模式，但北周將版圖擴張到整個華北加上隋代對長安和北齊舊地的持續經營，使長安地區觸及的地理範圍擴大、區域文化更多元，交流面向更複雜、層次也更深入。這項趨勢到隋代更加明顯。

四、隋帝國的區域交流與陶俑發展

六世紀七〇年代北周急攻北齊，在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統領下在短時間內吞併包含多個文化區的北齊。北周於577年滅北齊後不久北周武帝崩，作為外戚的楊堅掌權，並在581年建立隋代，更於589年滅陳，將南方納入版圖。為了讓朝廷權力貫徹到新領地，北周與隋兩代採取許多措施，包含統一度量衡與幣制、招納人才與徙民、建設水陸交通。許多以往難以接觸的物質與人力資源突然湧入作為京畿地區的長安地區，不斷交會與搏成，作為權力中樞的長安也不斷向外輸出既有資源。這些舉措也讓各區域文化之間有更多機會碰撞、創新，開啟區域互動的新一頁。

①⑥ 常青觀察關中地區佛像後認為北周以前風格多元，因為當地佛教信眾審美多元且對多種雕刻風格自由選擇。常青，〈試論北魏關中地區佛教造像的地方風格〉，《故宮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3期，頁31-46。

①⑦ 吳荭，〈北周圓雕佛造像及相關問題〉，頁96-98。于春，〈蜀道的兩端——南北朝隋唐時期長安與蜀地的佛教藝術交流〉，頁270-272。

（一）政權擴張下的建設與交流

北周到隋，原本秘藏於北齊鄴城和南陳建康等中樞地區的秘密都轉移到作為北周中樞地區長安。北周武帝在滅北齊後將北齊皇室擄至長安，「列齊主於前，其王公等並從，車轡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北齊的車轡旗幟及器物想必讓北周朝野大開眼界。隋平定南陳後也得到不少器物，例如劉宋元嘉年間所造，後來流入陳朝的天文器具。^{①⑦}除了器物，還有圖籍。《隋書·經籍志》記載「周武平齊，先封書府」。這些珍藏於北齊書府的圖書也被運到長安地區。不只秘藏典籍，連秘藏人才都流入長安。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記載天下號為畫聖的北齊畫家楊子華深受北齊武成帝高湛器重，「使居禁中」、「非有詔不得與外人畫」。^{①⑧}因此北齊覆滅前長安地區不容易得到楊子華的作品，但隋代時楊子華可能也來到長安。根據《貞觀公私畫史》，隋長安永福寺的壁畫就出於楊子華之手。唐《歷代帝王圖》的作者閻立本就稱讚：「自像人已來，曲盡其妙，簡易標美，多不可減，少不可逾。其唯子華乎！」。可見楊子華與其作品在隋代以及之後的唐代菁英之間都發揮影響力。若非北齊滅亡，這些秘藏於北齊的工藝品、書籍與人才不容易為以長安為主要活動中心的人們取得。

隋代還將搜訪範圍擴大到北齊鄴城與南陳建康的非中樞地區。隋文帝在開皇三年（583）按祕書監牛弘的意見，「分遣使人，搜訪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匹，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間異書，往往間出」。^{①⑨}煬帝時設洛陽為東都，「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蹟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在朝廷鼓勵下藏於民間各地的典籍流入長安地區以及後來建設為隋東都的洛陽。^{①⑩}在隋代建立後，不少

①⑦ 「宋元嘉所造儀象器，開皇九年平陳後，並入長安。大業初，移於東都觀象殿。」（唐）魏徵等，《隋書》，卷19，頁520。

①⑧ （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頁156。

①⑨ （唐）魏徵等，《隋書》，卷32，頁908。

①⑩ 各國可能在交聘過程中借書籍。如隋書記載「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祕府之中，稍以充實。」北魏孝文帝曾向南齊借書抄錄。北周與北齊之間可能也有類似情形，但將北齊書府的書搬到長安，能接觸到的典籍更多。見（唐）魏徵等，《隋書》，卷32，頁907。

這讓北周與隋的關隴集團統治精英得以接觸到以往接觸不到的秘藏書畫典籍，也使以往秘藏的書畫典籍。人才也是。北周武帝從577年便屢次要求北齊舊地的山東各州舉送人才。^{①75} 隋文帝更在587年創貢士制度，設秀才、明經、賓貢三科，煬帝在607年進一步把賓貢分為進士和俊士兩科。這樣以考試取士的制度讓士人不需要透過地方長官推薦就能得到躋身朝堂的機會，加速各地人才流動。^{①76} 北齊舊地士人藉由各樣取士制度得以流動，不僅帶來新一波知識與思想上的碰撞，這些身為各地藝術工藝贊助者的士人也成為區域風格傳遞的媒介。

除了菁英階層的交流，北周和隋的新建設與政策更促進其他階層的人力物力流動。北周武帝滅齊後當年統一度量衡。^{①77} 隋文帝登基後統一貨幣。發行隋五銖錢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要以統一的貨幣終止北周的五行大布、永通萬國以及齊常平五銖並行的局面。正如秦始皇當年的措施，統一度量衡與貨幣使貨暢其流。還有各項交通建設。隋文帝於584年建廣通渠連接大興城東到潼關，以利各州糧食集運至長安地區。煬帝增開由黃河連接汴水到淮水的通濟渠、由淮水連接長江的邗溝、由長江到錢塘江的江南河，運河形成的交通網使突破自然條件的限制，人流與物流的南北通暢程度遠超前代。

除了建設成果，建設本身就造成人口移動。605年開通濟渠時「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①78} 608年開永濟渠時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都使大量役丁和工匠聚集。隋文帝於582年建大興城時徵發範圍更大「徵天下工匠」使「纖微之巧，無不畢集」，^{①79} 而煬帝營建東都洛陽時想必也是如此。除了工匠本身，這些工匠背後的工藝傳統也在建設現場交會。唐長孺引《隋書·食貨志》說明，隋代沿用北周舊制的「伎作戶」，工匠採輪番制，輪流負擔朝廷派發的繇

^{①75} 「己丑，詔山東諸州舉有才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赴行在所，共論治政得失。」(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6，頁103。

^{①76} 高明士、邱添生、何永成、甘懷真，《隋唐五代史（增訂本）》（臺北：里仁書局，2006），頁46。

^{①77} 「議定權衡度量，頒於天下。其不依新式者，悉迫停。」(唐)令狐德棻等，《周書》，卷6，頁103。

^{①78} (唐)魏徵等，《隋書》，卷3，頁63。

^{①79} (唐)魏徵等，《隋書》，卷42，頁1259。

役。除了番役制度，朝廷也雇傭工匠作為補充。也就是說工匠除了為官營作坊服役，也有時間為私營生計，這使工匠手藝得以讓更多人接觸，促進交流。^{⑧〇}

除了作為工藝品生產者的工匠，作為工藝贊助者的富貴之家也大量移動。煬帝建設洛陽城時「徙洛州郭內人及天下諸州富商大賈數萬家，以實之」。^{⑧一}這樣大規模的徙民從北周到隋層出不窮。這些工藝贊助者將本身文化和喜好帶到新住地促進交流創新。

（二）隋代各地墓俑的創新

北朝末到隋一連串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動盪打破既有範式，戰亂和大規模建設促使人與物的流通，激盪出新的火花。不僅長安地區陶俑發生轉變，其他地區也是。

河南河北一帶的隋墓顯示，陶俑一方面延續北齊鄴城傳統，一方面出現不少影響深遠的創新。當中最為人知的是白瓷俑的創燒。張盛墓出土的白瓷黑彩俑，共有兩件鎮墓武士、兩件鎮墓獸與兩件門吏俑（圖70-75）。^{⑧二}1936年發掘的YM243出土的兩件瓷胎門吏俑胎體潔白，雖然釉色泛青，但已經接近白瓷（圖76-77）。^{⑧三}除了白瓷也有其他瓷胎俑，如安陽置度村八號墓的青瓷女俑（圖78），^{⑧四}以及橋村的素燒瓷胎俑。^{⑧五}這些俑可能來自安陽相州窯，或者其

⑧〇 唐長孺，〈魏晉至唐官府作場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頁58-59。《隋書·食貨志》記「及〔隋文帝〕受禪，又遷都，發山東丁，毀造宮室。仍依周制，役丁為十二番，匠則六番。」（唐）魏徵等，《隋書》，卷24，頁680。

⑧一 （唐）魏徵等，《隋書》，卷24，頁686。相州人移至洛州的墓誌實例見徐斐宏，〈洛陽唐初黃釉俑試探——兼論洛陽唐初墓葬文化之淵源〉，《中原文物》，2019年第2期，頁106。

⑧二 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安陽隋張盛墓發掘記〉，《考古》，1959年第10期，頁541、圖版9。

⑧三 石璋如，《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附錄一：隋唐墓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5），頁398。

⑧四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市置度村八號隋墓發掘簡報〉，《考古》，2010年第4期，頁48-57、圖版拾至拾參。

⑧五 安陽市文物工作隊，〈河南安陽市兩座隋墓發掘報告〉，《考古》，1992年第1期，頁43、圖版貳。

他河北南部與河南北部的窯場。^⑩小林仁認為這些隋代瓷胎俑是唐代黃釉加彩俑與三彩俑的先驅。^⑪張盛墓鎮墓武士俑與鎮墓獸的造型也支持瓷胎俑和唐代黃釉加彩俑的連結。^⑫

選用延展性好的胎土有助於陶俑造型的創新。安陽張盛墓與置度村八號墓出土的女俑上都能見到陶工以搓成細長條的泥條彎曲來表現女俑手臂（圖78-79）。這種表現方式可能得力於延展性好的胎土。這種對女俑柔美線條的強調是隋代的新發展，在安徽亳州和江蘇徐州隋俑都能見到。三地位置相近，又都在通濟渠沿線，這種女俑隨著交通建設促進的人口移動傳播。^⑬這種表現方式也一直延續到初唐的黃釉加彩俑上都能看到，例如洛陽賈敦頤墓出土的女舞俑（圖80）。^⑭這種表現手法可能也是由移民自安陽帶到作為黃釉俑重要生產中心的洛陽。^⑮

山西隋墓也同時顯示傳統的延續和工匠的新嘗試，最值得一提的是虞弘夫婦墓。虞弘葬於開皇十二年（592），學者根據墓誌殘文推測其夫人葬於開皇十八年（598），此墓同時出土白大理石、砂岩以及陶質俑。^⑯陶質俑是相當典型的北齊晉陽樣式。鎮墓武士碎片的護胸、肩部弧度以及左手按盾的角度（圖

⑩ 小林仁，〈白瓷的誕生——北朝瓷器生產的諸問題與安陽隋張盛墓出土的白瓷俑〉，頁73。申文喜，〈略論安陽隋墓出土的瓷俑〉，《安陽師範學院學報》，2011年第3期，頁62-63。

⑪ 小林仁著，劉晶晶譯，〈北齊鄴城地區的明器生產及其系譜——以陶俑和低溫鉛釉陶為中心〉，《中國古陶瓷研究》，16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516-522。

⑫ 小林仁，〈白瓷的誕生——北朝瓷器生產的諸問題與安陽隋張盛墓出土的白瓷俑〉，頁72。

⑬ 小林仁，〈隋俑考〉，頁354。

⑭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代洛州刺史賈敦頤墓的發掘〉，《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8期，頁40、49-50。

⑮ 小林仁著，劉晶晶譯，〈北齊鄴城地區的明器生產及其系譜——以陶俑和低溫鉛釉陶為中心〉，頁521。小林仁，〈白瓷的誕生——北朝瓷器生產的諸問題與安陽隋張盛墓出土的白瓷俑〉，頁77。小林仁著，劉晶晶譯，〈初唐黃釉加彩俑的特質與意義〉，收於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鞏義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11），頁349-359。徐斐宏，〈洛陽唐初黃釉俑試探——兼論洛陽唐初墓葬文化之淵源〉，頁106。

⑯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晉源區文物旅遊管理局，《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49-58。

81) 以及陶馬破片等均是太原北齊墓經常出土且沿用到隋代的造型(圖82)。虞弘夫婦墓的侍女以及手持鳳首壺的胡人侍從則為砂岩雕製(圖83)，雙髻侍女與胡人形象在俑群中雖不罕見，但以砂岩製作相當罕見。最特別的是還有白石雕成的門吏、伎樂以及拱手俑。其中，伎樂俑形象特殊(圖84)。北魏到初唐墓中伎樂俑多為坐姿，但虞弘墓的伎樂俑站立演奏，其圖像來源值得探索。此外，白石俑腳下均雕出圓錐形樺頭，插到同為白石雕刻而成的覆蓮座中。這種做法未見於墓俑，但常用於圓雕佛像。考慮到白石佛像從北朝到隋在包含山西太原的北方都受歡迎，在技術之外，對材質的選擇可能也受到佛像影響。

山東隋墓也新見石質俑，但為頭戴冠、雙手拄環首刀的大型門吏俑。目前見於濟南呂道貴墓(592)與嘉祥徐之范墓(584)。^⑩兩墓各出土一對門吏俑，高度在一公尺左右(圖85-88)。然而，東魏北齊以來河南與陝西地區發現的門吏俑均身著裋褠，山東隋墓出土的卻沒有，需考慮其他圖像源頭。^⑪首先是當地石刻與壁畫圖像，例如崔芬墓石門上的細線陰刻門吏就與上述兩墓出土的門吏相似(圖89)。^⑫另外，也可能吸取自江蘇徐州等地以南的圖像。^⑬

陝西隋墓顯示作為隋首都長安則開始流行複合媒材陶俑。柴暉墓與豐寧公主夫婦墓(圖90-91)均出土面部與髮型模印精緻，但身體製作粗糙且缺雙臂的女俑。^⑭這些女俑可能罩有貴重織品製成的外衣(如同阿斯塔納唐墓出土的實物)，因此身體製作並不講究，而雙臂根部各有一個圓孔，可能裝有木質或紙質手臂，除了便於套上織品衣物，也有利於工匠變化手臂姿勢，陶俑看來生

^⑩ 濟南市考古研究所，〈濟南隋代呂道貴兄弟墓〉，《文物》，2005年第1期，頁29、封3。嘉祥縣文物管理所，〈山東嘉祥英山二號隋墓清理簡報〉，《文物》，1987年第11期，頁57-60

^⑪ 大型門吏俑見於北朝灣漳壁畫墓，也見於安陽張盛墓、小屯YM243，但後兩者為瓷質。陝西三原李和墓和咸陽郁久閭可婆頭墓的大型門吏俑為陶質，雙手可能也拄有有機材質做成的環首刀，出土時已朽。

^⑫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朐縣博物館，〈山東臨朐北齊崔芬壁畫墓〉，頁8、10。

^⑬ 江蘇徐州陶俑中也有戴冠拄刀的俑類。韋正、喬蘇婷，〈論江蘇徐州地區南北朝墓葬中的陶俑〉，頁65-72。

^⑭ 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隋墓陶俑的演變〉，頁77。戴應新，〈隋豐寧公主與韋圓照合葬墓〉，《故宮文物月刊》，186期(1998)，頁82-83。

動活潑。有些俑甚至只有頭部是陶製，姬威墓與張綝夫婦墓（圖92）就出土幾件脖子以下做成圓錐狀的女陶俑頭，可能插在木質身體上。^{①98} 另外還有女騎馬俑，陶工將女頭頂刮出一個平面，在平面中央戳一個小洞以連接別的材質製成的冪、帷帽，西安李椿夫婦墓便出土這樣的俑（圖93）。^{①99} 上述綜合媒材俑在其他地區也能看到，如安陽張盛墓就出土陶靴與陶鞋（圖94）。^{②00} 這些樣式也沿用到初唐，例如段簡璧墓（651）出土陶鞋、陶靴（圖95-97），長樂公主墓（643）出土的頭頂鑽孔的仕女騎馬俑（圖98），段元哲墓（639）出土的身體與頭陶製但缺雙臂的俑（圖99）。^{②01}

上述例子顯示各地工匠在俑的種類、造型、材質上均有新意。有不少創新於隋唐之交消失在歷史舞台上，有些則歷經板蕩成為唐代陶俑的先驅。

結語

本文以區域交流的角度重新檢視北周到隋長安地區對鄴城陶俑傳統的吸收。除了考量陶俑的造型、製作手法以及鎮墓俑組合，還參考其他製造與使用脈絡與陶俑相關的藝術工藝，如陶瓷器皿和佛像等的變化，本文認為鄴城樣式的流行是北朝末到隋代人員與物品大量流動的結果之一，而這項趨勢從西魏北周便存在。

首先，本文認為鄴城樣式傳入長安地區的可能媒介為工匠和「樣」。基於陶俑製作手法以及鐵芯的使用技術的考量，筆者贊同先前學者對工匠移動的假說。不像鄴城與徐州兩地發現多例「同模」陶俑，西安地區出土的鄴城樣式陶

①98 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隋墓陶俑的演變〉，頁77。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西安長安隋張綝夫婦合葬墓發掘簡報〉，頁36。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郭家灘隋姬威墓清理簡報〉，《文物》，1959年第8期，頁4、封3。

①99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東郊隋李椿夫婦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3期，頁25-26。

②00 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安陽隋張盛墓發掘記〉，頁545。

②01 昭陵博物館，〈唐昭陵長樂公主墓〉，《文博》，1988年第3期，頁13、圖版2。昭陵博物館，〈唐昭陵段簡璧墓清理簡報〉，《文博》，1989年第6期，頁6、圖版3。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區隋唐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66），頁48、86、圖版19。

俑與其他地區的出土品有顯著差異，且這些地區特徵不是個案，而是普遍存在於西安地區出土的陶俑。再加上考量運輸成本以及工匠具有利用平面圖稿和立體模型製作範具的能力，因此認為這些「樣」的形式最有可能為平面圖稿或立體模型。

其次，本文重新檢視禮制制定與實踐過程，並由擴及與陶俑相關的藝術工藝品檢視長安地區吸取鄴城傳統的原因。結果顯示長安地區對鄴城地區特色的吸納並非隋代才開始，且長安地區吸納的也不只是鄴城的地區特色。

北齊鄴城地區作為北朝的時尚之都，各樣藝術工藝在各地受到歡迎，長安地區僅是吸納鄴城地區特色的地區之一。北齊北周對峙時期的政權邊界未完全阻隔物品與人員流動，隋代的各樣建設與政策更是增加人員與物品的流動數量、範圍與頻率。鄴城傳統的影響範圍得以擴大，作為隋首都的長安更由於大量工匠與士人從各地遷入，得以吸納各地特色。除了延續舊有傳統，各地均有創新。由此可說，鄴城樣式陶俑在西安地區的流行是工匠、士人等人員與物品大量流動的結果之一，而促成這種流動的是隋朝廷以中央集權政府之力整合各地資源與調派人力的各樣政策和建設。

整體而言隋代是俑類承先啟後的時代。隋代各地除了傳統樣式，也多有新意，不少創新沿用到唐代。這些創新來自區域交流、不同材料間的交流，還有陶俑形象與其他墓葬圖像的交流，以及佛像和陶俑這樣使用於喪葬的雕塑在製作技法與材質選擇上的交流。

然而，本文雖然將討論範疇擴及佛教造像，但僅聚焦於石刻，時代也限縮在北周到隋。其實北朝到隋唐有不少泥塑與陶製成的佛像和供養人像。其中，最受關注的是北魏洛陽永寧寺出土的泥塑。當中的供養人像和北魏洛陽陶俑在外型和製作技法上相似，和稍晚甘肅天水麥積山石窟的供養人像、韓半島扶餘百濟定林寺出土塑像在外型上也頗有可比之處。^⑩ 這些供養人泥塑的可移動性不如陶俑，但樣式傳播範圍更廣。此外，和大多數陶俑相比，供養人泥塑雖同為世俗形像，其傳播的原因和媒介可能與佛教造像有更高的重疊性。未來研究

^⑩ 謝明良，〈唐俑札記——想像製作情境〉，頁222-234。小林仁，〈洛陽北魏陶俑の成立とその展開〉，《美学美術史論集》，14輯（2002.3），頁237。

若由作坊、技術、使用脈絡與贊助者的角度切入，想必能進一步了解對喪葬與宗教中的泥塑圖像的挪用以及傳播模式，並開啟佛教和墓葬美術的新對話。

後記：

本文承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悉心指正，獲益良多，深表感謝。本著作寫作期間，獲得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特此致謝。

(責任編輯：陳卉秀)

表1：北齊鄴城地區紀年墓出土之鎮墓武士俑與鎮墓獸類型與數量

No.	墓主或墓葬編號	墓葬年代	盜擾	鎮墓武士俑類型 (*個數)	鎮墓獸類型 (*個數)	參考資料
1	元良d.553	553	盜擾	鄴城傳統2型 *2	鄴城傳統1型： 獸面*1	磁縣文物保管所，〈河北磁縣北齊元良墓〉，《考古》，1997年第3期，頁33-39。
2	堯峻 d.566/ 吐谷渾靜 媚 d.565/ 獨孤思男 d.571	567/567/ 571	盜擾	鄴城傳統1型 *1	鄴城傳統2型： 人面*1、獸面*1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陳村北齊堯峻墓〉，《文物》，1984年第4期，頁16-22。
3	和紹隆d. 568/ 元華d.573	568/573	盜擾	鄴城傳統1型 *4	鄴城傳統2型： 人面*2、獸面*2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陽縣文管會，〈安陽北齊和紹隆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頁8-16。
4	賈進d.571	572	完好	鄴城傳統1型 *2	鄴城傳統2型： 人面*1、獸面*1	河南省文物局，《安陽北朝墓葬》（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頁49-65。
5	賈實d.573	573	盜擾	鄴城傳統1型 *2	鄴城傳統2型： 人面*1、獸面*1	河南省文物局，《安陽北朝墓葬》，頁80-97。
6	范粹d.575	575	墓葬 塌頂 積水	鄴城傳統1型 *2	殘片	河南省博物館，〈河南安陽北齊范粹墓發掘簡報〉，《文物》，1972年第1期，頁47-57、86。
7	高潤d.575	576	盜擾	鄴城傳統1型 *2	鄴城傳統2型： 人面*1、獸面*1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北齊高潤墓〉，《考古》，1979年第3期，頁234-243。
8	灣漳壁畫， 推測為高 洋北齊 文宣帝陵 d.559	推測為 560	塌陷 、積 水	鄴城傳統1型 *4	鄴城傳統1型： 人面*2、獸面*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

No.	墓主或墓 葬編號	墓葬年代	盜擾	鎮墓武士俑類 型 (*個數)	鎮墓獸類型 (*個數)	參考資料
9	第九段標 段取土區 木場屯村 M99	574年 後，不 晚於隋 (出土 五行大 布)	盜擾	鄴城傳統1型 *1	鄴城傳統3型： 獸面*1；人面鎮 墓獸殘損過甚	河南省文物局，《安陽北朝 墓葬》，頁73-79。

表2：北周到隋長安地區紀年墓出土之鎮墓武士俑與鎮墓獸類型與數量

No.	墓主或墓葬編號	墓葬年代	盜擾	鎮墓武士俑類型 (*個數)	鎮墓獸類型 (*個數)	參考資料
1	叱羅協 d.574	575	盜擾	長安傳統1型 *1、長安傳統2型*1	長安傳統1型 *2、長安傳統2型*1、長安傳統3型*1	賁安志編,《中國北周珍貴文物》(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頁10-36。
2	王德衡 d.565?	576	完好	長安傳統1型 *1、長安傳統2型*1	長安傳統1型 *1、長安傳統3型*1	賁安志編,《中國北周珍貴文物》,頁36-59。
3	若干雲d.?	578?	完好	長安傳統1型 *1、長安傳統2型*1	長安傳統1型 *1、長安傳統2型*1	賁安志編,《中國北周珍貴文物》,頁60-76。
4	獨孤藏 d.578/ 賀蘭氏d.?	578	完好	長安傳統2型 *1	長安傳統1型 *1、長安傳統3型*1	賁安志編,《中國北周珍貴文物》,頁76-91。
5	宇文儉 d.578	578	完好	長安傳統1型 *1、長安傳統2型*1	長安傳統1型 *1、長安傳統3型*1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北周宇文儉墓清理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01年第3期,頁27-40。
6	韋孝寬 580/ 鄭毗羅 (賀蘭毗羅)d. 553	580/553	盜擾	長安傳統1型 *1、長安傳統2型*1	長安傳統1型*1	戴應新,〈北周韋孝寬夫婦合葬墓〉,《故宮文物月刊》,189期(1998),頁100-113。
7	北周武帝 宇文邕 d.578/ 阿史那氏 d.582	578/582	盜擾	長安傳統1型 *1、長安傳統2型*1	長安傳統1型*2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陽市考古研究所,〈北周武帝孝陵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2期,頁8-28。
8	尉遲運 d.579/ 賀撥毗沙 d.599	579/601	盜擾	長安傳統1型 *1	西安鄴城?型: 人面*2	賁安志編,《中國北周珍貴文物》,頁93-109。

No.	墓主或墓 葬編號	墓葬年代	盜擾	鎮墓武士俑類 型 (*個數)	鎮墓獸類型 (*個數)	參考資料
9	王士良 d.583/ 董榮輝 d.565/ 妾 姜氏? d.?	583/565	完好	x	長安傳統2型*1	賁安志編,《中國北周珍貴文物》,頁109-130。
10	侯明(侯 子欽) d.584/ 郭氏d.? 鄧氏d. 586	586	盜擾	長安傳統1型 *2、長安傳 統2型*2	x	賁安志編,《中國北周珍貴文物》,頁146-152。
11	李和d.582	582 (開 皇二年)	盜擾	西安鄴城1型 *2	殘片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陝西省三原縣雙盛村隋李 和墓清理簡報〉,《文物》, 1966年第1期,頁27-40。
12	宋忻 d.587/韋 胡磨d.?	589	塌毀	西安鄴城1型 *2	西安鄴城2型: 人面*1、獸面*1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隋唐研究 室,〈陝西長安隋宋忻夫婦 合葬墓清理簡報〉,《考古與 文物》,1994年第1期,頁32- 41。
13	張綝d. 587/ 薛世蘭 d.605	589/607	盜擾	長安傳統1型 *2、 西安鄴城2a 型*2	長安傳統1型 *1、西安鄴城2 型:人面*1、獸 面*1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 院,〈西安長安隋張綝夫婦 合葬墓發掘簡報〉,《文物》, 2018年第1期,頁26-46。
14	郝久閭可 婆頭d.590	592	盜擾	西安鄴城1型 *2	西安鄴城2型: 獸面*1、一件殘 損過甚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長安 高陽原隋郝久閭可婆頭墓發 掘簡報〉,《文博》,2018年第 4期,頁17-29。
15	呂武 d.592/ 宇文氏d.?	592	不明	西安鄴城1型 *2	西安鄴城1型: 人面*1、獸面*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西安郊區隋唐墓》(北 京:科學出版社,1966), 頁35、37、39。
16	呂思禮 d.538/ 辛氏d.539	592	完好	西安鄴城1型 *2	西安鄴城2型: 人面*1、獸面*1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隋 呂思禮夫婦合葬墓清理簡 報〉,《考古與文物》,2004年 第6期,頁21-30。



No.	墓主或墓 葬編號	墓葬年代	盜擾	鎮墓武士俑類 型 (*個數)	鎮墓獸類型 (*個數)	參考資料
17	鹿善 d.576/ 劉氏d.593	595	盜擾	西安鄴城1型 *2	西安鄴城1型： 人面*1、獸面*1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咸陽隋鹿善夫婦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4期，頁35-44。
18	羅達d.?	596	塌毀	西安鄴城？ 型*2	西安鄴城1型： 人面*1、獸面*1	李域錚、關雙喜，〈隋羅達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5期，頁28-31。
19	獨孤羅 d.599	600	塌毀	西安鄴城1型 *1或以上	？	趙強、姜寶蓮、郭明卿，〈隋獨孤羅墓的發現和研究〉，《華夏考古》，2017年第2期，頁121-127。
20	元威 d.590/于 宜容d.601	591/601	不明	西安鄴城1型 *1	西安鄴城2型： 人面*2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隋元威夫婦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2年第1期，頁24-34。
21	蕭紹d.597	603	盜擾	西安鄴城1型 *1	西安鄴城1型： 人面*1、另有一 殘片	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陽隋代蕭紹墓〉，《文物》，2006年第9期，頁39-44。
22	李裕d.604	605	完好	西安鄴城1型 *2	西安鄴城1型： 人面*1、獸面*1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隋李裕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第7期，頁4-20。
23	李靜訓 d.608	608	完好	西安鄴城1型 *2	西安鄴城1型： 人面*1、獸面*1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頁3-28。
24	姬威d. 610	610	不明 、擾 亂	西安鄴城2b 型*1以上	西安鄴城2型： 人面*2、獸面*1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郭家灘隋姬威墓清理簡報〉，《文物》，1959年第8期，頁4-7。


No.	墓主或墓 葬編號	墓葬年代	盜擾	鎮墓武士俑類 型 (*個數)	鎮墓獸類型 (*個數)	參考資料
25	豐寧公主 d.610/ 韋圓照 d.623	610/634	盜擾	西安鄴城2b 型*2	西安鄴城2型： 人面*1、獸面*1	戴應新，〈隋豐寧公主與韋 圓照合葬墓〉，《故宮文物月 刊》，186期（1998），頁76- 93。
26	李椿 d.593/ 劉琬華 d.607	610	盜擾	西安鄴城2b 型*2	西安鄴城2型： 人面*1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 東郊隋李椿夫婦墓清理簡 報〉，《考古與文物》，1986年 第3期，頁22-31。
27	劉世恭 d.615 （西安 白鹿原 M42）	615	盜擾	西安鄴城2b 型*2	西安鄴城2型： 人面*1	俞偉超，〈西安白鹿原墓葬 發掘報告〉，《考古學報》， 1956年第3期，頁49-58。
28	潼關稅村 隋代壁畫 墓（推測 為太子楊 勇）	隋	盜擾	西安鄴城2b 型*2	西安鄴城2型： 人面*1、獸面*1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潼關 稅村隋代壁畫墓》（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3）。

表3：鎮墓武士類型比較

	鄴城傳統	安陽隋墓出土鄴城傳統陶俑	西安出土鄴城傳統陶俑
無花結			
	鄴城傳統1型 標本：河南安陽賈進墓（572）；高56公分	安陽隋墓1型 標本：河南安陽梅園莊北地隋墓M401；高42.5公分	西安鄴城1型 標本：陝西西安李靜訓墓（608）；高33.5公分
有花結			
	鄴城傳統2型 標本：河北磁縣元良墓（553）；高48.5公分	安陽隋墓2型 標本：河南安陽馬家墳隋墓M201；高42.8公分	西安鄴城鎮墓武士2a型 標本：陝西西安韋裔墓（616）
			
			西安鄴城2b型 標本：陝西西安李椿夫婦墓（610）；高33.5公分

表4：鎮墓獸類型比較

	鄴城傳統	安陽隋墓出土鄴城傳統陶俑	西安出土鄴城傳統陶俑
刀形鬃毛，不帶長戟			
	鄴城傳統1型 標本：河北灣漳壁畫墓：人面高49公分；獸面高45公分	安陽隋墓2型 標本：河南安陽馬家墳隋墓M201：人面高35；獸面高36	西安鄴城2型 標本：呂思禮夫婦墓（592）：人面高28.2公分；獸面高28.5公分
帶長戟			
	鄴城傳統2型 標本：河南安陽賈進墓（572）人面高44公分；獸面高46公分		
鬃毛相連			
	鄴城傳統3型 標本：河南安陽第九段標段取土區木場屯村M99；高29公分	安陽隋墓1型 標本：河南安陽梅園莊北地隋墓M401：人面高33；獸面高34	

無 髻 毛			 <p>西安鄴城1型 標本：陝西西安李靜訓墓 (608) 人面高25公分；獸 面高23公分</p>
-------------	--	--	---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唐) 令狐德棻等

《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

(唐) 李百藥等

《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唐) 李林甫等

《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

(唐) 張彥遠

《歷代名畫記》，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唐) 道世

《法苑珠林》，卷29，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主編，《大正新脩大藏經》，冊53，東京：大正一切新刊行會，1924-1934。

(唐) 魏徵等

《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隋高祖於國內立舍利塔詔并瑞應表謝〉，收入(唐) 道宣，《廣弘明集》，卷30，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主編，《大正新脩大藏經》，冊52，東京：大正一切新刊行會，1924-1934。

近人論著

八木春生

2000 〈南北朝時代における陶俑〉，收入曾布川寛、岡田健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三國、南北朝，東京：小學館，頁67-76。

2013 《中国仏教造像の変容：南北朝後期および隋時代》，京都：法藏館。

Yagi, Haruo

2000 “Nanbokuchō jidai niokeru tōyō (Ceramic Tomb Figurines in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in Sofukawa Hiroshi and Ken Okada eds., *Sekai bijutsu daizenshū*, Tōyō hen, Chūgoku 3, Sangoku Nanbokuchō (New History of World Art, China, 3,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okyo: Shogakukan, pp. 67-76.

2013 *Chūgoku Bukkyō zōzō no hen'yō: Nanbokuchō kōki oyobi Zui jidai* (The Changes of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s: The Lat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nd the Sui Dynasty), Kyoto: Hōzōkan.

八木春生著；李梅譯

2012 〈隋代菩薩立像衣著飾物〉，《敦煌研究》，第1期，頁1-10。

Yagi, Haruo; Li, Mei trans.

- 2012 “Costumes and Accessories of the Standing Bodhisattvas of the Sui Dynasty,” *Dunhuang Research*, no. 1, pp. 1-10.

于春

- 2015 〈長安地區北朝佛教造像考古學研究〉，西安：西北大學博士論文。
2019 〈蜀道的兩端——南北朝隋唐時期長安與蜀地的佛教藝術交流〉，《西部考古》，第17輯，頁267-286。

Yu, Chun

- 2015 “Chang’an diqu Beichao fojiao zaoxiang kaoguxue yanjiu (Archaeology Research on Buddhist Statu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 Chang’an Region),” PhD diss., Th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2019 “The Ends of Shu Road: Artistic Exchange of Buddhism between Chang’an and Shu in the Northern-Southern Dynasties and the Sui-Tang Dynasties,” *Xibu Kaogu*, no. 17, pp. 267-286.

小林仁

- 2000 〈隋俑考〉，收於清水眞澄編，《美術史論叢・造形と文化》，東京：雄山閣，頁345-364。
2002 〈洛陽北魏陶俑の成立とその展開〉，《美学美術史論集》，14輯，頁221-246。
2012 〈北齊鉛釉陶的定位和意義〉，《故宮博物院院刊》，第5期，頁104-111。

Kobayashi, Hitoshi

- 2000 “Zuiyō kanga (A Study on Tomb Figurines of Sui),” in Shimizu Masumi ed., *Bishitsushironso: zōkei to bunka* (Studies of History of Art: Forms and Cultures), Tokyo: Yūzankaku, pp. 345-364.
2002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Luoyang Ceramic Tomb Figurines,” *Aesthetics and Art History*, no. 14, pp. 221-246.
2012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Lead-Glazed Ware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5, pp. 104-111.

小林仁著；李娜譯

- 2012 〈中國北齊隨葬陶俑兩大樣式的形成及其意義〉，《文物世界》，第1期，頁42-66。

Kobayashi, Hitoshi; Li, Na trans.

- 2012 “Zhongguo Beiqi suizang taoyong liangda yangshi de xingcheng jiqi yiy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o Ceramic Tomb Figurine Stylistic Paradigms of the Northern Qi and Their Significants),” *World of Antiquity*, no. 1, pp. 42-66.

小林仁著；陳馨譯

- 2009 〈白瓷的誕生——北朝瓷器生產的諸問題與安陽隋張盛墓出土的白瓷俑〉，《中國古陶瓷研究》，15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61-77。

Kobayashi, Hitoshi; Chen, Xin trans.

- 2009 “Baici de dansheng: Beichao ciqi shengchan de zhu wenti yu Anyang Sui Zhang Sheng mu chutu de baici yong (The Emergence of White Ware: The Questions on the Production of Ceramic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nd the White Ceramic Tomb Figurines of Zhang Sheng’s Tomb in Anyang),”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Ceramics*, no. 15,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ress, pp. 61-77.

小林仁著；劉晶晶譯

- 2010 〈北齊鄴城地區的明器生產及其系譜——以陶俑和低溫鉛釉陶為中心〉，《中國古陶瓷研究》，16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505-524。
- 2011 〈初唐黃釉加彩俑的特質與意義〉，收於北京藝術博物館編，《中國鞏義窯》，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頁349-359。

Kobayashi, Hitoshi; Liu, Jing-jing trans.

- 2010 “The Production of Mingqi (Burial Objects) in the Yecheng Region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and it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the Yong (Tomb Figures) and Lead-Glazed Potter,” *Research of Ancient Chinese Ceramics*, no. 16,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ress, pp. 505-524.
- 2011 “Chutang huangyou jiakai yong de tezhi yu yiyi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Significants of Figurines in Yellowish Glaze and Pigments of the Early Tang),” in Beijing Art Museum ed., *Gongyi Kiln in China*, Beijing: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 Press, pp. 349-35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 2017 《太原沙溝隋代斛律徽墓》，北京：科學出版社。

Sh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 2017 *Taiyuan Shago Suidai Hulu Che mu* (Hulu Che’s Tomb of the Sui in Shago in Taiyuan), Beijing: Science Press.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2003 〈太原北齊徐顯秀墓發掘簡報〉，《文物》，第10期，頁4-39。
- 2006 《北齊東安王婁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Sh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Taiyuan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2003 “The Excavation of Xu Xianxiu’s Tomb of the Northern Qi in Taiyuan,” *Cultural Relics*, no. 10, pp. 4-39.
- 2006 *Lou Rui’s Tomb*,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晉源區文物旅遊管理局

- 2005 《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Sh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Taiyuan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Department of Relics and Tourism of Jinyuan District, Taiyuan City

- 2005 *Sui Dynasty Tomb of Yu Hong in Taiyua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朐縣博物館

2002 〈山東臨朐北齊崔芬壁畫墓〉，《文物》，第4期，頁4-26。

Shando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Linju Museum

2002 “Excavation of the Mural Tomb of Cui Fen of the Northern Qi at Linqu, Shandong,” *Cultural Relics*, no. 4, pp. 4-26.

山東省博物館

1981 〈山東嘉祥英山一號墓清理簡報〉，《文物》，第4期，頁28-32。

Shandong Museum

1981 “Shandong Jiaxiang yi hao mu qingli jianbao (The Excavation of the Jiaxiang Yingshan M1 in Shandong),” *Cultural Relics*, no. 4, pp. 28-3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第一工作隊、陝西省麟遊縣文物管理所（李春林）

2012 〈隋仁壽唐九成宮4號殿遺址考古發掘〉，《藝術品鑒》，第7期，頁74-79。

The First Archaeological Team of Shaanxi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aanxi Linyou Cultural Relics Administration Office (Chun-lin Li in chief)

2012 “Sui Renshougong Tang Jiuchenggong 4 hao dian yizhi kaogu fajue (The Excavation of the Site of the 4th Palace of the Sui Renshou and Tang Jiucheng Palace),” *Appreciation*, no. 7, pp. 74-7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2010 《古都遺珍——長安城出土的北周佛教造像》，北京：文物出版社。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0 *Treasures Survived from Ruined Capital: Buddhist Figures Unearthed from Chang'an the Capital of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2003 《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北京：科學出版社。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e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2003 *Cixian Wanzhang Mural Tomb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Period*, Beijing: Science Press.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

1981 〈安陽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第3期，頁369-406。

Anyang Team of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81 “Anyang Sui mu fajue baogao (The Excavations of the Sui Tombs at Anyang),”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no. 3, pp. 369-40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80 《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1980 *Tang Chang'an chengjiao Sui-Tang mu* (Sui-Tang Tombs around the Chang'an City of the Tang),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66 《西安郊區隋唐墓》，北京：科學出版社。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1966 *Xi'an jiaoqu Sui Tang mu* (The Sui-Tang Tombs in the Xi'an Rural Area), Beijing: Science Press.

王建保、張志忠、李融武、李國霞

2014 〈河北臨漳縣曹村窯址考察報告〉，《華夏考古》，第1期，頁24-29。

Wang, Jian-bao, Zhi-zhong Zhang, Rong-wu Li, and Gui-xia Li

2014 “Exploration of the Kiln-site at Caocun Village in Linzhang County, Hebei,” *Huaxia Archaeology*, no. 1, pp. 24-29.

四川博物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博物館

2013 《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北京：中華書局。

Sichuan Museum, Chengdu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Sichuan University Museum

2013 *Buddhist Statue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Excavated in Sich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申文喜

2011 〈略論安陽隋墓出土的瓷俑〉，《安陽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頁60-64。

Shen, Wen-xi

2011 “Luelun Anyang Sui mu chutu de ci yong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Tomb Figurines of Stoneware Body from Sui Tombs in Anyang),” *Journal of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o. 3, pp. 60-64.

石璋如

2005 《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附錄一：隋唐墓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Shih, Chang-ju

2005 *Archaeologia Sinica, number two, Hsiao-T'un, [The Yin-Shang Site at Anyang, Henan], vol. 1, the Site, its Discovery, and Excavations, fascicle 3, Supplement 1: Sui-Tang Dynasty Burials*,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安陽市文物工作隊

1992 〈河南安陽市兩座隋墓發掘報告〉，《考古》，第1期，頁32-45、79。

Anyang Municipal Team of Cultural Relics

1992 “Henan Anyang shi liangzuo Sui mu fajue baogao (A Report on Two Sui Tombs in Anyang, Henan),” *Archaeology*, no. 1, pp. 32-45, 79.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0 〈河南安陽市置度村八號隋墓發掘簡報〉，《考古》，第4期，頁48-57。

Anya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2010 “The Excavation of Tomb No.8 of the Sui Dynasty at Zhidu Village, Anyang City, Henan,” *Archaeology*, no. 4, pp. 48-57.

安徽省展覽、博物館

- 1976 〈合肥西郊隋墓〉，《考古》，第2期，頁134-140。

Anhui Exhibition, Anhui Museum

- 1976 “Hefei xijiao Sui mu (A Sui Tomb in the Western Suburb of Hefei),” *Archaeology*, no. 2, pp. 134-140.

安徽省博物館

- 1988 〈合肥隋開皇三年張靜墓〉，《文物》，第1期，頁85-93。

Anhui Museum

- 1988 “Hefei Sui Kaihuang san nian Zhang Jing mu (Zhang Jing’s Tomb of the Third Year of Kaihuang of the Sui Dynasty in Hefei),”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85-93.

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

- 1959 〈安陽隋張盛墓發掘記〉，《考古》，第10期，頁541-545。

Anyang Excavation Team of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 1959 “Anyang Sui Zhang Sheng mu fajueji (The Excavation of Zhang Sheng’s Tomb of the Sui Dynasty in Anyang),” *Archaeology*, no. 10, pp. 541-545.

西安市文物局

- 1997 〈西安北郊出土北周白石觀音造像〉，《文物》，第11期，頁78-79。

CPAM of Xi’an

- 1997 “White Stone Guanyin Statues from the Northern Zhou Dynasty Unearthed in the Outskirts of Xi’an,” *Cultural Relics*, no. 11, pp. 78-79.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

- 1998 〈西安北郊出土北朝佛教造像〉，《文博》，第2期，頁18-24。

- 2010 〈西安韋曲高望堆北朝墓發掘簡報〉，《文物》，第9期，頁30-43。

- 2011 〈西安南郊清理兩座小型北周墓〉，《文博》，第3期，頁13-17。

The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and Archaeology Institute of Xi’an

- 1998 “Xi’an beijiao chutu Baichao Fojiao zaoxiang (The Buddhist Sculptures in the Northern Suburb of Xi’an),” *Relics and Museology*, no. 2, pp. 18-24.

- 2010 “Gaowangdui Tomb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 Weiqu, Xi’an,” *Archaeology*, no. 9, pp. 30-43.

- 2011 “Xi’an nanjiao qingli liangzuo xiaoxing Beizhou mu (The Two Small Northern Zhou Tomb in the Southern Suburb of Xi’an),” *Relics and Museology*, no. 3, pp. 13-17.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

- 2013 〈西安北周張氏家族墓清理發掘收穫〉，《中國文物報》，8月2日，8版。

- 2018 〈西安長安隋張綝夫婦合葬墓發掘簡報〉，《文物》，第1期，頁26-46。

- 2020 〈陝西西安西魏乙弗虬及夫人隋代席氏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第1期,頁33-48。

Xi'an Municip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 2013 “Xi'an Beizhou Zhangshi jiazumu qingli fajue shouhuo (The Zhang Family Graveyard of the Northern Zhou in Xi'an),” *Zhongguo Wenwu Bao* (Chinese Cultural Relics News), August 2, p. 8.
- 2018 “The Excavation of the Tomb of the Couple of Zhang Chen of the Sui Dynasty in Chang'an District, Xi'an,”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26-46.
- 2020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a Sui-Dynasty Joint Grave Belonging to the Yifuqiu's Couple in Xi'an,”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33-48.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2016 〈成都市下同仁路遺址南朝至唐代佛教造像坑〉,《考古》,第6期,頁55-81。

Chengdu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2016 “The Buddhist Sculpture Hoard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 Period to the Tang Dynasty at Lower Tongren Road in Chengdu City,” *Archaeology*, no. 6, pp. 55-81.

何利群

- 2015 〈鄴城地區佛教造像的發現及相關問題的探索〉,《華夏考古》,第3期,頁88-93。
- 2017 〈北齊「龍樹背龕式」造像的技術傳承和構圖特徵〉,《中原文物》,第4期,頁73-78。

He, Li-qun

- 2015 “Discovery of Buddhist Images in the Yecheng Area and Study of Related Problems,” *Huaxia Archaeology*, no. 3, pp. 88-93.
- 2017 “The Technical Tradition and Pictorial-Composition Feature of the ‘Dragon-Tree Back Niche’ Style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no. 4, pp. 73-78.

吳葦

- 2008 〈北周圓雕佛造像及相關問題〉,《考古與文物》,第1期,頁91-99。

Wu, Hong

- 2008 “Beizhou yuandiao Fozaoxiang ji xiangguan wenti (Questions on the Freestanding Buddhist Sculptures of the Northern Zhou),”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91-99.

李江

- 2010 〈河北臨漳曹村窯址初探與試掘簡報〉,《中國古陶瓷研究》,16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43-52。

Li, Jiang

- 2010 “A Brief Report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Hebei Province's Cao Village Kilnsite in Linzhang,” in the Chinese Ancient Ceramics Society ed., *Research of Chinese Early Ceramics*, no. 16,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ress, pp. 43-52.

李志鴻

- 2015 〈隋代的王權與佛教——以仁壽設塔活動為核心〉，《中華佛學研究》，16期，頁105-126。

Li, Chih-hung

- 2015 “Buddhism and Kingship in Sui Dynasty: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s of Stupa During the Renshou Period,” *Chung-Hwa Buddhist Studies*, no. 16, pp. 105-126.

李域錚、關雙喜

- 1984 〈隋羅達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第5期，頁28-31。

Li, Yu-zheng and Shuang-xi Guan

- 1984 “Sui Luo Da mu qingli jianbao (The Excavation of Luo Da’s Tomb of Sui),”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5, pp. 28-31.

沈麗華

- 2016 〈鄴城地區東魏北齊墓群布局研究〉，《考古》，第3期，頁102-115。

Shen, Li-hua

- 2016 “The Study on the Layout of the Tombs of the Eastern Wei and Northern Qi Dynasties in the Ye City Area,” *Archaeology*, no. 3, pp. 102-115.

沙武田

- 2006 《敦煌畫稿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Sha, Wu-tian

- 2006 *Dunhuang huagao yanjiu* (Studies on Sketches of Dunhuang),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Minority Nationalities.

辛龍

- 2012 〈陶俑製作工藝的研究——以西安地區魏晉南北朝為中心〉，西安：西北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學系碩士論文。

Xin, Long

- 2012 “Taoyong zhizuo gongyi de yanjiu: yi Xi’an diqu Weijinnanbeichao wei zhongxin (Production Techniques of the Ceramic Tomb Figurines in the Xi’an Area of the Wei, J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周到

- 1964 〈河南濮陽北齊李雲墓出土的瓷器和墓誌〉，《考古》，第9期，頁482-484。

Zhou, Dao

- 1964 “Henan Puyang Beiqi Li Yun mu chutu de ciqi han muzhi (Tomb Epitaph and Ceramics from Li Yun’s Tomb of the Northern Qi in Puyang, Henan),” *Archaeology*, no. 9, pp. 482-484.

妹尾達彦

- 2017 〈生前空間、死後の世界——隋唐長安の官人居住地と埋葬地——〉，《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266期，頁69-134。

Seo, Tatsuhiko

- 2017 “Sezen no kukan, shigono seikai: Zui-To Chūan no kannin kyuzūtsu to maizotsu (The Living Space and Burial Area of the Official and Officers in Sui-Tang Chang’an),” *Journal of the Faculty of Literature, Chuo University*, no. 266, pp. 69-134.

林聖智

- 2019 《圖像與裝飾——北朝墓葬的生死表象》，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

Lin, Sheng-chih

- 2019 *Image and Ornament: The Representation of Death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平山縣博物館

- 2001 〈河北平山縣西岳村隋唐崔氏墓〉，《考古》，第2期，頁55-70。

He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Pingshan Museum

- 2001 “Cui Family Graveyard of the Sui and Tang period at Xiyue Village in Pingshan, Hebei,” *Archaeology*, no. 2, pp. 55-7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邢台市文物管理處、南宮市文物保管所

- 2012 〈河北南宮後底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第1期，頁19-33。

He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Xingtai Municipal Offic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nd Nangong Municipal Offic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 2012 “The Excavation Report on the Houdige Site in Nangong City, Hebei,”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19-33.

河北省文管處

- 1979 〈河北景縣北魏高氏墓發掘簡報〉，《文物》，第3期，頁17-31。

Hebei Provincial Cultural Relics Administration Office

- 1979 “Hebei Jingxian Beiwei Gaoshi mu fajue jianbao (The Excavation of the Gao Family Graveyard in Jing County in Hebei),” *Cultural Relics*, no. 3, pp. 17-31.

河北省博物館、河北省文物管理處

- 1973 〈河北平山北齊崔昂墓調查報告〉，《文物》，第11期，頁27-33。

Hebei Museum and Hebei Provincial Cultural Relics Administration Office

- 1973 “Hebei Pingshan Beiqi Cui Ang mu diaocha baogao (Cui Ang’s tomb in Northern Qi in Pingshan in Hebei),” *Cultural Relics*, no. 11, pp. 27-33.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2016 〈河南新鄉時代華庭遺址H37發掘簡報〉，《華夏考古》，第3期，頁38-44。

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Xinxia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2016 “The Excavation of Ash-pit H37 on the Shidaihuating Site in Xinxiang City, Henan Province,” *Huaxia Archaeology*, no. 3, pp. 38-44.

河南省文物局

2013 《安陽北朝墓葬》，北京：科學出版社。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Henan Province

2013 *Tombs of Northern Dynasties in Anyang*, Beijing: Science Press.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安陽縣文管會

1987 〈安陽北齊和紹隆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中原文物》，第1期，頁8-16。

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Anyang Cultural Relics Administration Office

1987 “Anyang Beiqi He Shaolong fufu hezangmu qingli jianbao (The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e Shaolong Couple’s Tomb in Northern Qi in Anyang),”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no. 1, pp. 8-16.

河南省博物館

1972 〈河南安陽北齊范粹墓發掘簡報〉，《文物》，第1期，頁47-57、86。

Henan Museum

1972 “Henan Anyang Beiqi Fan Cui mu fajue jianbao (The Excavation of Fan Cui’s Tomb in Northern Qi in Anyang, Henan),”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47-57, 86.

河南省博物館、安陽地區文化局

1977 〈河南安陽隋代瓷窯址的試掘〉，《文物》，第2期，頁48-56。

Henan Museum and Administr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of Anyang Region

1977 “Henan Anyang Suidai ciyaozhi de shijue (The Preliminary Excavation of the Kiln Sites of Sui in Anyang, Henan),” *Cultural Relics*, no. 2, pp. 48-56.

肥田路美著；顏娟英、張名揚、曹啟德、郭珮君、曾堯民譯

2018 《雲翔瑞像：初唐佛教美術研究》，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Hida, Romi; Yan, Chuan-ying, Ming-yang Chang, Pei-chun Guo, De-chi Tsao, Yao-min Tseng trans.

2018 *Yunxiang ruixiang: chutang Fojiao meishu yanjiu* (Studies of Buddhist art in the Early Tang),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保全

1979 〈西安文管所藏北朝白石造像和隋鎏金銅像〉，《文物》，第3期，頁83-85。

Bao, Quan

1979 “Xi’an wenguansuo cang Baichao baishi zaoxiang he Sui liujin tongxiang (The White Stone and Gilded Bronze Buddhist Sculptur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in Xi’an Administration Office),” *Cultural Relics*, no. 3, pp. 83-85.

俞偉超

1956 〈西安白鹿原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第3期，頁49-58。

Yu, Wei-chao

1956 “Xi’an Bailuyuan muzhang fajue baogao (The Excavation of the Tombs in Bailuyuan in Xi’an),”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no. 3, p. 49-58.

涂宗呈

- 2012 〈神魂、屍骸與塚墓——唐代兩京的死亡場景與喪葬文化〉，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Tu, Chung-cheng

- 2012 “Souls, Corpses and Burials: Spectacles of Death in Chang’an and Luoyang during the Tang,” PhD diss.,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南京博物院、揚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蘇州市考古研究所

- 2014 〈江蘇揚州市曹莊隋煬帝墓〉，《考古》，第7期，頁71-77。

Nanjing Museum, Yangzhou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and Suzhou Anya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2014 “Jiangxu Yangzhoushi Caozhuang Sui Yandi mu (The Tomb of the Emperor Yang of Sui in Caozhuang, Yangzhou, Jiangsu),” *Archaeology*, no. 7, pp. 71-77.

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2006 〈咸陽隋代蕭紹墓〉，《文物》，第9期，頁39-44。

Xianya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2006 “Xianyang Suidai Xiao Shao mu (Xiao Shao’s Tomb of Sui in Xianyang),” *Cultural Relics*, no. 9, pp. 39-44.

咸陽市文管會、咸陽博物館

- 1987 〈咸陽市胡家溝西魏侯義墓清理簡報〉，《文物》，第12期，頁57-68。

Xianyang Cultural Relics Administration Office and Xianyang Museum

- 1987 “Xianyang shi Hujiagou Xiwei Houyi mu qingli jianbao (Tomb of Hou Yi of the Western Wei in Hujiago, Xianyang City),” *Cultural Relics*, no. 12, pp. 57-68.

昭陵博物館

- 1988 〈唐昭陵長樂公主墓〉，《文博》，第3期，頁10-30。

- 1989 〈唐昭陵段簡璧墓清理簡報〉，《文博》，第6期，頁3-12。

Zhaoling Mausoleum Museum

- 1988 “Tang Zhaoling Changle gongzhu mu (The Tomb of Princess Changle in the Zhao Mausoleum Area),” *Relics and Museology*, no. 3, pp. 10-30.

- 1989 “Tang Zhaoling Duanjianbi mu qingli jianbao (The Preliminary Report of Duan Jianbi’s Tomb in the Zhao Mausoleum Area),” *Relics and Museology*, no. 6, pp. 3-12.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 2013 〈唐代洛州刺史賈敦頤墓的發掘〉，《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第8期，頁29-58。

Luoya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2013 “The Excavation of Tang Dynasty Tomb of Jia Dunyi, Prefect of Luozhou,” *Journal of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no. 8, pp. 29-58.

貞安志編

- 1992 《中國北周珍貴文物》，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

Yuan, An-zhi ed.

1992 *The Northern Zhou's Precious Historical Relics (China)*, Xi'an: Shaanxi People Press.

韋正、喬蘇婷

2020 〈論江蘇徐州地區南北朝墓葬中的陶俑〉，《東南文化》，第6期，頁65-73。

Wei, Zheng and Su-ting Qiao

2020 "The Pottery Figurines in the Tombs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in Xuzhou, Jiangsu Province," *Southeast Culture*, no. 6, pp. 65-73.

唐仲明

2007 〈青州造像所見佛塔之樣式、淵源與功能初探〉，《中原文物》，第4期，頁81-86。

2013 〈東魏北齊響堂與青州造像比較研究〉，《華夏考古》，第4期，頁96-106、113。

Tang, Zhong-ming

2007 "Qingzhou zaoxiang suojian fota zhi yangshi, yuanyuan yu gongneng chutan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Forms, Origins and Functions of Pagoda on the Buddhist Sculptures in Qingzhou),"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no. 4, pp. 81-86.

2013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astern Wei and Northern Qi Periods Images Discovered at Xiangtang and Qingzhou," *Huaxia Archaeology*, no. 4, pp. 96-106, 113.

倪潤安

2005 〈北周墓葬俑群研究〉，《考古學報》，第1期，頁27-54。

Ni, Run-an

2005 "A Study of Northern Zhou Period Tomb Figurines,"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no. 1, pp. 27-54.

唐長孺

1959 〈魏晉至唐官府作場及官府工程的工匠〉，《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北京：三聯書店，頁29-92。

Tang, Zhang-ru

1959 "Wei-Jin zhi Tang guanfu zuochang ji guanfu gongcheng de gongjiang (The Artisans in the Official Workshops and for the Official Constructions in the Period from the Wei to the Tang Dynasty)," *Weijin Nanbeichao shi luncong xubian* (Sequel of Compiled Articles of History in the Period from the Wei-Jin to the Northern and the Southern Dynasties), Beijing: Joint Publishing, pp. 29-92.

徐光冀編

2011 《中國出土壁畫全集》，第4卷·山東，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1 《中國出土壁畫全集》，第6卷·陝西（上），北京：科學出版社。

2011 《中國出土壁畫全集》，第9卷·甘肅、寧夏、新疆，北京：科學出版社。

Xu, Guang-ji ed.

2011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Murals Unearthed in China*, vol. 4, Shandong,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1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Murals Unearthed in China*, vol. 6, Shaanxi (Part 1),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11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Murals Unearthed in China*, vol. 9, Gansu, Ningxia, Xinjiang, Beijing: Science Press.

徐州市博物館

1983 〈江蘇銅山縣茅村隋墓〉,《考古》,第12期,頁149-151。

Xuzhou Museum

1983 “Jiangsu Tongshanxian Maocun Sui mu (A Sui Tomb in Mao Village, Tongshan County, Jiangsu),” *Archaeology*, no. 12, pp. 149-151.

徐斐宏

2019 〈洛陽唐初黃釉俑試探——兼論洛陽唐初墓葬文化之淵源〉,《中原文物》,第2期,頁101-108。

2020 〈北周墓葬面貌的形成及其影響〉,收於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北京大學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編,《古代文明》,第14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127-139。

Xu, Fei-hong

2019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Yellow Glazed Figurines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at Luoyang,” *Cultural Relics of Central China*, no. 2, pp. 101-108.

2020 “Form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rthern Zhou Tombs,” *Ancient Civilizations*, vol. 14,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pp. 127-139.

氣賀澤保規著;古怡青譯,嚴茹蕙校

2013 〈驍果制考——隋煬帝時期兵制的一個面向〉,《早期中古史研究》,5卷2期,頁51-72。

Kegasawa, Yasunori; Ku, Yi-ching trans.; Yen, Ju-hui revised

2013 “A Study of the Xiao-guo 驍果 System: One Aspect of the Military System under Emperor Yang of the Sui,” *Early and Medieval Chinese History*, vol. 5, no. 2, pp. 51-72.

耿志強

2014 《寧夏固原北周宇文猛墓:發掘報告與研究》,銀川:陽光出版社。

Geng, Zhi-qiang

2014 *Ningxia Guyuan Beizhou Yuwen Meng mu: fajue baogao yu yanjiu* (Yuwen Meng's Tomb of the Northern Zhou in Guyuan in Ningxia: Excavation Report and Research), Yinchuan: Sunshine Press.

徐男英

2017 〈河北出土北朝期白玉像考〉,收於濱田瑞美編,《アジア仏教美術論集:東アジア I:後漢、三国、南北朝》,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頁359-388。

Xu, Nan-ying

- 2017 “Kahoku chūtsudo Hokucho Shiratamazō kō (A Study of the White Marble Buddhist Sculptures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from Hebei),” in Tamami Hamada ed., *Ajia Buka bijutsu lunjū: Higashi Ajia 1: Gōhan, Sangoku Nanbokuchō* (Asian Buddhist Art Anthology, East Asia vol. 1: The Later Han, the Three Dynasties and the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okyo: Chuo Koron Bijutsu Shuppan.

孫修身編，敦煌研究院主編

- 1999 《敦煌石窟全集》，第12卷・佛教東傳故事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

Sun, Xiu-shen ed.

- 1999 *Dunhuang shiku quanji*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Dunhuang Cave), 12, Fojiao dongchuan gushihua juan (vol. 12, volume on the Scenes from Stories of the Transmission of Buddhism to the East), Hong K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 1959 〈西安郭家灘隋姬威墓清理簡報〉，《文物》，第8期，頁4-7。
1966 〈陝西省三原縣雙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簡報〉，《文物》，第1期，頁27-40。

Shaanxi Provincial Cultural Relics Administration Office

- 1959 “Xi’an Guojiatan Sui Ji Wei mu qingli jianbao (The Excavation of Ji Wei’s Tomb of the Sui in Guojiatan in Xi’an),” *Cultural Relics*, no. 8, pp. 4-7.
1966 “Shaanxi sheng Sanyuanxian Shuangsheng cun Sui Li He mu qingli jianbao (The Excavation of Li He’s Tomb of the Sui in Shuangsheng Village, Sanyuan County in Shaanxi Province),”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27-40.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

- 2001 〈北周宇文儉墓清理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第3期，頁27-40。
2005 〈西安洪慶北朝、隋家族遷葬墓地〉，《文物》，第10期，頁49-55。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 2001 “Excavation of Yuwen Jian Tomb,”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3, pp. 27-40.
2005 “Xi’an Hongqing Beichao, Sui jiazu qianzang mudi (A Family Graveyard for the Secondary Burials from the Northern Zhou to Sui in Hongqing, Xi’an),” *Cultural Relics*, no. 10, pp. 49-55.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咸陽市考古研究所

- 1997 〈北周武帝孝陵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第2期，頁8-28。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Xianya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1997 “Beizhou Wudi Xiaoling fajue jianbao (The Excavation of the Xiao Mausoleum of Emperor Wu of the Northern Zhou),”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2, pp. 8-28.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隋唐研究室

- 1994 〈陝西長安隋宋忻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第1期，頁32-41。

Sui-Tang Research Group of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 1994 “Shaanxi Chang’an Sui Song Qi fufu hezangmu qingli jianbao (The Excavation of the Song Xin Couple’s Tomb of the Sui in Chang’an District in Shaanxi),”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32-41.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

- 1986 〈西安東郊隋李椿夫婦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第3期,頁22-31。
2003 《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科學出版社。
2004 〈隋呂思禮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第6期,頁21-30。
2009 〈西安南郊隋李裕墓發掘簡報〉,《文物》,第7期,頁4-20。
2010 〈西安南郊隋蘇統師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第3期,頁3-6。
2013 《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7 〈陝西咸陽鄧村北周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第3期,頁35-54。
2018 〈長安高陽原隋郝久閭可婆頭墓發掘簡報〉,《文博》,第4期,頁17-29。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 1986 “Xi’an Dongjiao Sui Li Chun fufu mu qingli jianbao (The Excavation of the Li Chun Couple’s Tomb in the Eastern Part Xi’an),”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3, pp. 22-31.
2003 *Xi’an Beizhou An Jia mu* (An Jia’s Tomb of the Northern Zhou in Xi’a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04 “A Brief Report of the Excavation of Lu Sili and His Wife’s Tomb of Sui Dynasty,”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6, pp. 21-30.
2009 “Tomb of Li Yu of Sui Dynasty in the Southern Suburb of Xi’an,” *Cultural Relics*, no. 7, pp. 4-20.
2010 “A Brief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Su Tongshi Tomb of the Sui Dynasty at Southern Xi’an,”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3, pp. 3-6.
2013 *The Sui Dynasty Mural Painting Tomb in Shuicun*, Tongguan,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2017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Northern Zhou Tombs at the Dengcun Site in Xianyang, Shaanxi,”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3, pp. 35-54.
2018 “The Excavation of Yujiulü Kepotou’s Tomb of the Sui Dynasty at Gaoyang Plateau in Chang’an District,” *Relics and Museology*, no. 4, pp. 17-29.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 2012 〈隋元威夫婦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第1期,頁24-34。
2013 〈陝西咸陽隋鹿善夫婦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第4期,頁35-44。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Xianyang Municip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 2012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Excavation of the Joint Tomb of Yuanwei and His Wife in Sui Dynasty,”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24-34.

- 2013 “A Brief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 of the Joint Burial of Lu Shan Couple of the Sui Dynasty in Xianyang, Shaanxi Province,”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4, pp. 35-44.

高明士

- 2013 《律令法與天下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17 《中國中古禮律綜論：法文化的定型》，北京：商務出版社。

Kao, Ming-shih

- 2013 *Lülingfa yu Tianxiafa* (Precepts Law and World Law),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 2017 *Zhongguo zonggu lilu zonglun: fawenhua de dingxing* (A Critical Review of Ritual Rites and Laws in Medieval China: The Formation of Legal Culture),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高明士、邱添生、何永成、甘懷真

- 2006 《隋唐五代史（增訂本）》，臺北：里仁書局。

Kao, Ming-shih, Tian-sheng Chiu, Yong-cheng He and Huai-cheng Gan

- 2006 *Sui Tang Wudai shi* (History of the Periods from the Sui-Tang to the Five Dynasties), Taipei: Liren Books.

常青

- 2020 〈北周長安佛教藝術模式及其源流〉，《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49期，頁1-94、303。

- 2020 〈試論北魏關中地區佛教造像的地方風格〉，《故宮博物院院刊》，第3期，頁31-46。

Chang, Qing

- 2020 “The Model of Buddhist Art from Northern Zhou (557-581 CE) Chang’an Area and its Transmission,” *Taida Journal of Art History*, no. 49, pp. 1-94, 303.

- 2020 “On the Local-Styled Buddhist Sculpture in Guanzhong Area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3, pp. 31-46.

張全民

- 2018 〈略論關中地區隋墓陶俑的演變〉，《文物》，第1期，頁70-79。

Zhang, Quan-min

- 2018 “Luelun Guanzhong diqu Suimu taoyong de yanbian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Changes of Figurines in Guanzhong Area of the Sui),”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70-79.

張柏編

- 2008 《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12卷·河南，北京：科學出版社。

Zhang, Bo ed.

- 2008 *Complete Collection of Ceramic Art Unearthed in China*, vol. 12, Henan, Beijing: Science Press.

張茂林、王建保、李其江、吳軍明

- 2013 〈河北臨漳曹村窯與內丘邢窯陶瓷器的胎釉組成對比分析〉，《中國陶瓷》，第2期，頁57-59。

Zhang, Mao-lin, Jian-bao Wang, Qi-jiang Li and Jun-ming Wu

- 2013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Chemical Composition of Ceramics Excavated from Linzhang Caocun Kiln and Neiqiu Xing Kiln in Hebei Province,” *China Ceramics*, no. 2, pp. 57-59.

森達也

- 2006 〈論南北朝華北陶瓷的革新〉，收入張慶捷、李書吉、李鋼編，《4-6世紀的北中國與歐亞大陸》，北京：科學出版社，頁324-334。

Mori, Tatsuya

- 2006 “Lun Nanbeichao Huabei taoci de gexin (A Study on the Revolution of Ceramics in the Northern China),” in Qing-jie Zhang, Shu-ji Li, Gang Li eds., *Si-liu shiji de bei Zhongguo yu Ouyadalu* (Northern China and Eurasia in 4th-6th century), Beijing: Science Press, pp. 324-334.

森達也著；王淑津譯

- 2009 〈白釉陶與白瓷的出現年代〉，收於中國古陶瓷學會編，《中國古陶瓷研究》，15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頁79-95。
- 2014 〈從洛陽到長安：唐三彩的展開〉，《典藏讀天下》，第9期，頁44-53。

Mori, Tatsuya; Wang, Shu-jin trans.

- 2009 “Emergence Date of White Glazed Pottery in Low Temperature and White Porcelain in High Temperature),” in the Chinese Ancient Ceramics Society ed., *Research of Chinese Early Ceramics*, no. 15,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ress, pp. 79-95.
- 2014 “Cong Luoyang dao Chang’an: Tangsancai de Zhankai (From Luoyang to Chang’an: The Unfolding of Sancai Ware of the Tang Dynasty),” *Artco China*, no. 9, pp. 44-53.

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

- 1957 〈武漢市郊周家大灣241號隋墓清理簡報〉，《考古通訊》，第6期，頁31-34。

Hubei Cultural Relics Administration Office

- 1957 “Wuhan shijiao Zhoujiadawan 241 hao Sui mu qingli jianbao (The Excavation of the Sui Tomb no. 241 in Zhoujiadawan, Wuhan),” *Archaeology*, no. 6, pp. 31-34.

程紀中

- 1980 〈河北藁城縣發現一批北齊石造像〉，《考古》，第3期，頁242-245。

Cheng, Ji-zhong

- 1980 “Hebei Gaochengxian faxian yipi Beiqi shizaoxiang (The Stone Buddhist Sculptures in Gaocheng County, Hebei),” *Archaeology*, no. 3, pp. 242-245.

馮賀軍

- 2005 《曲陽白石造像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Feng, He-jun

- 2005 *Quyong baishi zaoxiang yanjiu* (A Study of What Stone Sculptures from Quyong),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ress.

黃信

- 2018 〈河北鄴城地區陶瓷窯址調查報告〉，《文物世界》，第1期，頁45-53。
2018 〈河北臨漳縣鄴南城倪辛莊窯址調查報告〉，《文物春秋》，第2期，頁30-39。

Huang, Xin

- 2018 “Hebei Yecheng diqu taoci yaozhi diancha baogao (Investigation of the Kiln Sites in the Yecheng Region, Hebei),” *World of Antiquity*, no. 1, pp. 45-53.
2018 “The Survey Report on the Nixinzhuang Kiln of the Southern Ye City in Linzhang County, Hebei,” *Wenwu Chunqiu*, no. 2, pp. 30-39.

楊泓

- 2000 〈隋唐造型藝術淵源簡論〉，《漢唐美術考古和佛教藝術》，北京：科學出版社，頁105-197。

Yang, Hong

- 2000 “Sui-Tang zaoxing yishu yuanyuan jianlun (A Preliminary Discussion about the Origins of Sui-Tang Art),” in *Hantang meishu kaogu he fojiao yishu* (Art Archaeology and Buddhist Art of the Han-Tang Period), Beijing: Science Press, pp. 157-163.

楊效俊

- 2000 〈東魏、北齊墓葬的考古學研究〉，《考古與文物》，第5期，頁68-88、96。
2012 〈淺談隋代長安佛教造像風格的多樣性與融合性——以紀年石造像為中心〉，收於山東博物館編，《齊魯文物》，第1輯，北京：科學出版社，頁109-125。

Yang, Xiao-jun

- 2000 “An Archaeology Study of Tombs of Eastern Wei and Northern Qi Dynasties,”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5, pp. 68-88, 96.
2012 “Qiantan Suidai Chang’an fojia zhaoxiang fengge de duoyangxing yu ronghexing: yi jinian shizaoxiang wei zhongxin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Diversity and Hybridity of the Styles of the Chang’an Buddhist Sculpture in Sui: the Dated Stone Sculptures as Case Studies),” in Shandong Museum ed., *Qiluwenwu* (Qi Lu Cultural Relics), vol. 1, Beijing: Science Press, pp. 109-125.

齊東方

- 2006 〈唐代的喪葬觀念習俗與禮儀制度〉，《考古學報》，第1期，頁59-81。

Qi, Dong-fang

- 2006 “A Study of the Tang Period Funeral Concept Custom and Ritual Institution,” *Acta Archaeologica Sinica*, no. 1, pp. 59-81.

解延琦

- 1955 〈太原市郊古墓、古寺廟遺址清理簡報〉，《考古通訊》，第4期，頁57-58。

Xie, Ting-qi

- 1955 “Taiyuan shijiao gumu, guximiao yizhi qingli jianbao (The Ancient Tombs and Temples in the Suburb of Taiyuan),” *Archaeology*, no. 4, pp. 57-58.

嘉祥縣文物管理所

- 1987 〈山東嘉祥英山二號隋墓清理簡報〉,《文物》,第11期,頁57-60。

Jiaxiang Cultural Relics Administration Office

- 1987 “Shandong Jiaxiang Yingshan er hao Sui mu qingli jianbao (The Second Sui Tomb in Yingshan, Jiaxiang, Shandong),” *Cultural Relics*, no. 11, pp. 57-60.

寧夏回族自治區博物館、寧夏固原博物館

- 1985 〈寧夏固原北周李賢夫婦墓發掘簡報〉,《文物》,第11期,頁1-20。

Ningxia Museum and Ningxia Guyuan Museum

- 1985 “Ningxia Guyuan Beizhou Li Xian fufu mu fajue jianbao (The Li Xian Couple’s Tomb of the Northern Zhou in Guyuan in Ningxia),” *Cultural Relics*, no. 11, pp. 1-20.

熊海堂

- 1995 《東亞窯業技術發展與交流史研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Xiong, Hai-tang

- 1995 *Dongya yaoye jishu fazhan yu jiaoliushi yanjiu*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Exchange of Firing Technology in East Asia),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熊傳新

- 1981 〈湖南湘陰隋大業六年墓〉,《文物》,第4期,頁39-43。

Xiong, Chuan-xin

- 1981 “Hunan Xianyin Sui Daye liunian mu (The Tomb Dated in 6th Year of the Daye of Sui and in Xianyin, Hunan),” *Cultural Relics*, no. 3, pp. 39-43.

磁縣文化館

- 1979 〈河北磁縣北齊高潤墓〉,《考古》,第3期,頁234-243。
1984 〈河北磁縣東陳村北齊堯峻墓〉,《文物》,第4期,頁16-22。
1984 〈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第4期,頁1-9。

Ci Cultural Center

- 1979 “Hebei Cixian Beiqi Gao Run mu (Gao Run’s Tomb of the Northern Qi in Ci County, Hebei),” *Archaeology*, no. 3, pp. 234-243.
1984 “Hebei Cixian Dongchencun Beiqi Yao Jun mu (Yao Jun’s Tomb of the Northern Qi in Dongchen Village in Ci County, Hebei),” *Cultural Relics*, no. 4, pp. 16-22.
1984 “Hebei Cixian Dongwei Rurugongzhu mu fajue jianbao (The Excavation of Ruru Princess’s Tomb of the Eastern Wei in Ci County, Hebei),” *Cultural Relics*, no. 4, pp. 1-9.

磁縣文物保管所

- 1997 〈河北磁縣北齊元良墓〉,《考古》,第3期,頁33-39、85。

Ci Cultural Relics Conservation Office

- 1997 “Hebei Cixian Beiqi Yuan Liang mu (Yuan Liang’s Tomb of the Northern Qi in Ci County, Hebei),” *Archaeology*, no. 3, pp. 33-39, 85.

翟盛榮、晉華

- 2006 〈昔陽縣沾尚鎮瓦窯足村發現隋寧州刺史王季族墓葬〉，《三晉考古》，5輯，頁372-376。

Zhai, Sheng-rong and Hua Jin

- 2006 “Xiyangxian Zhanshangzhen Wa’yaozucun faxian Sui Ningzhou cishi Wang Jizu muzhang (The Tomb of Wan Jizu, a Ningzhou Prefecture Governor of the Sui Dynasty in Wayaozu Village, Zhanshang Town, Xiyang County),” *Sanjin Kaogu* (Archaeology of the Three Jin), no. 3, pp. 33-39, 85.

趙強、姜寶蓮、郭明卿

- 2017 〈隋獨孤羅墓的發現和研究〉，《華夏考古》，第2期，頁121-127。

Zhao, Qiang, Bao-lian Jiang and Ming-qing Guo

- 2017 “Discovery and Study of the Sui Period Tomb of Dugu Luo,” *Huaxia Archaeology*, no. 2, pp. 121-127.

銅川市考古研究所

- 2020 〈陝西銅川隋折婁墓發掘簡報〉，《文物》，第10期，頁46-58。

Tongchuan Municip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 2020 “The Excavation of the Tomb of Zhelou Pi of the Sui Dynasty at Tongchuan, Shaanxi,” *Cultural Relics*, no. 10, pp. 46-58.

趙希利、賈曉燕、徐諾、趙鳳燕

- 2017 〈西安出土兩尊北周漢白玉觀世音像無損分析〉，《考古與文物》，第5期，頁139-144。

Zhao, Xi-li, Xiao-yan Jia, Nuo Xu, Feng-yan Zhao

- 2017 “Non-destructive Analysis and Related Issues of the White Marble Bodhisattva Statues Dating to the Northern Zhou Stored at Xi’an Museum,”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5, pp. 139-144.

趙慶鋼、張志忠主編

- 2011 《千年邢窯》，北京：文物出版社。

Zhao, Qing-gang, Zhi-zhong Zhang

- 2011 *Xing Kiln in its Millennium*, Beijing: Cultural Press.

劉呆運

- 1999 〈北周譙忠孝王宇文儉墓彩繪陶俑〉，《收藏家》，第3期，頁14-17。
2012 〈關中地區隋代墓葬形制研究〉，《考古與文物》，第4期，頁83-92。
2015 〈關中地區隋代墓地分布研究〉，《考古與文物》，第5期，頁74-79。

Liu, Dai-yun

- 1999 “Beizhou Qiaozhongxiaowang Yuwen Jian mu caihui taoyong (Painted Ceramic Tomb Figurines from Yuwen Jian’s Tomb, the Qiaozhongxiao King of the Northern Zhou),” *Shouchangjia* (Collectors), no. 3, pp. 14-17.
- 2012 “A Study of Tomb Structures of the Sui Dynasty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4, pp. 83-92.
- 2015 “Distribution of Sui Dynasty Cemeteries in the Guanzhong Region,”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no. 5, pp. 74-79.

劉瑋琦

- 2013 〈試論東魏北齊時期官方樣式——鄴城與晉陽隨葬俑的特徵研究〉，《故宮學術季刊》，31卷1期，頁1-62。

Liu, Wei-chi

- 2013 “A Study of Official Style during the Period of Eastern Wei-Northern Qi,”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31, no. 1, pp. 1-62.

鄭岩

- 2013 〈論「鄴城規制」——論漢唐之間墓葬壁畫的一個接點〉，收於鄭岩，《逝者的面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308-336。
- 2016 《魏晉南北朝壁畫墓研究（增訂版）》，北京：文物出版社。

Zheng, Yan

- 2013 “Lun ‘Yecheng Guizhi’: Lun Han-Tang zhijian muzhang bihua de yige jiedian (The “Yecheng Model”: A Connecting Point of the Funerary Mural between Han and Tang),” in Yan Zheng, *Masking Death: Funerary Art of Medieval China*,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pp. 308-336.
- 2016 *Wei-Jin Nanbeichao bihuamu yanjiu* (A Study of Mural Tombs during the Wei, Jin, and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戴應新

- 1998 〈隋豐寧公主與韋圓照合葬墓〉，《故宮文物月刊》，186期，頁76-93。
- 1998 〈北周韋孝寬夫婦合葬墓〉，《故宮文物月刊》，189期，頁100-113。

Dai, Ying-xin

- 1998 “Sui Fengning gongzhu yu Wei Yuanzhao hezangmu (The Tomb of Princess Fengning of Sui and Wei Yuanzhao),”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no. 186, pp. 76-93.
- 1998 “Beizhou Wei Xiaokuan fufu hezangmu (The Tomb of the Wei Xiaokuan Couple of the Northern Zhou),”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Monthly of Chinese Art*, no. 189, pp. 100-113.

濟南市考古研究所

- 2005 〈濟南隋代呂道貴兄弟墓〉，《文物》，第1期，頁29-32。

Ji'nan Municip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 2005 “Jinan Suidai Lü Daogui xongdi mu (The Tombs of the Lü Daogui Brothers of the Sui Dynasty in Jinan),” *Cultural Relics*, no. 1, pp. 29-32.

濮陽市文物保護管理所、濮陽縣文物管理所

- 2017 〈河南省濮陽縣這河寨北齊李亨墓發掘簡報〉，《考古》，第4期，頁16-28。

Puyang Municipal Commission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and Cultural Relics Bureau of Puyang County

- 2017 “The Excavation of the Burial of Liheng of the Northern Qi Dynasty at Zhehezhai, Puyang County, Henan,” *Archaeology*, no. 4, pp. 16-28.

謝明良

- 2006 〈雞頭壺的變遷——兼談兩廣地區兩座西晉紀年墓的時代問題〉，《六朝陶瓷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頁325-355。
- 2006 〈出土文物所見中國十二支獸的形態變遷——北朝至五代〉，《六朝陶瓷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社，頁359-391。
- 2014 《中國古代鉛釉陶的世界——從戰國到唐代》，臺北：石頭出版社。
- 2015 〈唐俑札記——想像製作情境〉收入謝明良，《陶瓷手記3：陶瓷史的地平與想像》，臺北：石頭出版社，頁221-234。

Hsieh, Ming-liang

- 2006 “Jitouhu de bianqian: jiantan liangguang diqu liangzuo Xijin jinianmu de shidai went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cken-head Ewer and the Dates of the Two Western Jin Tombs with Dating References in Guangdong and Guangxi),”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Six Dynasties Ceramic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pp. 325-355.
- 2006 “Chutu wenwu suojian Zhongguo shi'erzhi shou de xingtai bianqian: Beichao zhi Wuda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welve Zodiac Animals on the Excavated Objects: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Five Dynasties),” *Collected Papers on the Six Dynasties Ceramics*,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pp. 359-391.
- 2014 *Zhongguo gudai qianyoutao de shi jie: cong Zhanguo dao Tangdai* (The World of Ancient Chinese Lead-Glazed Pottery: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o the Tang Dynasty), Taipei: Rock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 2015 “Tang Yong zhaji: Xiangxiang zhizuo qingjing (Notes on Tang Tomb Figurines: The Possible Production Context),” in *Taoci shouji 3: Taoci shi de diping yu xiangxiang* (Notes on Ceramics 3: The Horizons and Imaginations of the Ceramics History), Taipei: Rock Publishing International, pp. 221-234.

謝明良著；王怡文、林容伊譯

- 2014 〈對唐三彩與甄官署之關係的考察〉，《典藏·讀天下·古美術》，第9期，頁54-55。原刊於謝明良，〈唐三彩と甄官署との関係についての考察〉，《唐三彩の諸問題》，《美學美術史論集》，5輯（1985），頁19-23。

Hsieh, Ming-liang; Wang, Yi-wen and Rong-yi Lin trans.

- 2014 “Dui Tansancai yu Zhengguanshu zhi guanxi de kaocha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ang Sancai and Zengguanshu),” *Artco China*, no. 9, pp. 54-55. Japanese version: Hsieh, Ming-liang, “An Investigation on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Tang Sancai and Zengguanshu,” *Issues on Tang Sancai, Aesthetics and Art History*, no. 5 (1985), pp. 19-23.

蘇哲

- 1998 〈安陽隋墓所見北齊鄴都文物制度的影響〉，收於王輝編，《遠望集：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華誕四十周年紀念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頁667-674。

Su, Zhe

- 1998 “Anyang Suimu suojian Beiqi Yedu wenwu zhidu de yingxiang (The Impacts of the Cultures of Ye of the Northern Qi on the Sui Tombs in Anyang),” in Hui Wang ed., *Yuanwangji: Shaanxisheng kaogu yanjiusuo huadan sishi zhounian jinian wenji* (Looking Far: A Collection of Papers for the Fourth Anniversary of Sha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Xi'an: Shaanxi People Press, pp. 667-674.

權奎山

- 2012 〈武昌郊區隋唐墓出土陶俑的分期〉，收於《慶祝宿白先生九十華誕文集》，北京：科學出版社，頁202-244。

Quan, Kui-shan

- 2012 “Wuchang jiaoqu Sui-Tang mu chutu taoyong de fenqi (Periodisation of Ceramic Figurines from Sui-Tang Tombs in the Wuchang Suburb Area),” in *Qingzhu Subai xiansheng jiushi huadan wenji* (A Collection of Papers in Celebration of Prof. Su Bai's Ninetieth Birthday), Beij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pp. 202-244.

Fraser, Sarah

- 2004 *Performing the Visual: The Practice of Buddhist Wall Painting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618-960*,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Garachon, Isabella and Lucien van Valen

- 2014 “The Matter of Tang Tomb Figures: A New Perspective on a Group of Terracotta Animals and Riders,” *The Rijksmuseum Bulletin*, vol. 62, no. 3, pp. 218-239.

Howard, Angela

- 2004 “From Han to Tang: The Acculturation of Buddhist Images in China,” *Orientalisms*, vol. 35, no. 7, pp. 47-56.

Lin, Chun-i

- 2019 “Ceramic Tomb Figurines in the Chang'an Area from the 4th to the 7th Century: A Critical Study of Classification, Origins and Functions,” PhD diss., Department of History of Art and Archaeology,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

Shen, Hsueh-man

2018 *Authentic Replicas: Buddhist Art in Medieval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van Valen, Lucien, Isabelle Garachon, and Loe Jacobs

2014 "On the Production and Firing of 7th Century Chinese Reinforced Ceramic Horses and Camels," in H. Roemich and K. van Lookeren Campagne eds., *Recent Advances in Glass, Stained-Glass and Ceramic Conservation 2013*, Zwolle: Spa Uitgevers, pp. 149-158.

Wong, Dorothy

2018 *Buddhist Pilgrim-Monks as Agents of Cultural and Artistic, Transmission: The International Buddhist Art Style in East Asia, ca. 645-770*, Singapore: NUS Press.

Ye, Wa

2005 "Mortuary Practice in Medieval China: A Study of the Xingyuan Tang Cemetery," Ph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圖版出處

- 圖1 河南省文物局,《安陽北朝墓葬》(北京:科學出版社,2013),彩版65-66。
- 圖2 磁縣文物保管所,〈河北磁縣北齊元良墓〉,《考古》,1997年第3期,圖2。
- 圖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彩版28-1、28-2。
- 圖4 河南省文物局,《安陽北朝墓葬》,彩版63-64。
- 圖5 河南省文物局,《安陽北朝墓葬》,彩版99。
- 圖6 劉呆運,〈北周譙忠孝王宇文儉墓彩繪陶俑〉,《收藏家》,1999年第3期,頁14。
- 圖7 劉呆運,〈北周譙忠孝王宇文儉墓彩繪陶俑〉,頁14。
- 圖8 賁安志編,《中國北周珍貴文物》(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92),圖版22。
- 圖9 賁安志編,《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圖版24。
- 圖10 賁安志編,《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圖版23。
- 圖11a-b 賁安志編,《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圖版294-295。
- 圖1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圖版20。
- 圖13 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隋墓陶俑的演變〉,《文物》,2018年第1期,頁75,圖15。
- 圖14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東郊隋李椿夫婦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3期,頁23,圖2-1、2-2。
- 圖1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圖版21。
- 圖16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隋呂思禮夫婦合葬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2004年第6期,頁24,圖6。
- 圖1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隋墓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81年第3期,頁377,圖8-1。
- 圖1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隋墓發掘報告〉,圖版18-1。
- 圖19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隋墓發掘報告〉,圖版18-2。
- 圖20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隋墓發掘報告〉,圖版18-3。
- 圖21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區隋唐墓》(北京:科學出版社,1966),圖版7-3。
- 圖22 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咸陽隋代蕭紹墓〉,《文物》,2006年第9期,頁41,圖3。
- 圖23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隋李裕墓發掘簡報〉,《文物》,2009年第7期,頁6,圖4。
- 圖24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圖版20。
- 圖25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東郊隋李椿夫婦墓清理簡報〉,頁23,圖2-1。
- 圖26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西安郭家灘隋姬威墓清理簡報〉,《文物》,1959年第8期,頁6,圖8。

- 圖27 戴應新，〈隋豐寧公主與韋圓照合葬墓〉，《故宮文物月刊》，186期（1998），頁80，圖9。
- 圖28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圖版10-1。
- 圖29 河南省文物局，《安陽北朝墓葬》，彩版3-3。
- 圖30 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隋墓發掘報告〉，頁377，圖20-4。
- 圖31 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隋墓發掘報告〉，頁377，圖21-4。
- 圖32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隋李裕墓發掘簡報〉，頁8、圖14。
- 圖33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圖版46。
- 圖34 河南省文物局，《安陽北朝墓葬》，彩版21-1。
- 圖35 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安陽隋墓發掘報告〉，頁377，圖21-4。
- 圖36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隋元威夫婦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2年第1期，圖版6-2。
- 圖3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長安城郊隋唐墓》，圖版22-4。
- 圖38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圖版36-1。
- 圖39 孫修身編，敦煌研究院主編，《敦煌石窟全集》，第12卷·佛教東傳故事畫卷（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頁159。
- 圖40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省三原縣雙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簡報〉，《文物》，1966年第1期，頁28，圖3。
- 圖41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陝西省三原縣雙盛村隋李和墓清理簡報〉，頁29，圖4。
- 圖42 徐光冀編，《中國出土壁畫全集》，第4卷·山東（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頁47，圖50。
- 圖43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3），頁7，圖2。
- 圖44 徐光冀編，《中國出土壁畫全集》，第6卷·陝西（上）（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頁132，圖125。
- 圖45 徐光冀編，《中國出土壁畫全集》，第9卷·甘肅、寧夏、新疆（北京：科學出版社，2011），頁156，圖150。
- 圖46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頁6，圖4。
- 圖47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頁86，圖79。
- 圖48 安徽省博物館，〈合肥隋開皇三年張靜墓〉，《文物》，1988年第1期，頁87，圖79。
- 圖49 安徽省展覽、博物館，〈合肥西郊隋墓〉，《考古》，1976年第2期，頁137，圖3-1。
- 圖50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咸陽鄧村北周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7年第3期，頁52，圖40、41。
- 圖51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陝西咸陽鄧村北周墓發掘簡報〉，頁40，圖14、15。
- 圖52 咸陽市文管會、咸陽博物館，〈咸陽市胡家溝西魏侯義墓清理簡報〉，《文物》，1987年第12期，頁65，圖17、18。
- 圖53 磁縣文化館，〈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發掘簡報〉，《文物》，1984年第4期，頁2，圖2。

- 圖54 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徐顯秀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第10期，頁6，圖3。
- 圖55 河南省文物局，《安陽北朝墓葬》，彩版55。
- 圖5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磁縣灣漳北朝壁畫墓》，彩版33。
- 圖57 張柏，《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12卷·河南（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圖23。
- 圖58 河南省文物局，《安陽北朝墓葬》，彩版62-6。
- 圖5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齊東安王婁睿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彩版137。
- 圖60 王建保、張志忠、李融武、李國霞，〈河北臨漳縣曹村窯址考察報告〉，《華夏考古》，2014年第1期，彩版6-4。
- 圖61 王建保、張志忠、李融武、李國霞，〈河北臨漳縣曹村窯址考察報告〉，彩版6-6。
- 圖62 賁安志編，《中國北周珍貴文物》，圖版245。
- 圖63 濮陽市文物保護管理所、濮陽縣文物管理所，〈河南省濮陽縣這河寨北齊李亨墓發掘簡報〉，《考古》，2017年第4期，圖版3。
- 圖64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陝西西安西魏乙弗糾及夫人隋代席氏合葬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20年第1期，頁42，圖32、33。
- 圖65 河南省文物局，《安陽北朝墓葬》，彩版96-2。
- 圖66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南郊隋蘇統師墓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2010年第3期，圖版1-1。
- 圖67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圖版32、33。
- 圖68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北齊徐顯秀墓發掘簡報〉，頁33、圖77。
- 圖69 趙慶鋼、張志忠主編，《千年邢窯》（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頁59。
- 圖70 張柏，《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12卷·河南，圖38。
- 圖71 張柏，《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12卷·河南，圖39。
- 圖72 張柏，《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12卷·河南，圖40。
- 圖73 張柏，《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12卷·河南，圖41。
- 圖74 張柏，《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12卷·河南，圖36。
- 圖75 張柏，《中國出土瓷器全集》，第12卷·河南，圖37。
- 圖76 石璋如，《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附錄一：隋唐墓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5），圖137。
- 圖77 石璋如，《中國考古報告集之二·小屯·第一本·遺址的發現與發掘·丙編附錄一：隋唐墓葬》，圖133。
- 圖78 安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陽市置度村八號隋墓發掘簡報〉，《考古》，2010年第4期，圖版12-1。
- 圖79 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安陽隋張盛墓發掘記〉，《考古》，1959年第10期，圖版11-8。

- 圖80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代洛州刺史賈敦頤墓的發掘〉，《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8期，頁50，圖38。
- 圖8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晉源區文物旅遊管理局，《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頁80，圖117。
- 圖8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沙溝隋代斛律徽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17），圖版14。
- 圖8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晉源區文物旅遊管理局，《太原隋虞弘墓》，頁66，圖88。
- 圖8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晉源區文物旅遊管理局，《太原隋虞弘墓》，頁59，圖80；頁75，圖99；頁77，圖104。
- 圖85 濟南市考古研究所，〈濟南隋代呂道貴兄弟墓〉，《文物》，2005年第1期，封面3-1。
- 圖86 濟南市考古研究所，〈濟南隋代呂道貴兄弟墓〉，封面3-2。
- 圖87 嘉祥縣文物管理所，〈山東嘉祥英山二號隋墓清理簡報〉，《文物》，1987年第11期，頁60，圖8。
- 圖88 嘉祥縣文物管理所，〈山東嘉祥英山二號隋墓清理簡報〉，頁60，圖9。
- 圖89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臨朐縣博物館，〈山東臨朐北齊崔芬壁畫墓〉，《文物》，2002年第4期，頁10，圖14。
- 圖90 戴應新，〈隋豐寧公主與韋圓照合葬墓〉，頁83，圖15。
- 圖91 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隋墓陶俑的演變〉，頁77，圖21。
- 圖92 張全民，〈略論關中地區隋墓陶俑的演變〉，頁77，圖22。
- 圖93 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東郊隋李椿夫婦墓清理簡報〉，頁23，圖2-7。
- 圖94 考古研究所安陽發掘隊，〈安陽隋張盛墓發掘記〉，頁545，圖5。
- 圖95 昭陵博物館，〈唐昭陵段簡壁墓清理簡報〉，《文博》，1989年第6期，圖版3-7。
- 圖96 昭陵博物館，〈唐昭陵段簡壁墓清理簡報〉，圖版3-8。
- 圖97 昭陵博物館，〈唐昭陵段簡壁墓清理簡報〉，圖版3-3。
- 圖98 昭陵博物館，〈唐昭陵長樂公主墓〉，《文博》，1988年第3期，圖版2-4。
- 圖99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區隋唐墓》，圖版19-8、19-9。



圖1 鄴城傳統鎮墓武士1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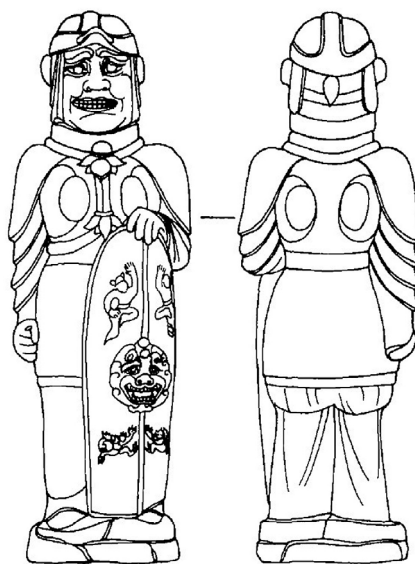


圖2 鄴城傳統鎮墓武士2型



圖3 鄴城傳統鎮墓獸1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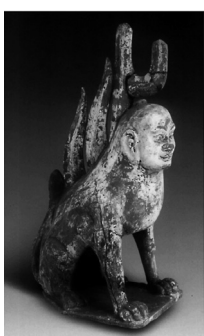


圖4 鄴城傳統鎮墓獸2型



圖5 鄴城傳統鎮墓3型



圖6 長安傳統鎮墓武士1型



圖7 長安傳統鎮墓武士2型



圖8 長安傳統鎮墓獸1型



圖9 長安傳統鎮墓獸2型



圖10 長安傳統鎮墓獸3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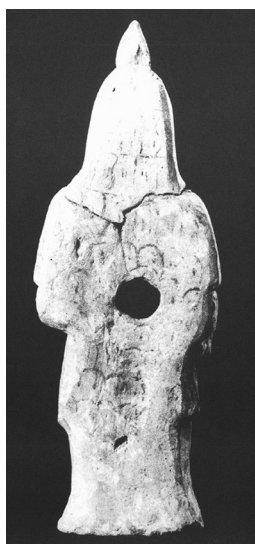


圖11 陝西咸陽侯子欽夫婦墓(586)出土長安鎮墓武士1型，背後開孔



圖12 西安鄴城鎮墓武士1型



圖13 西安鄴城鎮墓武士2a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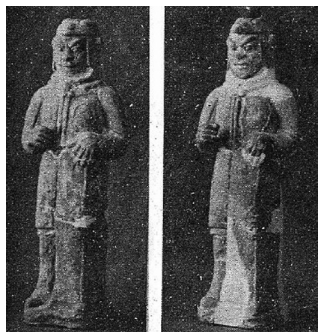


圖14 西安鄴城鎮墓武士2b型



圖15 西安鄴城鎮墓獸1型



圖16 西安鄴城鎮墓獸2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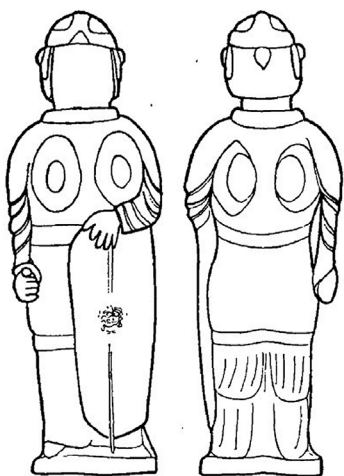


圖17 安陽隋墓鎮墓武士1型



圖18 安陽隋墓鎮墓武士2型



圖19 安陽隋墓鎮墓獸1型



圖20 安陽隋墓鎮墓獸2型



圖21 呂武墓鎮墓武士
俑 高34.5公分



圖22 蕭紹墓鎮墓武士
俑 高34.4公分



圖23 李裕墓鎮墓武士
俑 高33.6公分



圖24 李靜訓墓鎮墓武
士俑 高33.5公分



圖25 李椿夫婦墓鎮墓
武士俑 高50.5
公分



圖26 姬威墓鎮墓武士
俑 高48.4公分



圖27 豐寧公主夫婦鎮
墓武士俑 高
49.6公分



圖28 潼關稅村壁畫墓
鎮墓武士俑 高
48.5公分



圖29 河南安陽北
齊劉通墓
(572)披袍
風帽俑 高
23.2公分



圖30 河南安陽梅
園莊北地
隋墓M401
披袍風帽
俑 高21.5
公分



圖31 河南安陽梅
園莊北地
隋墓M201
披袍風帽
俑 高22.5
公分



圖32 陝西西安
李裕墓披
袍風帽俑
高18.3公
分



圖33 陝西潼關
稅村披袍
風帽俑
高18.1公
分



圖34 河南安陽
北齊叔孫
夫人墓拱
手俑 高
24.4公分



圖35 河南安陽梅
園莊北地隋
墓M201拱
手俑 高24
公分



圖36 陝西西安
元威夫婦
墓拱手俑
高15.2公
分



圖37 陝西西安
李靜訓墓
拱手俑
高20.8公分



圖38 陝西潼關
稅村壁畫
墓拱手俑
高19.7公
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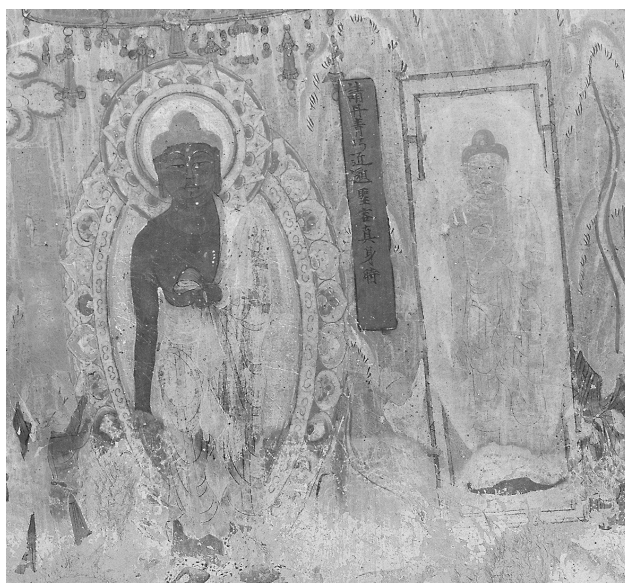


圖39 敦煌莫高窟72窟壁畫中丈量與摹畫佛像場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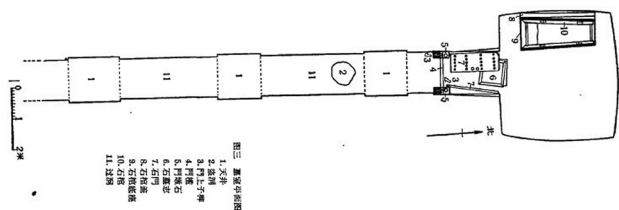


圖40 陝西三原李和墓（582）平面圖



圖41 陝西三原李和墓(582)壁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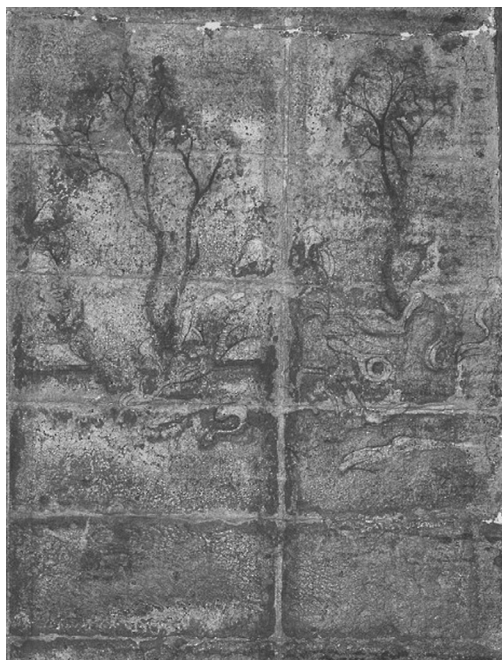


圖42 山東臨朐崔芬墓(551)壁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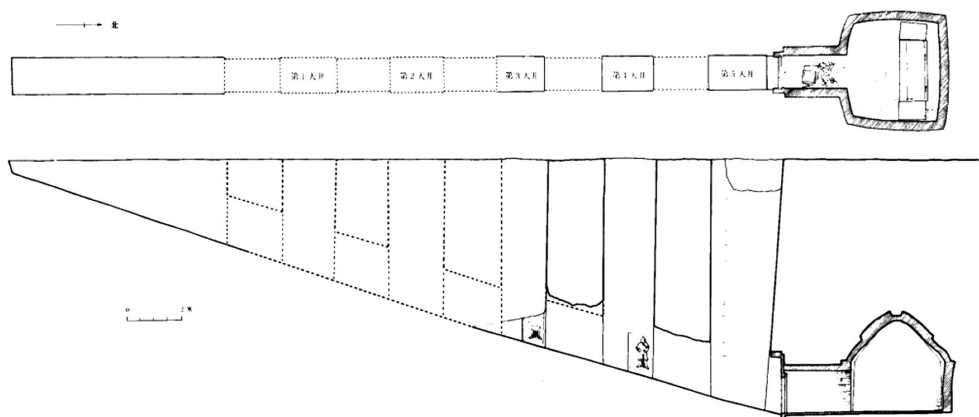


圖43 陝西西安安伽墓(579)平面圖與天井壁畫



圖44 陝西咸陽宇文通墓（572）天井壁畫



圖45 寧夏固原李賢夫婦墓（569）天井壁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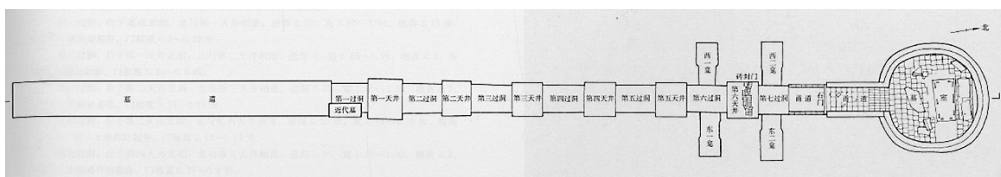


圖46 陝西潼關稅村壁畫墓基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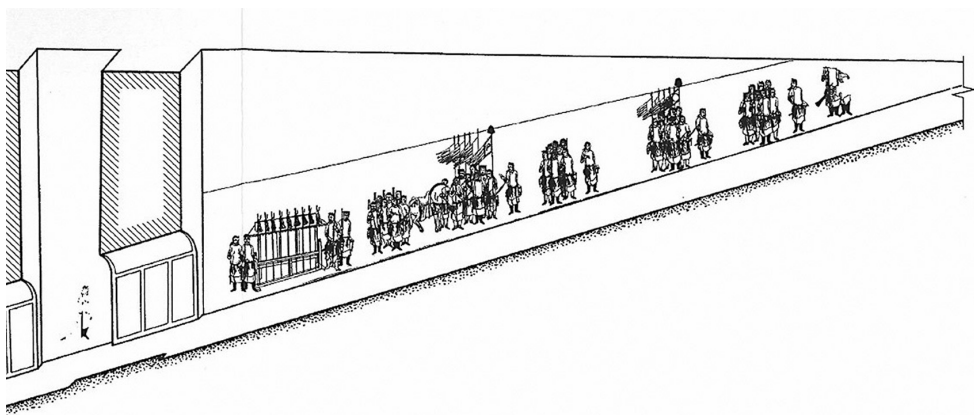


圖47 陝西潼關稅村壁畫墓墓道壁畫



圖48 安徽合肥張靜墓
出土鎮墓武士俑



圖49 安徽合肥西郊隋
墓出土鎮墓武士



圖50 咸陽空港物聯產業城M23出土的兩
件鎮墓武士俑



圖51 陝西咸陽拓跋氏墓（571）出土的兩件鎮墓
武士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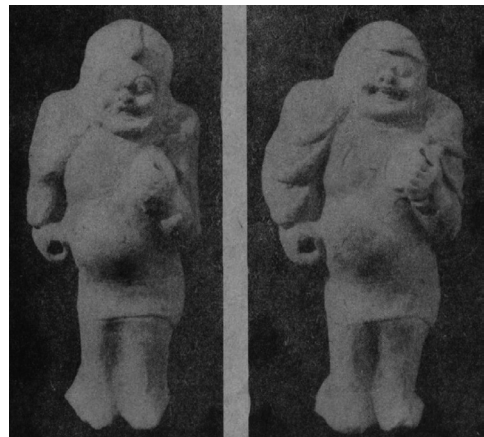


圖52 陝西咸陽侯義墓（544）出土的兩件鎮墓
武士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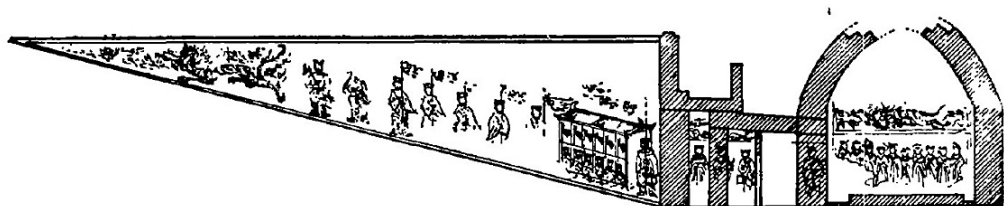


圖53 河北磁縣東魏茹茹公主墓（550）壁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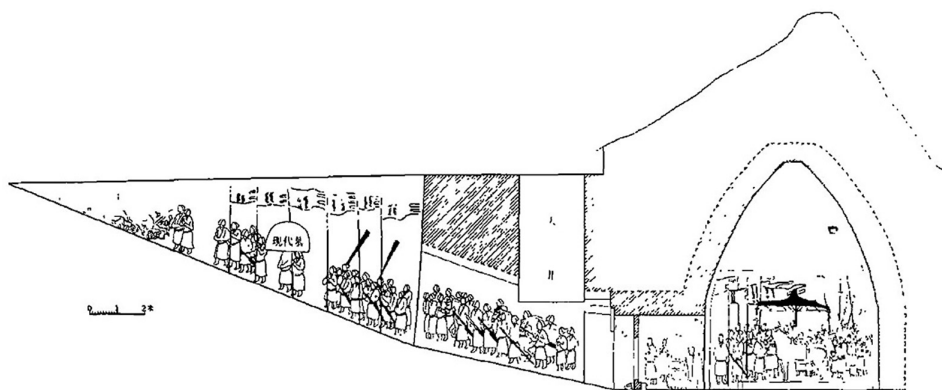


圖54 山西太原徐顯秀墓（571）壁畫



圖55 趙明度夫婦墓出土覆蓮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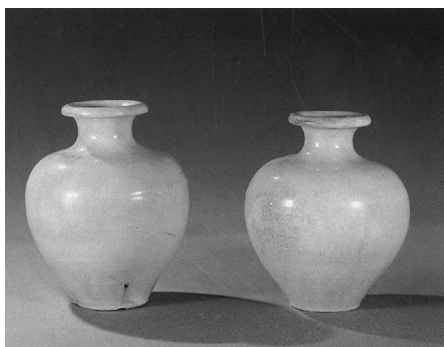


圖56 灣漳壁畫墓出土短頸罐



圖57 河南安陽范粹墓出土覆蓮罐



圖58 河南安陽賈進墓出土彩釉唾壺



圖59 山西太原婁睿墓出土彩釉盂



圖60 范粹墓出土三繫罐與曹村窯出土破片對比



圖61 范粹墓出土杯與曹村窯
出土破片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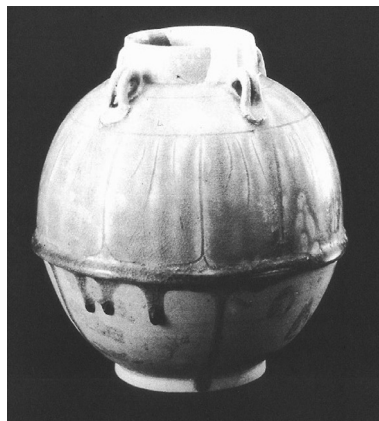


圖62 陝西咸陽王士良夫婦墓出土四繫罐



圖63 河南濮陽李亨墓出土四系罐



圖64a 陝西西安乙弗虬與席氏夫婦墓
(554/586) 出土釉碗側面



圖64b 陝西西安乙弗虬與席氏夫婦墓
(554/586) 出土釉碗足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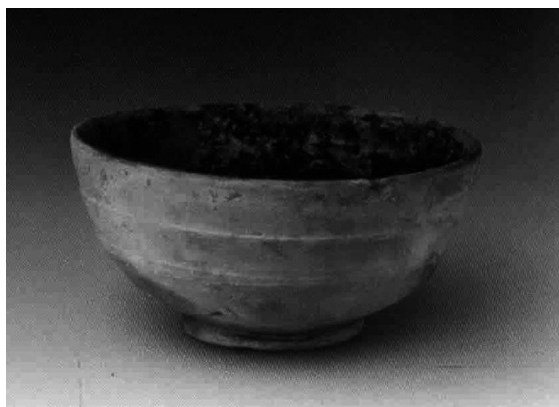


圖65 河南安陽第九標段墓中出土無釉陶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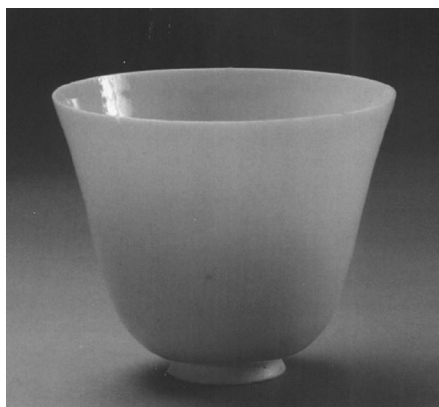


圖66 陝西西安蘇統師墓出土透影白瓷杯



圖67a 潼關稅村壁畫墓出土騎馬俑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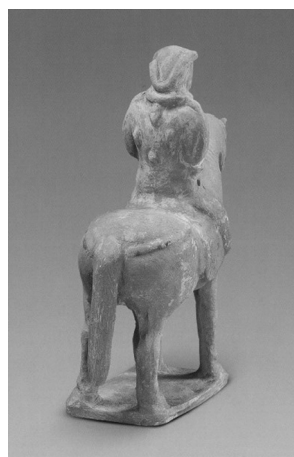


圖67b 潼關稅村壁畫墓出土騎馬俑背面



圖68 徐顯秀墓出土雞頭壺



圖69 李靜訓墓出土雞頭壺



圖70 張盛墓出土白瓷文吏俑



圖71 張盛墓出土白瓷文吏俑



圖72 張盛墓出土白瓷
人面鎮墓獸



圖73 張盛墓出土白瓷
獸面鎮墓獸



圖74 張盛墓出土白瓷
鎮墓武士俑



圖75 張盛墓出土白瓷
鎮墓武士俑



圖76 安陽小屯YM243出
土的瓷胎門吏俑



圖77 安陽小屯YM243出
土的瓷胎門吏俑



圖78 安陽置度村八號
墓出土青瓷女俑



圖79 張盛墓出土女俑



圖80 賈敦瞢墓出土黃釉
瓷胎女俑



圖81 虞弘夫婦墓出土鎮
墓武士俑破片



圖82 斛律徹墓出土鎮
墓武士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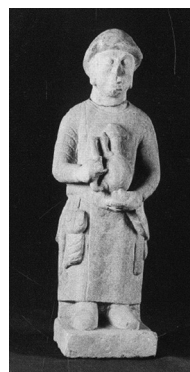


圖83 虞弘夫婦墓出
土砂岩俑



圖84a 虞弘夫婦墓出土
漢白玉伎樂俑



圖84b 虞弘夫婦墓出土漢白玉伎樂俑
覆蓮座



圖84c 虞弘夫婦墓出土
漢白玉伎樂俑



圖85 呂道貴墓出土石
門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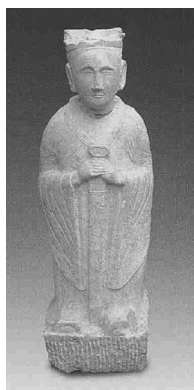


圖86 呂道貴墓出土石
門吏



圖87 徐之范墓出土石
門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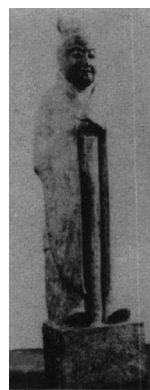


圖88 徐之范墓出土石
門吏



圖89 崔芬墓石門線刻門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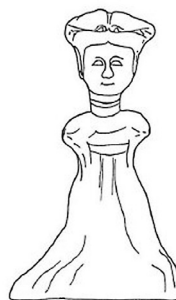


圖90 豐寧公主夫婦墓出土綜合材質女俑



圖91 柴暉墓（606）出土綜合材質女俑



圖92 張綝夫婦墓出土綜合材質女俑



圖93 李椿夫婦墓（610）出土女騎馬俑



圖94 張盛墓出土陶鞋



圖95 段簡璧墓（651）出土陶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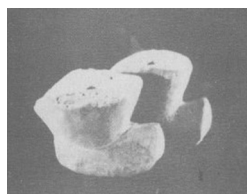


圖96 段簡璧墓出土陶鞋



圖97 段簡璧墓出土陶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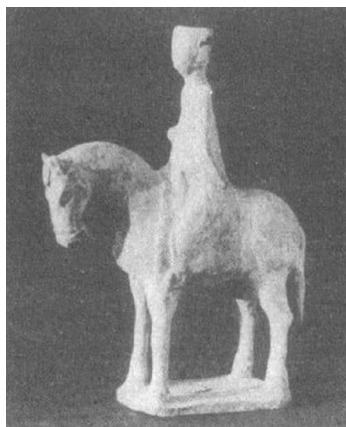


圖98 長樂公主墓（643）出土女騎馬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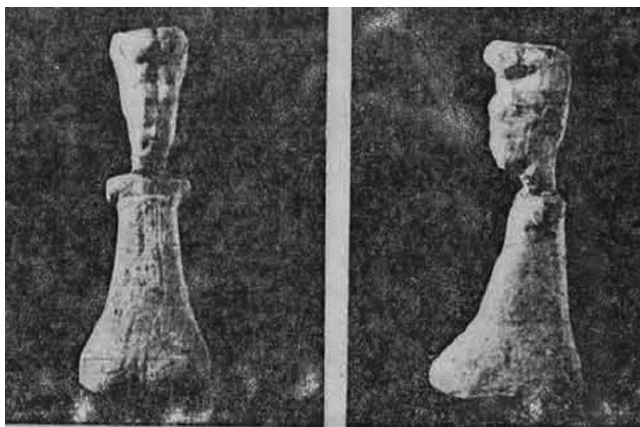


圖99 段元哲墓（639）出土綜合材質女俑

Changes in the Forms of Ceramic Tomb Figurines in the Context of Regional Interaction: The Chang'an Area from the Northern Zhou to the Sui Dynasty as a Case Study

Lin, Chun-i

Research Institute for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reasons why people in the Chang'an area appropriated the designs and assemblages of tomb figurines from the Ye area in Sui. It re-investigates the explanations given in previous studies, interpreting the changes from a longer time period and observing other artefacts which were related to tomb figurines, such as ceramic wares and Buddhist sculptures. The investigation shows that the Chang'an area appropriated regional designs of artefacts from the Ye area before the end of the 6th century. Chang'an appropriated designs not only from the Ye area but also from other areas, and the Ye designs were transmitted to the Chang'an area and then beyond. The Chang'an area did not just appropriate the designs of ceramic tomb figurines from Ye but also many other types of artefacts. From the end of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Sui, the frequent wars, new policies and new constructions intensified regional exchanges. The designs of many artefacts were transmitted to wider areas and many new designs were invented. The changes of forms of ceramic tomb figurines in the Chang'an area was one of the results of more people and objects travelling for greater distances and more frequently.

Keywords: Northern Zhou, Sui, the Chang'an area, the Ye area, ceramic tomb figurines